

全民戰爭

左丘





全 民 戰 爭

Der Totale Krieg

von

General Ludendorff

董 問 樵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版

◆(38784)

◆G二九八〇

全 民 戰 爭 一 冊

Der Totale Krieg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魯北道夫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原 著 者

General Ludendorff

譯 述 者

董 問 樵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本書校對者徐仲盤)

翁

## 張序

戰爭之本質，隨時代而變化。百年前之戰爭與今日之戰爭大不相同。在菲列大王第一（一七四〇——一七八六年）或拿破侖時代，誠如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所言，戰爭係一國強迫他國屈服於其意志下的一種武力行動，蓋當時之所謂戰爭，重心在交戰國二方軍隊本身之實力，與二方人民無如何關係。自一九一四年之世界大戰起，情勢一變，向之僅以軍隊為決勝之工具，今則全國人民間接亦為參戰之一員，軍隊與人民合一，勝負決之於軍隊與人力及物力之總和，非僅軍力一者而已也。故攻擊敵人，非僅限於其軍隊，且擴大至於敵國之人民精神與物質。世界大戰之結果實係全民戰爭之朕兆！

所謂全民戰爭者，非限於軍隊與軍隊之相持，乃軍隊與人民之聯合戰線，一國利用飛機散發傳單，或建築巨大無線電臺，廣事宣傳，此欲精神上屈服敵國人民也。調遣軍艦魚雷滿佈敵國海口，

藉以斷絕外糧接濟，此物質上屈服敵國人民也。彼欲遂其侵略目的之野心國家，不必出之以流血之慘劇，無形摧殘，亦足以減少敵國戰鬥之力量也。

軍隊與人民之不可分離，大戰時予吾人之教訓，已昭然若揭，而今後之戰爭，對人民精神上，生理上及物質上需求之迫切，更勢所必然。克敵制勝，固有賴於前方將士之用命，然後方人民整個力量之爲何如，要亦爲成敗得失之關鍵。前方係有形之戰爭，後方乃無形之戰爭，兩國交戰，兩國領土均爲戰地，兩國人民，均係戰士，初不僅限於疆場及軍隊已也。

全民戰爭，既係傾全國人力與物力以赴之，則人力與物力之亟須培植，自無待言，而培植之尤須於平時爲之，亦無疑義。在人力方面，最要莫過於精誠團結（或精神統一），此係平時教育之任務，在物力方面，最要莫過於發展產業，此乃經濟建設之任務，二者缺一不可。吾國國難嚴重，朝不保夕，國人不乏知近代戰爭係全民戰爭者，除充實軍隊外，對於人力與物力之準備，亦非可淡漠視之。政府提倡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其非爲培植人力與物力之基礎而設耶？

德國名將盧登道夫，大戰時運籌擘劃，功助卓著，而尤以探冷堡（Tannenberg）一役爲甚。近

著全民戰爭一書，至爲各國所注意，此不僅作者係軍事學家，且爲德國政府深資倚畀之故也。學友董問樵博士，研究經濟學有年，造詣頗深，因感於外侮之日亟，譯成此書以饗國人，余以其深切時代之需要，用贅數語以爲之序。

二十五年七月張樑任書於上海

## 譯者序

盧登道夫將軍 (General Ludendorff) 是德國歐戰時最著名的將官之一。德國有名的探冷堡的勝利，及西方戰線上許多戰爭，都是由盧氏的運籌，所以關於盧氏個人的事業大概一般人都曉得些，用不着我再來介紹。我現在只想關於他這本最新的著作全民戰爭 (Der totale Krieg) 說兩句話。本書是今年在德國明星出版的 (Ludendorffs Verlag G. m. b. H. München 19.)。在譯者的譯稿完竣時，還未見到有第二國語言的譯本。我現在把牠介紹到國內來，並不是爲了國內研究戰爭和國防問題的人，更不是希望讀者把這本書奉爲金科玉律，無條件地接受盧氏的一切思想，而是把本書介紹來給與國內的一般人，使大家對於現代戰爭底本質得一個比較確定的觀念。同時希望讀者僅把這本書作爲一種參考，完全客觀地研究牠，然後再用我們自主的頭腦，批判的精神來比較我們中國的情形和應當採取的方向。中國的傳統和環境不是德國的傳統和環



境，中國的民族精神不是德國的民族精神，因此中國在目前具體的情形下所走的道路也和德國在其目前具體情形下所走的道路不同。盧氏這本書是爲了一般的德國人所寫的。他一方面根據德國過去戰爭的經驗，他方面再根據目前德國實際的環境，闡明德國爲了所謂『全民戰爭』應該努力的事情。我們研究這本書，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接受和仿效的，但是有些地方——正因爲這是爲了德國人寫的緣故——不但不切合於我們的情形和需要，恰恰使得我們處在相反的地方來着想：就是，假使我們的假敵採取如盧氏所描寫的手段時，我們應當採取什麼對策呢？讀者能够這樣去研究這本書，適當處能够這樣去思索，那麼當然比機械式地背誦別人的陳言就活潑有趣得多了。

至於盧氏這本書的內容，現在我只約略加以說明，正確的判斷，只有等讀者全部研究後自己去作吧。total 這個字是『全體』的意思，所謂『全體性 (Totalität)』這個字，在現在德國一般的，特別是國社黨的文獻中已成爲最重要，或者甚而爲最時髦的名詞了。關於全體性的解釋，最好是去參看那些講全體主義的文藝，這不是我這兒想作的。不過盧氏定名 total 的意思自然也含

有那種全體主義的意味在內。在我初翻譯時，從頭到尾我都譯成「全體的」戰爭，後來我覺得這  
個名詞太晦，而且經我深思的結果，使我改變初次的譯名而易以現在的譯名「全民戰爭」。實際  
上，照盧氏第一章中的意思是以爲自普遍兵役制之施行，新式戰鬪器之進步，把民衆直接或間接  
地都捲入戰爭漩渦內，於是戰爭就不只是軍隊的事情，而成爲全民族的事情了。這個戰爭的本質  
和從前戰爭的不同，因此從前對於戰爭的定義也不適用了。盧氏就名現代的戰爭，就是這個所謂  
total 戰爭是一個民族爲保持其生存的鬪爭。我本着這個意義把牠譯爲全民戰爭。不過要補充  
的就是這一點：盧氏所謂全民戰爭底形成，偏重在戰爭技術方面的原因，或者只顧到德國的情形，  
而莫有分析現代戰爭底社會的內容 (soziologischen Inhalt)。因此他就沒有更進而分析民族  
生存保持的本質，嚴格地把牠規定出來。我想只有一個民族底種族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  
會的共屬性受到外力嚴重威脅的時候，民衆之大多數人爲了要保持這種共屬性，就是爲了民  
族底生存而決定起來鬪爭，纔能犧牲一切——物質的，精神的各方面，來換得那最高貴無比的代  
價。從內部說來，這種共屬性本身裏面不應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存在，尤其是社會經濟的機構和

秩序應當建築在一個最合理的，最進步的基礎上，使民族最多數人得到保障，維持，及文化的進步。全民戰爭就應當具有這個基礎，或者形成和發展這個基礎。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肯定：全民戰爭不能是一個民族的侵略戰爭，而是一個民族的防禦戰爭；不能是帝國主義國家用來剝削和壓迫別一個民族的戰爭，而是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用來反抗和粉碎前者，用來保持民族生存發揚光大民族共屬性的戰爭。所以全民戰爭是具有革命意義的。自然，全民戰爭是全民的事情，因此爲了使得民衆的最大多數都直接和間接參加作戰，必須先喚起或者強化他們這樣的決心。一般談軍事的人也常把動員分爲精神或心理的動員，物質的動員及人員的動員三種。國內人士不也常說精神團結或精誠團結的話麼？不過精神團結這個口號就不及盧氏所提出的精神統一來得透澈。因爲精神團結只含了暫時地，機械地綜合各種異質的（heterogen）精神的意思，而精神統一就是長久地，有機地融合各種同質的（homogen）精神的意思。所以後者比前者是一個發展到更高階級的結果。就其過程中看來，民族精神是可以由團結而趨於統一的。所謂心理或精神的動員只有在理解精神統一之下纔能收得美滿的結果。盧氏在本書第二章中具體提出那些關於統一德

國民族精神的方法，如種族政策，德意志的宗教（所謂德意志的神底體驗）以及對猶太人和羅馬教堂等，我們自然用不着去贊同了。我們就不管盧氏的政治立場是否合理（現在德國所盛倡導的種族問題純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在中國目前環境中，我們不應當去無的放矢，白白消費了我們的精力。我們應當集中精力，周顧中國具體的環境，深思中國現在的地位，而想出統一民族精神的具體辦法。

在全民戰爭中，經濟的活動也直接包括在戰爭行動之下，經濟在這兒尤應當成爲如盧氏所說的，極富有生命的東西。自然，國防經濟一般有效的原則是不能成立的，只除了下面的一個原則：就是民族認爲把他們一切物質的所有供給作戰，是他們的義務。全民戰爭的國防經濟與全民戰爭本身一樣，是隨民族和環境之具體情形而定的。國防經濟包括了具體的物質動員，戰時經濟種種在內。牠的生產和分配，都應當規別地域情形和時間性質，有計劃地統制或管理。盧氏就根據德國歐戰時經驗，給了我們一個實例看。我們在中國具體環境下，自然要去考慮與此適應的國防經濟底準備，動員，及戰時和戰後改造的種種步驟和手段。盧氏從第四章到第七章中都描寫全民戰

爭本身的問題，如軍隊之編制和運用，戰爭之實行及領導，和戰術等。這兒盧氏就其所有的軍事學上的權威，處處根據事實，特別是德國過去戰爭的經驗，作扼要的敘述，這也許對於專門研究軍事學的人更發生興趣些。不過這兒處處都是在德國的情形下着想的，這兒決不是我們所能够逐字按句強學得來，而且也不用這樣作的。全民戰爭是要隨具體的環境而來規定牠的全部戰略和策略。譬如德國另外一個軍事學家 Arthur Ehrhardt 曾寫了一書名小規模的戰爭 (Kleinkrieg)，他說這種戰爭是弱者用來制服那個在任何別的方法下不能抵禦的強者的戰鬥形式。這也是值得參考的。總之，個別民族也有其個別不同的全民戰爭。全民戰爭不只是正式軍隊的作戰，而是包括全體民族的活動。

現在世界大戰的風雲，已彌漫了整個地球，人類二十年前演過的大悲劇又將更加劇地，更加殘酷地開演。自意阿戰爭以後，更使人覺得由此已揭開了世界大戰的序幕，人類不是站在戰爭預言而是站在戰爭事實之前了。我們不用效和平主義者，只徒空喊非戰厭戰的呼聲，更不用效德國的哲學家尼采 (Nietzsche) 說戰爭是人類高度發展底最有價值的工具，是達到「超人」(Über-

『mensch』所不可缺少的東西；我們應當看清是那一種戰爭，爲什麼而戰爭？要是戰爭是爲了民族底生存保持，那麼，這個戰爭就是全民族的事業。在這種意義下大家就要勇敢，不要怯懦，要積極，不要消極，要精神統一，不要精神渙散，要用貫注的精神，集中的力量，有計劃地，有領導地來對付那重大事件底到來。現在是時候了，中國民族放棄那種混沌誇大狂的心理，放棄那種自鄙自賤的心理。我們尊敬別的民族，然而更因此而愛護我們自己的民族；我們須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創造出一個新的民族自信力。發揚固有的文化，吸收現時代的精神，創造一個高級的文化統一體。因此在民族生存受到最危險的動搖的時候，大家就要一致起來去參加那個保持民族生存的鬪爭。我們不用怕古羅馬的軍威，新攪撒的霸略，我們用我們統一的力量，徹底的決心，定可以摧堅破銳達到我們的勝利。我們要除去那種總以爲不能抵抗而於是就不抵抗的心理。一九一四年歐戰時，在法、英、聯軍還未決定馬恩河反攻前的最高軍事會議上，法國大將柏坦應（Patain）將軍，說德國進攻太急，法軍不能再作無益的抗禦。此時法總理克勒孟梭（Clemenceu）以一文人的資格，向柏氏怒吼，說他是軍人，不但不應當這樣說，而且也不應當這樣想。所以聯軍在馬恩河反攻德軍的勝利，實際

領導作戰的功勞雖屬於福煦(Foch)將軍，而精神和心理上的決斷，卻歸功於克氏那個有決心，有膽量的文人咧！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董問樵序於滬

# 目錄

- 一 全民戰爭之本質……………一
- 二 民族之精神統一是全民戰爭之基礎……………一五
- 三 經濟與全民戰爭……………四一
- 四 防禦軍之強度和實質……………六九
- 五 防禦軍之成分及其出動……………八八
- 六 全民戰爭之實行……………一二〇
- 七 將帥……………一四六



# 全民戰爭

## 一 全民戰爭之本質

我決不想創造一種戰爭理論。我屢次聲明，我是反對一切理論的。戰爭是一種事實而且是一種最莊嚴的事實。我現在就想把這種事實指示出來，同時對於一般週知的事情就簡直不必談，至少不用那麼分斤較兩地談，以免遺畫蛇添足之誚。我是向着民衆說話，爲民衆中之每個分子說話，因此我關於民衆平常不熟悉的事情特別詳細討論。民族必需認識他們生存鬪爭之本質。他們不需要關於戰爭之長篇巨帙的教科書，而是需要容易理解的扼要的敘述。我在本敘述中所說的話，都是我個人所親歷的最嚴重的戰爭經驗，決不是外國或有的推測，以爲我是代表政府說話。

戰爭論的大師克勞塞維茨 (Von Clausewitz) 根據百年來飛德立大王的戰爭經驗及拿破

命時期的戰爭經驗寫成他的大著戰爭論。他在裏面說得很對，他說戰爭是一個國家用來強迫別一個國家屈服於其意志下的一種武力的動作。克氏說這個話的時候，只想到如何在大小戰鬪中殲滅敵方之戰鬪力。這一點無疑的已成爲用兵不可違背的原則了。實行全民戰爭的第一個任務，就要顧到這個原則。凡是克氏說過的那種關於戰場上殲滅思想的話，都將長久保持其深刻的意義。史利芬將軍 (General Graf v. Schlieffen) 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克氏戰爭論之序言中就這樣申說過，我現在只是加重這個意思而已。但是，除此之外，克書是一個過去時代的產品，現在大部分都已經陳舊了；而且使人研究時還往往發生混亂錯誤之思想。

克氏描寫那種『戰爭多樣性』的時期，現在看來已經過去了。克氏關於這點曾如下寫道：

『假使戰爭的動機越是偉大和堅強，戰爭包括民族的生存範圍越是廣，戰爭的緊張空氣越是強大，那麼，戰爭就越是接近其抽象的形態，越是成爲一種克服敵人的事情；戰爭的目的和政治的宗旨就愈是趨於一致，戰爭就愈是成爲一種純戰爭的非政治的東西。反之，假使戰爭的動機和張力越是弱，那麼，戰爭原素之自然動向——武力，也愈是離開政治所給與的路線；就是說，戰爭將

由其自由發展之方向中被阻折了。政治的宗旨和一種理想戰爭的目的就愈是分歧，戰爭就必定愈是成爲一種政治的東西。」

克氏在下節中頗能够道破現代戰爭新形態之來源，他說：

「真的，戰爭在本質和形式上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使之愈是趨近其絕對的形態。然而這種變化決不是淵源於法國政府之解放，擺脫當時政治之操縱而產生的，而是由於法國革命對於法國本身及整個歐洲所引起的變動了的政治中產生出來的。這種新政治供給了新的手段和力量，造成一種平常不可思議的施行戰爭之能力。」

當克氏的時期正盛行那種內閣戰爭。就是政府只是用牠們的軍隊來執行戰爭，民衆只有在供給租稅，或者因爲行軍，冬季駐營，和鬪爭情形之下，直接受到牽連的時候，纔參與戰爭。法國革命的動員了完全不同的民衆力量到戰場上去，可是這種戰爭也還沒有獲得如克氏所說的「抽象的」或「絕對的」形態。一八六六和一八七〇與一八七一年的戰爭，整個說起來，牠們的本質還沒有發生新的變化。只有法國當時在綱白達（Gambetta）領導之下，戰爭獲得了一種新的形式，表

示如何把民衆捲入戰爭，給作戰一種爲我們平常未曾見過的力量。德國一八七〇與七一年的用兵者對於這種新現象完全手足無措。戰爭於當時的德國只成了軍隊的事情，這都因爲還沒有脫掉克氏戰爭性質學說的原故。世界大戰比之近一百五十年的戰爭，卻表示完全不同的性質出來了。不只是各國參加戰爭互相攻殺之軍隊，而各民族本身也被置於戰爭服役之下。戰爭也就是針對着這些民族本身，使他們受到最深劇的牽連。在我的戰爭回憶中對於這個戰爭曾有如下之描寫：

「陸軍和海軍也和從前一樣互相攻殺，也許戰鬥力和戰鬥器比從前來得強大些。但是有種與從來的戰爭完全不同的事實發生，就是各國民族都聚集他們所有的力量緊緊地站在軍隊後面，深深地浸入到裏面去……」

什麼地方是陸海軍力量的開頭，什麼地方是民衆力量的終結，在這次戰爭中是分別不出來的。軍隊和民衆融合爲一。世界真正看到了民族戰爭（Volkkrieg）。地球上的強國，就在這樣聚合着的力量中互相對峙。伴着向敵方戰鬥力在廣場大海之上作鬪爭的，就是向敵方民族之心理和

生命的鬭爭，以達到使之分解和痲痺的目的。」

這種全民族的戰爭不只是軍隊的事情，而直接影響交戰民族中每個分子之生命和精神；牠不是因為變動了的政治——就是猶太民族和羅馬教堂日益明顯地追逐權力，日益鮮明地表現那種魚肉各民族，使反對者喋血亡身的野心。——卻是因了在人口增長的數字下普遍兵役制之施行，及那種摧毀一切的戰具響影之加劇而產生出來的。自從那種可向居民投擲各種炸彈、傳單、及別種宣傳材料的飛機之改良和擴張後，及那種向敵方散佈宣傳的無線電臺及別種器具之改良和增加後，這種全民戰爭更加深入化了。世界大戰中，敵對軍隊接戰於廣袤數公里的火線之上，這些戰事地帶就如戰爭本身一樣，極度波及到該地居民。將來的戰爭還不止此，牠將要真正開展到交戰民族之全部國土。現在不只是軍隊，各個民族因了間接的手段，如飢荒封鎖及宣傳之類也受到牽連，同軍隊一樣被置於戰爭行動之下；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這正像戰史上講的那些在礮臺裏被包圍的居民，因為戰爭窘迫及生活困難被迫而出獻臺時一樣。所以全民族的戰爭不只是針對着軍隊，也是針對着各民族自身。牠是一種嚴格簡明的實際。一切凡可思議的戰鬭

工具都被置於這個實際底服役之下，而且必需置於牠底服役之下。俗語說的『有來必往』的報復手段更適用於全民戰爭，因為這樣纔可以製造出交戰民族間之強大的緊張空氣。（註一）根據全民戰爭的本質，於是決定這個戰爭只有在民族之生活維持受到威脅，而且決定擔負這個戰爭的時候，纔能施行。內閣戰爭及那種有限的政治戰爭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那些戰爭大都是搶掠戰爭，不像全民戰爭爲民族之生存保持一樣，具有一種深刻的道德上的理由。所謂『殖民戰爭』就是一個民族或種族在這個戰爭中爲了生存保持而鬪爭，敵人在這個戰爭中可以簡單地粉碎他們，對於該民族或種族具有全民戰爭的性質，而被他們根據道德上的理由實行起來。反之，那就會是一種最不道德的行動，沒有資格受得起『戰爭』這個高尚莊重的名詞，譬如那種因了利潤狂不是因了民族之生存保持而掀起的殖民戰爭。（註二）

從全民戰爭之特質上，必須嚴格地得出這種深刻的結論。

自從克氏以後，近百餘年來戰爭的本質已經變化了。政治與用兵的關係也變化了。首先政治本身就必需得變化了。我上面引證戰爭論一書時，就指出克氏當時怎樣着想政治與用兵的關係。

實際上他着眼的只是那調節各國間關係，宣告戰爭及締結和平的外交。對於別的一種『政治』，他就根本沒有想到。他把這種外交的重要性遠置在戰爭的重要性之上。然他的意見，戰爭和戰爭領導都要極強地從屬於外交。他後來對於戰爭領導，就是對於統帥纔稍爲讓了一點步。

爲了更明白地理解克氏的思想過程起見，我現在再引證他的戰爭論如下的幾段：

『我們看見，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的動作，而且也是一種政治的原素，政治交通的一種繼續。換句話說，就是一種用別種手段來實行的政治交通。人們現在把戰爭看作特別的，不過只是關於牠底手段的特殊性而已。要政治之動向和意旨不和這種手段相矛盾，是戰術在一般的，統帥在個別的情形之下可以要求的。這種要求的確不是細小的事情。可是儘管在個別情形下這種要求如何反影響到政治的意旨，這只得作爲政治意旨之一種限制着想。因爲政治意旨是目的，戰爭是手段，決沒有無目的而可以想出手段來的。』

克氏別處又說道：

『重申一遍：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工具。牠必需帶有政治的性質，用政治的尺標來度量。在大體

上，領導戰爭的就是政治本身。這兒毛錐換了寶劍。可是政治并不因此就不照着牠本身的法則思想。』

或許克氏有時也躊躇過外交這種優越的地位。他在別個地方雖然未抓着事情的中心，卻寫道實際不只是外交，而是關係全部國家政治：

『政治對於某種戰爭之工具和方法，常常得到一種錯誤的，不適合於其性質的影響。這就說明領導外交的人對於軍事之某種認識是不可缺少的。』

領導外交的人不只是對於軍事要有認識，以便適應戰略上的要求領導外交，而且首先要認識這種戰爭所具有的特質。要認識由此產生出來的，政治爲了領導全體民族，爲了民族之生存保持必需完成的任務。此外，這兒所需要的還不只是政治家『某種的』認識而已，而是全體民族在其悠久的世代嬗演中應留心培植和保持的普通知識。

世界大戰前及大戰的時候，政府官吏，甚至許多軍官，因爲拘泥於克氏學說的緣故，對於這種重要的事情簡直茫然無知。他們都不了解現在政治已經遇到完全新的任務了。當時民衆也不了



解戰爭將要怎樣向他們要求，而且已經怎樣向他們要求了。政治家在世界大戰時應當全部開展民族的生命力量，努力健全他們的生活形態。民族也應當懂得在那個時候，他們須得統一起來，把他們最後所有的一切，甚而他們的生命都拿來供獻於戰爭。我在我的戰爭回憶中對於樹立這樣的民族生活形態和政略寫了一個大綱。我特別注重民族的精神力量。克氏在其戰爭論中絲毫沒有提到，然而戰爭在實際上卻極度需要這種力量。當綠體細（Lütich）地方的戰爭開始頭幾天，我就經驗到了。我在上書中寫道：

「這個世界的和民族的戰爭向我們德意志人要求非常的東西；牠用全副重量來壓在我們的身上。我們要想贏得這個戰爭，就需得每個人都拿出最後的所有來。我們真正要如俗話說的，鬪爭到最後一滴血，工作到最後一滴汗。同時，我們要強化鬪爭的意志，而且更要堅持勝利的歡欣，始終不渝。縱然敵人給我們生活上的困難非常大，縱然他們那種外面不甚注目而實在力量極大的宣傳非常猛進，然而貫徹上述的要求卻是急不可緩的。

陸軍和海軍就好比橡樹生長在德意志的土地裏一樣，他們的根株也發源於我們的祖國。他

們依靠鄉里而生活，從鄉里中吸取力量。他們對於需要的東西，只能獲得而不能生產；只能用鄉里給與他們的精神的，物質的，及生理的力量來奮鬥。後者有了保證，纔使得陸海軍能够奪取勝利，能够整日在鬪爭和戰爭之勞苦中發揚高尚的捨己主義，和大無我的犧牲精神。只有他們纔能保證德國最後的勝利。我們祖國就用這樣的軍隊向世界作乾坤一擲的巨人鬪爭（Titanenkampf）。雖然我們當時還可得同盟國的幫助，在適合陸戰法則的情形之下，被佔據的地方也被利用起來，然而這些都不是主要的。

陸軍和海軍所以必需經常從鄉里中取得新的精神的緊張力，人員和戰具的補充，由此而加以不斷的革新。

國內的精神狀態和戰爭意志也必需堅持到底。假使這方面受了損害那就不堪設想了。戰爭越是延長得久，這邊的危險就越大，而這種危險就越需要克服。同時陸海軍對於精神和道德強化的要求，就愈趨急迫。

祖國的人員和物質的力量——我現在還特別申明加上精神的力量，對於作戰時須得極度

加以展開和保證。

上說的事情就是鄉里的偉大任務。我們堂皇的軍力就根據這個基礎上面，這是不容許發生些微裂痕的。牠並且還是力量輸送的淵源，須把牠保持得銀色一般的透明，冷泉一般的清潔，海潮一般的汹涌。藉此纔可以鍛鍊陸海軍的神經，不斷地恢復他們的力量。他一方面，民衆也要有一種內在的力量，然後纔能够不斷供給陸海軍以力量。民衆和軍隊的力量就這樣交織和融合起來，我們簡直不能把牠們機械地分開。同樣，敵方軍隊的戰鬥力也是由敵國內民衆的戰鬥力來決定的。我們看見，我們國內紛攘着一種爲戰爭的工作和生活，這是從來未曾有過的情形。政府，特別是負責的內閣總理，就必需領導這種生活和工作，而且竭力使之發展。……當時除了使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力量聽命於皇帝奪取勝利於戰場之上而外，就再沒有向政府比要求上說的還更大更重要的事情了。……此無他，作戰力量先根據在鄉里，然後纔表現於與敵人搏戰之火線上。」

這樣偉大的任務，就是政治，政府，和民衆在世界大戰時須得完成的。假如在將來的戰爭中，民衆還不只遭受飢荒封鎖及反宣傳，而且直接受到戰爭行動的牽連，那麼，完成這種任務就更加困

難了。將來的戰爭比之世界大戰，對於民族之精神，生理，和物質力量之準備，將要求得更加厲害。軍隊與民衆的關係，具體點說，他們精神統一的關係在將來只有更趨強化的，遠甚過一九一四及一九一八年時的情狀。我們看見，當時敵人很有成績地摧毀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統一。這樣的手段在將來除了實際消滅敵方軍隊之外，也形成一種與敵方作戰的重要的活動。世界大戰後，我在我的戰爭回憶中曾寫道：

「德國不也應當如自己每天所感受到的一樣，運用同樣強有力的戰具，就是對敵方的本地戰線作鬪爭麼？不也應當對敵方民衆之精神狀態施以打擊，如敵人這樣很勝利地對我們施行的一樣麼？這種鬪爭從本地出來，越過中立的國家，然後就從這條火線到那條火線，疾風迅雷般地進行着。總之，德國缺少了一種宣傳的強有力的輔助武器，實施對敵國居民的飢荒封鎖。」

全民戰爭只要一經實行時，根據牠的本質就真正需要作戰民族的全部力量。

戰爭的本質因了不可改變及不可挽回的事實之影響而變化了——我想說有規律地變化了，——於是政治任務的範圍也必需擴大，政治本身也必需變化。政治應和全民戰爭一樣具有全

民族的性質。政治必需顧及一個民族在全民戰爭中的最高能率，成爲民族之適合生存保持的學問。要詳細考慮什麼是民族在生活的各方面——精神方面也在內——對於生存保持所需要和要求的東西。因爲戰爭是民族爲生存保持之極高度的緊張表現，所以全民政治必需平時就着手民族戰時生存鬭爭之種種準備。把這個生存鬭爭的基礎鞏固到一種強度，使牠不會在嚴重的戰爭情形之下而移動，殘缺，或因敵人的伎倆而致完全覆滅。

戰爭本質變化了，政治本質變化了，因此，政治與戰爭之關係也需得變化了。我們要拋棄一切錯誤的克氏理論。戰爭和政治都是致力於民族之生存保持。然而戰爭是民族生命意志之最高度的表現，所以政略須從屬於戰略。

各民族越是恢復了他們的種族意識 (Rassebewusstsein)，潛在其中之民族魄越是飛揚激盪起來；越是民族的生存條件各方面都被認識清楚；越是那種超國家的力量，猶太民族和羅馬教堂之摧毀民族的行動，凌越各民族的世界權利之野心，及其採取的政治途徑被燭照無遺；那麼，就自然會產生出一種這樣的政治出來，盡力於民族之生存保持，適合全民戰爭之一切要求。這種政

治，就簡單成爲現成的民族政治，鞠躬盡瘁於戰爭。因爲兩者都具有同樣的目的，就是：保持民族  
(Das Volk zu erhalten)。

(註一)一切裁軍會議都侵犯了民族自存義務(völkische Selbserhaltungspflicht)之神聖的法則，所以都終歸於失敗的。只有排斥猶太和羅馬的帝國主義，喚起各民族底民族性的覺悟(völkisches Erwachen)纔能够招致和平。

(註二)世界大戰時北美合衆國在歐洲土地上進攻德國民族的戰爭，對於美國就具有這種殖民戰爭的性質；牠用此來救護美國的世界資本家貸出去的資本。

## 二 民族之精神統一 是全民戰爭之基礎

軍隊本源於民族；牠是民族的一部分。民族之生理的，經濟的，和精神的強弱，也就決定全民戰爭中軍隊之強弱。精神力量給軍隊和民族一種在爲民族之生存保持鬪爭中所需的統一。加之這種戰爭不是今天起頭明天就完了的，牠是可以牽延很久的。因此精神的力量對於爲民族生存保持的戰爭之終局，也具有決定的作用。我們看見，現在沒有一個國家肯使軍隊的武裝，訓練，和設備有不完備而落在人後的。然而只有精神統一，纔可以使民衆經常地輸送新的精神力量給百戰的兵士，使民衆爲軍隊而勞動，縱然在戰爭困難及敵方直接的戰爭行動之下，他們也堅持勝利和反抗的精神。自然，平時軍隊在民族之精神統一中佔據一種特殊的地位；可是一當動員令下，從豫備軍中抽調整百萬的男性同胞出來加強正規軍的時候，這種特殊地位就會失去，慢慢地，戰爭愈久愈是如此，一直到民衆之精神狀態成爲軍隊之精神狀態。而且只要火線上沒有勝利消息傳達精

神力量給軍隊和民衆的時候，前者就完全支配後者。

一八七〇和七一年的戰爭，德軍自一八七〇年八月六日斯匹寫耳恩 (Spichern) 到九月一日和塞丹 (Sedan) 的勝利後，不過幾個星期，就使法國政府與陸軍的聯繫失落了。法國在當時實在也別無出路。於是皇帝拿破侖第三退位。猶太人綱白達乘時而起，恢復民衆與軍隊的精神統一，發展法蘭西的民族力量。一直到共產主義革命爆發，也終未能達到破壞這個統一的目的。

世界大戰時，起初在德國方面，皇帝、民衆和軍隊都是一致的。社會民主黨在動員一開始的時候就想破壞，這種社會主義的革命化慢慢地，在民衆中發展起來，漸漸從民衆中經過後備隊和休假者的階層侵入到軍隊裏去。當我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被解職，及十一月十日皇帝被他的軍隊捨棄，甚而因軍事領導的勸告離開德國的時候，革命化就已經變成革命，奪去了民衆和軍隊的抵抗力，其結果就是軍事上的敗北。戰爭是失敗了，舊的軍隊已不復存在，德國民族的武裝被解除了，任何精神上的統一都掃地無餘。

俄國自戰爭開始後到一九一七年三月，激進的團體在二年半之中，藉軍官的幫助推翻了沙



皇帝制革命發展到軍隊裏去。軍隊的解體與布爾塞維克在民衆中的發展取一致的步驟。沙皇的軍隊消失了。布爾塞維克黨徒居然不爲敵方干涉所逼，陳列出一個新的軍隊，不過這個軍隊和民衆沒有多大的關係而已。

法國、德國和俄國革命的原因，照一般流俗之見，都歸源於「國內政治」方面。好像在這三個國家中都因爲不滿意的民衆階層起來推翻了現存的國家和社會形式。他們把戰爭的罪惡和苦痛都歸咎於政府，所以要發洩這股怒氣。但是據我看來這些事變還有別的原因存在。

法國裏面猶太人和祕密共濟組合員（Freimaurer）藉外界中廣汎不滿者的助力，推翻了耶穌教人的統治權。同樣，這些不滿者因了這種政策，所以對於拿破侖皇帝也日益明顯地採取反對的態度。不滿的情緒已如怒潮一般澎湃於民衆之中。法蘭西民族在德軍威逼之下，煥發出民族的精神，迸出沉雄有力的呼聲。這纔使得猶太人與祕密共濟組合員抓住這個機會，同時在達到他們本身底目的之下，發展法蘭西民族的抵抗力量，然後藉此接收耶穌教人統治法國民族的遺產。

德國的猶太人和羅馬教堂及他們手下的黨羽，利用當時德國社會和經濟的困難情形來破

壞民族的統一。然而實際上這些困難情形正是他們促成的。他們競於權利之渴逐，一方面是純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世界金融的支配者，他方面又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體化學說的支配者。於是他們造成各民族經濟和社會危機。各民族都絲毫不加覺察，懷着無限的希望，努力獲得那種幸福的約言，然而實際上卻替這些超國家的勢力造了機會，反而促成他們自身的奴隸化與分裂化。此時猶太人和羅馬又侵入其間，使這種分裂更加深入，以致後來民族因為生理的、經濟的和精神的力量全體破壞，完全失掉防衛力而被集體化了。現在就讓他們或者消失在羅馬的天國裏，或者猶太的世界共和國裏去。（註一）皇帝與他的軍隊分離，隨後皇帝之被推翻，與舊軍隊之被消滅，都只是達到目的底一種手段而已。在猶太人和羅馬的利用工具中，一部分是自利的，各種玄秘化，癡呆化，祕密共濟組合化了的，被誤引導了的智識分子；另一部分是真正不滿的工人羣衆，及受羅馬教訓練慣了的德國人。這些德國人同樣履行上帝的意旨，但是他們卻反對國家和軍隊。德國的政治家在世界大戰之前，對這些分子的活動袖手旁觀完全不加禁止。把民族無抵抗地交付在猶太人和羅馬，及他們那些祕密共濟組合化了的，神祕化了的，和羅馬教訓練慣了的徒衆之掌握中。

這些徒衆一部分或者結合在祕密社團裏，或者一部分也潛伏在軍隊裏邊。由此造成了精神上的分裂，我們在大戰之前就看得很清楚了。本來軍隊就他的本身講，是不管這些事情的。不過德軍正因為根本上就完全忽略了這點，所以收得這種不良政策與現象之結果。現在我們具有一切理由注意這種重要的事實，及其將來對於作戰之可能的影響。不過當時的情形不同，當時不但說是『沾惹政治』，就只要你指示分裂現象的真正原因，就已經成爲罪過了。當時的德軍只受過一種帶有帝制意味，完全不充分的課程，居然就奢望他們的精神如何堅定，而且還要新兵的精神也一樣強化，豈不是太滑稽的事情嗎？德軍本身及一大部分德國民衆都是完全脫離政治生活的。他們當時也不認識民族生活的基礎。我們因此可以原諒當時這些實際行動者，然而我們卻不可以原諒當時那些對於民族破壞者的活動不注意，無辦法，袖手旁觀的政治家。那些破壞者真正是爲所欲爲，但是當『威脅的戰爭危機』爆發及動員開始的時候，破壞者的計畫終竟失敗了。可是這並非政府或軍隊的影響使之然，而是由於德國民族精神之覺悟。此時那些被誤引導了的工人羣衆不去實踐他們所希望過的職務，或者反對徵兵，或者作出破壞動員和開拔的行動，反都起來獻身

於民族和戰爭。

在民族之生死困難中發出來的民族精神之呼聲，和廣大民衆對於作戰之自覺的努力，與德軍作戰之成績，又防得一個時期，使破壞者不能實現他們的企圖。當時這些破壞者也利用德國民衆和軍隊的力量，打倒素來仇視他們的俄國。一九一七年他們把事情弄成功的時候，他們就公開開始破壞工作。毀滅民族的精神統一，逐漸降低民衆對軍隊的工作效率，輸送革命意識到軍隊裏去，破壞軍隊的抵抗力。我當時頒行一種在比平時更廣大的基礎上的愛國課程，用以振起軍隊中那種頹靡渙散的精神分裂之初步現象。可是這種手段也是不充分的，因為那些規劃課程的軍官本身就完全缺乏政治和民族的教育，所以對於此道也茫然不識綱領。後來精神上的破壞作用，一天比一天地明顯起來。起初我還把這件事情歸源到敵人的飢荒封鎖與反宣傳上面去，這種影響無疑是存在的。但是比這個危險十倍的卻是猶太民族和羅馬教堂潛伏在民衆中間的徒衆，及他們在政治的經濟的及『世界觀的』黨派裏，或會社裏的走狗們之活動。後來他們和敵方宣傳一致工作，簡直成爲敵人極有效的傳聲器。一八二六年甘寧爵士（Lord Canning）已經說過，英國

具有風神「埃阿魯士的管」(Schlauch des Aolus)他隨又說道：

「假使我們參加一個戰爭的時候，我們將要在我們的旗幟下聚合起一切不安靜的和不滿的人，不管這些人與我們作對的國家有無直接關係……」

世界大戰時，我們的敵人就依着超國家勢力的詳細指示這樣實行起來。因為民族完全了解個中的原故，於是因了一些誹謗和預約，就輕易地斷送了那無價的精神統一。當時政府對於這事情仍然沒有辦法，也許是故意的袖手旁觀。不管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牠總不向民衆解釋，現在的情形是如何嚴重，現在應當施以救濟。於是不幸的事件就必然地到來了。民族的精神統一絲毫無防衛地失掉了，隨着民族的抵抗力也消失了，隨着軍隊的統一也鬆弛了，瓦解了。雖然還有一部分軍隊對抗敵人時，還建立了許多英雄事績。結果德國民族被解除武裝，斷送在猶太民族和羅馬教堂及敵國民族的追獵之下，一任其宰割。

關於俄國革命的過程，我現在只簡略地提一下。猶太人，祕密共濟組合員，和羅馬教堂利用那些爲他們素所恐懼的，誤領導了的俄羅斯民族之廣大羣衆，利用這些羣衆底合理的與不合理的

情緒，推翻了沙皇制度，消滅了沙皇的軍隊。布爾塞維克革命用非常殘酷的流血和強姦手段來消滅俄國民族的力量，使得後來俄國民族慘遭猶太人的屠殺，羅馬教堂也懷着偉大的希望袖手旁觀。

奧國和匈牙利革命的性質又稍爲不同一點。當時在羅馬尼亞人，塞耳賓人，哥亞頓人，斯拉夫人，及捷克人中間都活躍着民族的力量。但是他們也和一八七〇及七一年時法國的情形一樣，被猶太人利用來鞏固對所謂「解放了的」民族之統治。我在這種簡單摘要中所給的事實，都是嚴重的戰爭經驗。我重述一遍，用以指示究竟那些使得民族精神統一解體，軍隊瓦解的「不滿者」——借甘寧爵士的話來說——是些什麼人。軍隊無論如何須有一個精神統一和堅強的民族爲後盾。只有在這種情形下，一個軍隊在開始的迅速突擊裏就能够摧毀敵方的軍隊和民族，也許民族精神統一沒有那麼決定的意義。但是這種情形是很難有決定把握的；尤其是和一個優越的勢力作鬪爭的時候。並且還要顧慮到，「不滿者」在戰爭開始時就在國內四處活動，足以消滅突擊中的勝利希望。越是這種可能性存在，敵人就越是要利用牠，越是企圖從戰爭開始就制服敵對的

民族好了，讓我們繼續談戰爭經驗吧。

一個民族最急迫的任務，就在認清他們統一底無情的仇敵與使他們分裂的原因；要知道怎樣採取適當對付的手段，怎樣達到民族的統一。全民戰爭領導者最迫切的任務，就在向全民政治領導者要求實行統一民族之義務。末了，不只是對於民族統一的敵人，對於這種統一的本質和基礎也應有正確的觀念。

譬如意大利和蘇俄在其疆界之中是一個統一的民族。但是鋒利的目光就可以發覺在這兩個國家中存在着的民族分裂之緊張情形。只要戰爭一爆發，這種分裂馬上就會實現。一種從外面用強制手段造成的民族統一，民族精神不是由自覺種族生活與宗教生活之共同性參與其間，不是民衆和軍隊在戰爭中所需要的統一，而是一種機械式的製造品，是對於政府和國家的一種危險的幻影。

日本民族的統一就與此完全不同。這種統一是一種精神的，而且主要是根據在神道信仰上面的統一。神道信仰使日本人強制地服役於天皇，由此保持與他們祖先接近的生活之道。日本人

的宗教生活規定他們服役於天皇和國家。日本人這種由種族遺傳來源的神道信仰，完全適合於他們民族和國家的需要。現在我們看到，日本人怎樣的理會這點，怎樣在日本鮮明地注重神道信仰，不許辯論天皇的神聖性。日本民族的力量就建築在這個種族遺傳和信仰的統一上面，與根據在這個上面的生活形態之中。自然，日本的神道教也和任何其他宗教一樣，潛在有一種對於日本民族嚴重的危機，然而我在這兒卻不能詳談了。

基督教的民族就不能像日本民族處在那樣幸福的情形下，具有一個本位的信仰，以政府與民衆，民衆與軍隊，及全體民族生活之統一爲基礎。基督教本是一種信仰外來的教，這和我們的種族遺傳立在很深刻的矛盾中，戕害我們的種族遺傳，劫取民族之本位的精神統一，使他們失去防衛能力。這點我以後還要詳細說。猶太人和基督教堂只有萬不得已時纔承認民族的價值，他們也不能夠完全抹殺血統的關係存在。但是，他們隨着又利用這點使民族互相仇敵。基督教對於民族中個人的作用也同樣爲害不淺。照基督教講，只有猶太民族纔有遵照他們民族特殊性而生活的權利。



我很費了幾番沉思熟考纔認識猶太民族及羅馬教堂怎樣在世界大戰時，劫去德意志民族生存鬪爭中的統一。我從最嚴重的戰爭經驗上及歷史材料中，特別是聖經的研究上面更加深了對於上面的認識。在聖經裏面毫不掩飾地載着猶太人的目的，同時說明基督教不外是爲此目的而說的一種宣傳學。聖經是需用一種清楚的，沒有被教士的影響弄昏了的眼睛來讀的。

我們要想對於『民族保持』具有清楚的意識，就不可以不考察基督教的價值和牠的作用；因爲這個對於每個國民的生活形態與生活觀念，及他在民族中的地位，與乎在最嚴重的時間需爲保持民族而鬪爭的民族精神統一之成立和維持，都具有決定的作用。（註二）經過嚴重考查的結果，得出如下的確定：就是基督教不是別的，是猶太人和羅馬教堂在失去民族特性而被集體化的民族上面，建立『世界共和國』或『天國』的一種最適用的宣傳學。

舊約全書（註三）裏面明白的載着猶太人的民族神而基督教徒的世界神耶維（Jahweh）如何指示天選的猶太民族統治各民族，及達到此目的所採取的道路。羅馬教皇爲了使得教士政治之合理化及利於實行起見，也利用這種指示作爲上帝的誠條。因爲要想當着那些具有反抗精

神，生命意志的民族實行教說起見，於是就劫去每個基督教徒任何民族和種族的感覺。同時指示他們，人間生活的意義是在尋求一個永久的，幸福的天堂生活，作爲履行耶維誠條之報酬，否則因違背誠條之故，將被判決永劫的地獄刑罰。人間生存對於基督教徒只是一種到永久的天堂生活，或永劫的地獄刑罰之過渡形式。這種天堂地獄說，使基督教徒變爲非常自利。因爲他，只有他個人，在短促的人間生存之後，還有永遠的天堂或地獄生活，還須享受福祉或遭受懼恐。於是基督教又由牧師以耶維代表的資格，指示單個基督教徒怎樣作就可以昇入天堂，怎樣又可以免墮地獄。使他過着一種與國民同胞的精神生活完全隔離的，精神上的分離生活。這種人是很容易從他們的民族中『解救出來』的。這種『被解救出來的人』就應當伏首帖耳如馴犬一般地受牧師領導。天堂希望與地獄恐怕實際上不過是這麼一種工具。但是這個還不够，還需得使他們完全無防衛，無抵抗能力。因此基督教又向教徒說，上帝在冥冥之中決定他們的一舉一動。世界大戰開始時，往往發生如下的事情：雙方交戰的民族，都向耶維，就是那個想他們屈服在猶太人和牧師統治下的神，祈禱勝利。基督教徒對於遭遇的不幸也要感謝耶維，因爲他認爲這種不幸是耶維賜給他的特

別的愛，而且不幸越大越如此。於是他對於失敗了的戰爭之悲慘情景也要感謝。因為照他的信仰，耶維給與他這樣的不幸，正是用來特別鍛鍊他和他的民族臻於幸福之境的。基督教徒毫不思索這種教說的結論與民族自由意志的要求立在矛盾中。於是在神的體驗方面，必然成爲無思想，無批判的人，成爲牧師手中馴伏的，無防衛的，缺乏思想的工具。末了也就是猶太人和羅馬教堂同樣的工具。繼續這樣影響下去，就可以任意頤使基督教徒，不管是反對自己的民族或別的民族都好。這樣基督教纔完成了牠的任務。世界大戰時，基督教的民族受『不滿者』之影響而土崩瓦解，就不言而喻了。基督教與遵照這個教的生活形態，就是構成戰爭困難中民族崩潰之最深刻的原因；加之猶太人和羅馬教堂還推動這個崩潰過程。

世界大戰時，我們是一個基督教的民族，實際上許多德國人不過名義上如此而已。我們建立了驚天動地的事業。但是並非因爲我們是基督教徒的原故，反之，卻是我們民族精神之覺悟，掃蕩了基督教的污漬，向德國人高呼，激勵他們起來爲民族的生存保持而鬪爭。戰爭繼續進展中，這種民族精神消失了。這個嚴重的戰爭經驗就分明告訴我們：基督教不是保證我們民族堅忍持久的

宗教，更不是我們當『不滿者』風起雲湧時所需要的宗教。單就其外來性說，基督教也不能如此。關於這點，俄國民族也是一個最嚴重的證明。雖然有些基督教的民族勝利了，但是這只因爲他們不像德國和俄國民族一樣，處在那種嚴重的實驗之下，而且也未發現分解他們的事情。如果企圖把這種玄怪的基督教用另一種玄怪的狂妄教來代替，這就無異乎把錯引導了的民族從雨中領到檐溜下去。

德國軍隊和民衆四年的抵抗，（我附帶說明，這是因爲探冷堡的勝利及我領導德國陸軍而成功的。）世界戰爭中民族之生死困難情形，與全世界神的體驗之生死困難情形，發展了德意志民族的種族覺悟（*Rasseerwachen*）。那種比從來更鮮明的種族遺傳（*Rasseerbtgut*）與民族精神，又出現到我們的意識上來。我們要求民族的生存保持，還要求在本位的神的體驗下之下的神的保持（*Goterhaltung in arteigenen Goterleben*）。本位的神的體驗纔使種族覺悟臻至美至善之境。這裏開闢了深刻的精神上的先例，指示我們共同種族遺傳的民族所由之道。使他們更清楚地認識民族中精神上的關係，與種族混和及外來信仰的不幸。使他們能够用鋒利的目光在

歷史和自然的認識中，在人類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典籍裏去研求探討，就如我的夫人在其具有遠大哲學認識之著作中表現給我們的一樣。（註四）民族的精神統一，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會仍然是實行全民戰爭之基礎。這只有從種族遺傳與信仰的統一，及留心觀察種族遺傳之生物的精神的法則和性質，纔能達到目的。現在基督教的北歐民族之顛撲不破的統一，只有俟種族遺傳的衝動與從神的預感（*Gottahnen*）到神的認識（*Goterkennen*）符合一致時，纔能達到。這對於他們，也像對於日本民族及別的種族和民族一樣，都潛蘊在精神的根源與本質中，及民族精神之本質和活動中。這個真理數百年來被基督教劫去了。藉此奪取我們民族的統一，引渡我們到猶太人和教士之奴隸統治下去，使我們不克為我們的生活形成發揮統一的生命意志。

每個種族遺傳都潛蓄着一種本位的神的體驗。日本具有一個與北歐種族不同的神的體驗。因此我們血統的民族之統一，也具有一個與日本民族不同的基礎。譬如在日本民族中支配着的強制性，就會被我們的種族遺傳拒絕，但是同時我們的種族遺傳也拒絕那種自由主義的，超世人運命，而必然得到基督教培養的自利心之自由。德意志的神的認識（*Deutsche Gotterkenntnis*）

如像我夫人在她的書中所寫的一樣，證實了種族遺傳，與那個對於民族保持之本位適應的神的體驗，及那個由其內部精神統一而生的民族防衛力之重大意義，而且與之吻合一致。但是牠不是建築在一種神話結合着不可實驗的天上約言上面，卻是建築在自然科學對於人類和民族精神之正確的認識上面。牠不說地球上不可實驗的話，也不作不可道的事。牠拒絕任何干涉和強迫，是每個人最切身的事情。牠不像日本民族一樣，大半是民族的事情，因此牠走民族保持不同的道路。牠把每個生命有限的人牢牢地締結在生命無限的民族中，把對於民族的嚴重義務加在他的肩膀上，使他有時犧牲生命來履行那種義務。使民族在悠久的世代嬗演中真正成一個具有防衛力的生命意志的運命共同體（借用這個很被濫用了的名詞）；就是一種純靠自己，感到自己負有責任，不希望『元始意志』，或『神意』，或神的干涉的運命共同體。德意志神的認識使民族保持超出那種怪誕的，日本的，或唯物主義布爾塞維克的強制性，及那種基督教的自由主義的自由。牠要求行動的自由，承認為民族保持所需的道德上的強制與國家的領導。但是，除此之外，牠拒絕一切任何強制，反對一切任何對神的體驗之干涉。歸納起來：道德上的自由再加上一種民族法的保證，

就是我們民族生活形態中，本位的神的體驗之外部的表徵，及國民同胞滿意與民族統一之基礎。上面我探討了德意志民族精神統一之目的和基礎；指示怎樣可以造成這種精神統一；闡明全民戰爭與全民政治的領導者所應採取的步驟。只有一個在精神生活中具有堅深不拔的統一之民族，纔能實行全民戰爭，纔能在戰爭中各方面作軍隊的後援，擔任全部戰爭的萬鈞重量。

神的體驗對於民族之生活形態與生存保持的意義，沒有人可以忽略的。前者是後者的基礎。猶太人和基督教教士都曉得這點，然而基督教使民族和人們忘卻牠，後來種族覺悟纔仍然喚醒他們這種認識。

保證德意志神的體驗與構成我們民族精神統一基礎的德意志神的認識，和其他民族任何神的體驗一樣，對於民族的生存保持，不是發生『抽象的』而是發生創造的推進的影響；我下邊還要指出來，牠甚而對於軍紀與軍育，及在全民戰爭之千鈞一髮的關頭也發生同樣的影響。

遵照本位的神的體驗而形成的生活，就在於培植出健康的人種，使他們嚴持意志操守，成爲完璧的，爲義務而生存的，辨別民族仇敵的民族同胞。保護青年的精神和體力不受各種戕害；同樣

對於壯年的民族同胞之精神和身體也施以保護。基督教視爲天選國民的患神經病的怯懦男女，及那些相信預言，占星，神託，及創造運命之神的種種奇怪病者，這些在戰爭的緊急狀態下都足爲民族保持的絕大危險。尤其是向他們提出此時的嚴重要求時，更可以期待着不幸的事件發生。全民政治的任務，就在於明瞭這些事情，在戰爭危機還未威脅的時候，就應當防患於未然，貫徹牠對於不死的民族之義務感覺上所應有的任務。

我們需有一個精神卓越，身體健康的民族，可以整年整月在極度力量緊張之下，輾轉鏖戰，抵抗敵人挫傷敵人之意志，在火線上面或火線後方，甚或在敵人手中反抗戰爭的不義。認識一切威脅的危險情形，而且對於隨戰爭之延長而容易產生的懷疑蠱惑，處之夷然，不爲所動。全民戰爭是最不容情的。牠向男女國民都要求極度的力量，因此牠不只是對於男人，對於威脅子女，損害丈夫的女人也一樣反對。女人須對於民族統一證明她的無量的精神力量。當具有作戰能力的男子出戰或者履行別種軍役時，她只有靠自己，而且也需得爲民族和軍隊實行國民經濟方面之活動和工作。女人在全民戰爭中負有重大的責任，她對於人口滋長負有重大的責任。她生產孩子時以



她的生命作孤注一擲，正如男子犧牲生命爲民族保持而戰爭一樣。但是，猶太的，基督教的，及他種奇怪的觀念，就說是女人的權利被剝奪了。他們常使她成爲姦惡教士手中的僞女信徒，及流氓惡漢的無意志的工具。二者都想使民族運命趨於滅亡。照德意志神的認識而構成的世界觀，承認女人和男子各具不同的本質，然而把她的位置平等的平列在他的旁邊。不只利用她特有的能力來繁滋民族，而且還利用來保持精強力壯之民族生存。使她和男子在戰爭之困難情形下，同爲民族精神統一之保持者。德意志孩子之慈母心中迸發出的民族精神之雄壯呼聲，特別可以使她勝任這種職務。全民政治爲使得民族能够在全民戰爭中繼續發揮極度的緊張力量，就必需把視線鄭重貫注到女人在民族中的地位問題上。只有她不是被置在一種比男人和孩子的劣等關係之下，而是獲得一種適合我們種族遺傳與男人平等的地位時，牠纔可以貫徹她的任務。

全民政治 (Die totale Politik) 必需適合嚴重的，民族的，軍事領袖也在同樣範圍內參與其解答的問題。在民衆還沒有把民族政治的本質對於戰爭的意義認識清楚時，國家可以中止或者稍緩其實行。但是一經明瞭全民戰爭與全民政治的本質時，一種遲疑或怠慢就不許可了，因爲這

可以極危險地影響到軍隊和民族的身上去。任何人也不曉得全民戰爭中要求民族最高能率的那一瞬間是多麼快地到來。

自然，國家（這就是說全民政治）與全民戰爭之戰術，須採取特別的手段。譬如嚴厲的新聞檢查，加重懲罰洩露軍事祕密的法律，實行封鎖中立國家的邊境交通，禁止集會，拘捕「不滿者」的首領，監視鐵路交通與無線電事業等等。「不滿者」或者惡意破壞者常常自動地，或者受交戰的敵人，或者受超國家勢力如猶太人和羅馬教堂之指使，或者受直接的敵方宣傳，總想使民族統一不能實現，或者破壞這個統一。因為這個關係民族的保持，所以須用最嚴重的，最嚴厲的手段來處置他們。就是在一個把生活建築在種族認識與本位的神的體驗，因此也就是建築在健康的基礎上面的民族中，也包含着破壞民族保持的惡劣分子。這需用預防的手段，如刑罰威嚇來制止其破壞民族的行爲。本位的神的體驗也不外是給民族與個人的生活形態以健康的基礎。至於個人在其特別情形中採取何種途徑，只能聽其自我創造，其最後結果不是任何人，也不是任何國家所能够改變的。國家只能保護民族不遭腐敗國民的罪惡行爲。同時須頒行一種嚴厲的法律來制

裁，法律支配的作用與實際執行是一樣的需要，否則一切方法都不能達到目的。要想在戰爭延長中禁止人們發洩牢騷，是不可能的。這時『不滿者』就乘機活動，逐漸加強活動。我們從世界大戰的經驗上，特別是國家威權掃地的時候，就看得清清楚楚的了。但是，縱使當時國家出以斷然處置，也不能長久遏制那種惡劣的趨勢，因為當時的國民同胞缺乏的東西太多，尤其是缺乏精神統一的基礎。

全民戰術與全民政治不只是一要預防民族統一不受損害，而且還需用一切可以支配的手段，如報紙，無線電報告，電影，及其他文字宣傳等來維持這種統一。政治要細心認識和考察人類精神與民族精神的法則，纔能在其有關係的手段中舉措適宜。要一個民族的精神力量堅持不變，不是從機械的路程上可以達到的。實際上這種『堅持不變』的過程就須得富有精神地表現出來。哥德(Goethe)的浮士德不應當埋藏在兵士的背囊裏，史勒耳(Schiller)之強烈的自由熱足以堅固和促成英雄的決心。我們在大戰時缺少了一位昔時用他的歌聲戰敗斯巴達(Sparta)軍隊的車退士(Tyrtäus)。反之，我們卻唱猶太的歌如『我們祈禱在上帝至聖之前』，或『警備萊

茵之岸，親愛的祖國可以安寧」等作爲「自由歌」。德國民族爲了他們的生存與他們的鄉里陷入了深刻的不安之下，他們要爲此而去揮戈奮鬥，但是所謂「精神上的動員」及其對於德國個人精神與民族精神的影響，卻沒有人去考慮過。

全民政治在這些方面不只是戰爭政治，而直切成爲民族的政治了。爲使其富有效用起見，牠不應當在戰爭的時候纔開始行動，牠在平時就需得依照本位的神的認識創造生活形態之基礎。這樣纔可以防止「不滿者」的活動，維持精神的統一，因爲此時纔有一個統一的民族來反對「不滿者」及其嘮叨不平之聲。

一個成年的民族不只是向政府要求平時情形的真實報告，而尤其是要要求戰時情形的真實報告。否則就容易給「不滿者」與造謠者以絕好的機會。一個成年的民族知道，真實的消息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告訴他們的。因爲敵人常常可以從公佈的消息裏面摘取重要的報告，如果要照上說的辦法，那麼，作戰就簡直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新聞與公佈的告示都需一種特別處置。全民政治如果不注意這點，就犯了最大的錯誤了。新聞與報告文字必需與事實之最後的適當時間的真

實情形相符合。德國一九一四年時因爲沒有把九月九日馬恩(Marne)的不幸事件及其戰爭上的意義真真實實地告訴民族，所以後來吃了很大的虧。

民族戰前與戰時的經濟困難狀態也可以成爲不滿情緒之深刻來源與民族統一之危機。這個真理被社會民主黨與共產主義的學說利用來造成了民族間的分裂，但是因此更證明牠的迫切性了。大概一個自覺的願把全民戰爭奮鬥到底的統一民族，能够忍受許多窮乏和飢荒。德國民衆大部分在世界大戰時就證明了這點。然而我們也看見「不滿者」怎樣利用這種經濟困難來破壞作戰和戰爭的勝利，破壞民族的反抗意志和統一。並且經濟困難還可以引起附帶現象，有些無良心的富裕國民乘機來搾取貧窮國民的脂膏，或其他類此的事情，於是「不滿者」就更容易玩弄他們的手段了。關於民族在全民戰爭中經濟供給那個問題，我在下章中再說。這兒爲討論周到起見，只略示其與民族之統一有關而已。

現在我們可作如下的確定：一般說來，經濟狀態，只有從民族的人生觀中產生出來，而且以本位的神的認識作基礎，纔能適合民族統一之要求。這兒從其內容看來，也要求道德上的自由，細心

周顧勞動同胞，及繁滋的具有防衛能力的民族之全體幸福。

克勞塞維茨在他的戰爭論學說中莫有談到民族統一在戰爭中的鐵一般的必需性近百年來民衆纔獲得軍事界的極大注意。實在自沙恩和士德（Scharnhorst）與波印（Boyen）所創的普遍軍役制成功以後，國家非注意民衆不可。這個把向來過着分離生活的國家與民族連合起來，使國家在戰爭嚴重的緊急情形下，必需依靠民族。民族於是除了完納租稅，聽從命令之外，還有別的任务，首先是保護國家和政府。但是克氏的觀念卻支配過很久的時期，我的鋼盔的鷹頂上面還鑄着這句話：

『偕着上帝爲了國王與祖國』。

這句話中沒有包含『民族』在內，所以這句話是不澈底的。（註五）現在民族這個字在全民戰爭中已實際上隨着民族本身移置到最前線去了。同時民族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生死困難中對於民族保持的意義，也被認識出來了。自然，全民戰爭也是爲了保持國家，因爲這個和保持一個自由的民族是不可分離的。但是歸根到底，在全民戰爭中奮鬥的不是國家而是民族。民族中

每個分子都須用全部力量來參加，或在火線上，或在家鄉裏。要能夠實現如上的事情，自然須得每人都明瞭全民戰爭不是一句話，而是一個不可違背的真理，就是純然爲的是民族的生存保持。全民戰爭的重心點是在民族裏面，因此牠的活動必需以民族爲依歸。全民政治須使民族的力量聽全民作戰之支配而保持民族。全民政治能夠留心注意上說的具有深義的種族與精神法則，就可以鍛鍊民族，戰術，與政治成爲一個強大的統一體，形成民族生存保持之基礎。

(註一)這兒我簡略一提就夠了。我在近五十年戰爭煽動及民族屠殺和一九一四的戰爭是怎樣「造出來」的語文中已給了一個歷史的敘述。同時指出各民族如何被那超國家勢力的引誘而互相攻殺。

(註二)有人說，我的夫人和我因爲仇恨或別的動機纔反對基督教，這是錯誤的。自然，我們仇視我們民族的敵人，然而我們反對基督的真正原因，也就是上邊說過的原因，更無別的。

(註三)我不必再徵引有關的聖經章節，因爲我已經時常引證過了。現在只介紹我那本小書基督教雕刻中表現出的民族之運命。

(註四)我特別介紹我的夫人的如下著作：民族精神及其權利形成者，一個歷史的哲學及我的著作之神的認識。

(註五)這句話恰合真正猶太的思想。耶維曾經指示過聖經也常常說：猶太人的祖國是全世界。猶太人棄置母親，然而我們卻看重她。實在所謂「祖國」(Vaterland)這個字完全不適合我們的觀念。我們具有那個美麗的名詞兒

二 民族之精神統一 是全民戰爭之基礎

「家鄉」(Heimat)。我們是爲家鄉而鬪爭。假使我們偕着耶維爲了猶太人的大「祖國」而奮鬥，那自然是受猶太人的歡迎的。他們的耶維正是要求推翻國王和家鄉之崩潰。



## 二 經濟與全民戰爭

經濟不是死的東西，牠是富有生命的東西。耕種土地的是人，攫取土地寶藏的是人，製作土地上的果實與原料用以供給和滿足民族需要的也是人，儘管這種需要常是人工造成的。這些一切活動都須利用廣大的工藝輔助工具之力量。工藝也不是死的東西，牠是一種富有生命的東西。如果工藝被適當地操縱於一個藝術家的手裏，那牠可以致用於文化之維繫，換言之，民族底神的體驗之事業上。人用頭腦和手給經濟以生命和力量。我這兒特別聲明這一點，因為我在下面只想到那種『死的經濟』，就是維持民族和軍隊之生存的物质。

軍隊和民族在經濟方面也構成一個強有力的統一體。全民政治與全民戰術愈早認識清楚這點愈好。二者都必需考查如下的嚴重問題：鄉里對於全體民族生活的需要及軍隊的需要，特別是作戰的需要，自己可以生產些什麼？要向國外購取些什麼？而購取的東西在戰爭爆發後是仍然

可靠的麼？從鄉里到海的通路是自由的麼？或者這種交通可以被海戰和封鎖阻塞，如德、奧、匈大戰時在北海及一部分東海受英國封鎖，在地中海受意、法封鎖的經驗一樣麼？戰時大多數國家都要算到輸入的阻塞或限制。就連海上霸王的英國在一九一七年夏天遭德國潛艇政策時，輸入也受了損害。

此外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而且與民族和軍隊之經濟供給有最密切關係的，即是國家的金融情形，及其對於戰爭之動員和實行時可能上的財政手段。

全民政治致力於全民作戰的工作範圍非常廣大。這兒的問題對於一個短期間的戰爭也許容易解決些。將來歐洲的戰爭可能的是這樣形成，但是交戰國家一定要在軍隊之準備上，尤其是在牠們經濟的和財政的情形上面加倍努力。就完全除開那種在長久戰爭中足以威脅民族統一的危險不算，可是我們要問，誰能保證所有的希望都能够圓滿呢？世界大戰以前關於「戰略與政治」的關係只被人在一個將來戰爭的短期間過程中假想過。但是我曾經鄭重地指出那些與我們軍隊的軍火供給有關的別種可能性。可惜我不幸而言中了，雖然我也未曾想到那是四個困難

## 的戰爭年度

個別的國家在全部經濟方面，包括財政在內，應當採取什麼具體的手段，自然是不能答覆的。因爲這兒就不能成立一般的原則。總之民族和軍隊不可缺少任何東西，戰爭和戰爭行動之實行，必需得到保證。可是，這是俗話說的，說者容易做者難了。要想完全作到是不可能的。實際和理論總是不同的。究竟這點實現到何種程度，關係戰爭至大。我下面就描寫那些在世界大戰前及戰時與德國經濟情形，及當時的作戰有關係的手段。讀者可以自己多方面觀察而且注意這個問題，就是：個別國家的作戰，在經濟方面向其全民政治提出那些實際的要求？這些要求完成了多少？或者能够完成多少？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德國在經濟和金融方面都沒有準備好。只有對於財政動員採取了相當的手段，我這兒先給讀者一個具體的概念，以便明瞭德國金融上的武裝情形，及明瞭戰爭對於一個國家財政的要求究竟是怎樣的。照國家叢書世界大戰——戰爭武裝與戰時經濟：德意志國家銀行在戰爭開始時擁有二、〇〇〇百萬馬克的黃金現存量，裏面包括三〇〇百萬馬克的

國家現金。假使依照法律上三分之一的金準備——大戰前各國除了這樣的金準備外也沒有想到別的制度了。(註一)——那麼，六、〇〇〇百萬馬克的紙幣流通額是可能的了。因為德國經濟中還有二、〇〇〇百萬的黃金和正貨流通，只發行了一、八〇〇百萬馬克的紙幣以滿足當時的經濟需要，照此還可發行四、二〇〇百萬馬克的紙幣，而不損害金準備。在第一個戰爭月中，包括動員在內，已經需要四、五二〇百萬馬克，於是立刻需有一個比法律上的金準備所允許還要大的紙幣發行額。除此之外，自然還有其他的貨幣需要。因為民族不明白戰爭的原故，所以我們在戰爭中縱然處在正常的經濟情形下，而交易所中瘋狂的出賣，及儲蓄銀行與銀行中擠兌的事情，是仍然可以期待的。這個必需應付纔行。此外，為使經濟繼續進行及武裝工作之可能起見，還繼續需要支付手段以作信用保證。為此兩者準備了一、五〇〇百萬馬克的供貸證券，及二、〇〇〇百萬馬克的小的國家銀行鈔票。這種小鈔票和借貸證券一樣，大部分都已印好了。軍隊與國民經濟在動員令下第一次的需要就這樣滿足了的。七月三十一日德國的交易所都關了門，一切別的國家都早已這樣實行了。同日英國也採取同樣手段。八月一日公布了財政方面所採取的動員

手段，這些手段都根據在德國國家完全健全的財政情形上面（註二）

我們從上面講過的國家叢書中可讀到如下的幾段：

「同樣德國也需得緊張一切力量來克服那帶有威脅性的恐慌。在這個危險時間中，證明了德國負責的官方及經濟領導的人物，在近數十年關於財政組織的建設是有先見之明的。現在就告訴我們，那些一切參與的團體不間斷的努力，把那因激烈經濟發展而極度緊張了的德國貨幣信用事業，置在一個寬大的基礎上是多麼必要。這樣纔使得德國經濟的財政基礎，未發生特別困難，抵抗了恐慌的暴風雨。」

「八月一日德國軍隊的動員令也喚起了財政的動員。『猶紐士塔之國家軍用金』（Der Reichskriegsschatz des Julisturms）——（包含一二〇百萬馬克法國一八七一年給德國的賠款，及與此合在一起的八千五百萬馬克的特別的預備金）——即實在的現金，與國家其他的預備金，都被交付與國家銀行，用以加強現金存量（共約三〇〇百萬馬克）。關於供給陸海軍動員的財政需要，大半都是向國家銀行請求短期信用。特別是——就如計畫好的一樣——由中央

銀行方面給經濟和商業界廣大範圍的信用保證，國內各大城市立即成的貸付金庫貸給大量的商品實貨和有價證券。」

「國家銀行獲得全權接收短期無息庫券，與國家匯票，及銀行通用的商人匯票，用來保證牠發行的鈔票。那個爲了嚴重情形而保存着的鈔票量（就是前邊曾說過的二、〇〇〇百萬馬克小的銀行鈔票）也讓國家銀行發行到市面上去。特別是國家銀行適應那個宣布強制通行力的法律草案，解除了鈔票兌現的義務。這個重要的法律草案對於逼得爲現金存量而奮鬥的國家，是一個緊急時間中產生出來的強制手段。牠違背了保有四十多年效用的金本位的原則。同時爲作戰利益起見，國家銀行那種素來對於國家的財政上的獨立性也受了極大的限制。」

「除了上述的財政技術的動員手段之外，國家也就沒有採取其他的戰事準備手段了……就連德國國家財政的指導者也莫有承受到基本的方針，使他施行嚴重情形之下的特種財政活動。他決定事情時是要看，究竟走那條路來供給國家對於一個勝利作戰所必需的財政需要。德國雖然在二十世紀初纔開始在靈巧的貨幣市場操縱之下，利用信用的藝術，然而一看過去一百二

十五年中民族增加了的富裕，就不用怕一個不順利的財政情形，會消滅一個勝利戰爭的成績。反之，還可以很有把握地說，保護德國的不只是那些能作戰的順着呼聲而追隨到軍旗下去的德國人，而且還有國內全體民族都準備着擔任那廣大的物質的犧牲。

對於一個拘泥於金準備不可缺少，同時，關於貨幣本質還未深切了解的國家，這種財政的動員手段是適當選擇了的。同樣其他別的經濟的手段也如此，我回憶到那些貸金支付的延期。因為世界市場封鎖了的原故，政府爲實行戰爭起見，在財政方面就走國內借款的道路，民衆應募了八四、〇〇〇百萬馬克。政府因此就照英國的辦法放棄提高租稅。至於當時那些敵國怎樣施行借貸工作，已是週知的事情了。在美國「工作」的世界資本，早在美國還未參加戰爭，走到德國的敵人方面去之前，就自動貸出借款，於是使得北美聯邦國加入反德國的「十字軍」，用以救得那些貸出去的錢。

現在各國因世界大戰，及世界資本家造成的經濟災難都處在混亂不安的財政情形之下，——僅除開英國還可以被認爲滿意外，——戰爭在財政上的可能性如何，不易驟下斷語的。假使

戰爭是適合猶太和羅馬的願望的，世界資本家就會接濟他們的錢。但是這也和世界大戰時具有同樣的用意。就是把所謂『戰勝國家』及其民族都置在猶太的世界共和國，或羅馬的天國之經濟集體下，就如我們在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家』中所看到的一樣。自然，作戰是如奧國將軍孟特苦苦利 (Montecuculi) 說的：需要錢，再一次要錢，第三次要錢。飛德立大王在其觀察中也常指示軍隊與財政的關係，而且他只有靠英國財政上的援助，纔能進行七年的戰爭。錢對於戰爭的重要性是向來就不可非難的。古時我們的祖先作戰雖無須乎錢，因為戰爭此時是民族的事情。現在這事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全民政治為使作戰與民族保持有利起見，也可以走別的道路，就是遠超過一九一四年德國財務管理對於動員情形所指定的道路。

每一個具有確定的民族領導的國家定能供給作戰的費用，只要這些費用消耗在國內。但是，同時國家不可侵犯健全的財政管理的原則，否則就是對於軍隊本身也不免發生危險的反動。至於『國外購買』，就是為了供給民族與作戰必需從外國購買商品，這種情形就根本不同了。這時那些對於國內的支付流通有效的手段就不靈了。假使莫有外匯可供支配時，外國商品就只能用



金子去購換。『國外購置』對於國內的幣值發生影響，可是在戰爭情形下不得不忍耐接受。

世界大戰開始時，德國國家銀行失去了極大的獨立性。這是一個模範的先例，值得嚴重注意的。後來達威斯法（Dawesgesetz）使國家銀行的地位又比向來還更甚的獨立起來。但是全民政治須把中央銀行置在國家的監督之下。

金本位制度阻礙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照金本位原則，三分之一的流通紙幣須用金子保證。這個原則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就被放棄了。德國現在所有的外不是一個金核心準備。因為世界金融資本家操縱的原故，許多國家都起而實行一種國內貨幣，這種貨幣大概在國內尋得着保證，或者貨幣本身具有特別的行市。譬如在國際流通上面，國家相互間對於本位協定一種不同的價值尺標時，大家就可以解脫對於金子的約束。然而現在還不能完全實現這種辦法。假使人民儲財習慣很深，把錢幣都窖藏在家裏，一個國內本位也是無效的。一個國家健全的貨幣制度就在使貨幣不離開流通範圍。實行大量的紙幣流通，在財政技術的可能之下，也是一種維持民族經濟生活的工具。本位與貨幣形態對於一個民族的經濟生活，因此也對於其戰爭之進行具有決定的意義。這

個使我們認識全民戰爭之財政基礎實際上究竟是怎樣的。

我在前面曾經說過全體民族要擔任「戰爭恐慌」和「物質犧牲」的話。這個就指示一個民族的精神狀態在經濟方面對於作戰的保證具有多麼大的意義；而且指示這一個部門和那一個部門總是互相牽連着的。全民戰爭就只能是这样。那種所謂不安，就是「戰爭恐慌」可用如下的方法來減輕，如趁早關閉交易所，調節銀行和儲蓄銀行裏提取存款等。至少在國家還沒有決定實行完全不同的貨幣制度時，這些方法是有效的。但是「犧牲」是不能夠調節的，因為代替犧牲的就是強制，代替自由應募的就是強制借款。就算能實行這樣而且都還成爲問題，就是那些關係者從何處取得他們必需供給的錢呢？實際看來這是很顯明的，爲了保證和實行全民戰爭，必需採取深刻感觸民族的財政手段。假使這個民族平常是那樣教育慣了的，爲民族的安全而供獻生命是自然的，然而爲民族的安全而供獻金錢就成爲很痛苦的事情，那麼，牠受到的感觸就更厲害了。反之，假使民族真正感到自己是一個統一的運命共同體，而且實際上又處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於是上說的感觸就不會發生。這兒非常明顯地表現出民族精神統一的意義及民族對於全民戰

爭理解的意義。用此可以奪去『不滿者』那些怕見光明的活動的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又向全民政治要求最高的誠實性，使民族給來那些爲他們的生存保持的金錢光明正當地用去，不可以潛入任何貪污，使任何對本國民衆的掠奪都成爲不可能的事。我們民族的戰債應募者要覺得自己是爲了保持民族生存而盡義務。世界大戰的經驗明白告訴我們必需除去上面那些現象纔可以使民族統一在財政方面不受損害。

財政形態深深牽連到民族和軍隊的各種生活品與戰具的供給上去。很顯然的，越是一個國家能夠在其國土內就是軍隊在戰爭情形下直接保護的國土內，生產充分的糧草與原料等，那麼，這對於民衆和軍隊及全民作戰就越有利，而全民政治就越容易活動。可是沒有一個國家是處在這樣幸福的情形下。一個民族的需要，尤其是戰時的需要，已成爲多樣形的了。要滿足這個需要，就只有世界貿易纔可能。假使這種貿易在戰爭情形中對於一個交戰的國家中斷了，於是輸入被阻，此時要全部滿足這些需要就成爲不可能的了。因此各國平時都準備妥當他們在戰爭情形下能夠自己供給的東西，必需從外國購買的原料就大量地儲蓄起來，用此可以保證民族的供給與

軍隊的戰爭準備。但是這兒也需要錢，需要很多的錢，這在惡劣和不安的財政形態與動搖的本位情形下，只有那樣的國家可以拿得出來，就是牠用民族的自由作犧牲去購得世界資本家的慈悲。

(註三) 依照個別國家地理的形勢，如與中立國家毗連的邊界構成，及向海的地位，於是這些國家在經濟方面對於民族保持與戰術上須作的準備，也完全不同，而其範圍也各異。假使一個國家相信牠的輸入縱然遇到損害而大體上仍然可以維持，那麼，牠在物質方面的顧慮，比一個在戰爭情形中只能仰仗通過中立地帶和海洋的少量輸入的國家，可以減輕一點。爲給讀者一個確定的概念起見，我以德意志民族在世界大戰時的供給情形爲例。

自然，民族和軍隊的糧食品，飼料品，及發動物之供給應屬於第一位。人爲了能够勞動和奮鬥起見，必需生活，必需保持其生存。馬和畜類只有用飼料纔可以保其生存，機器只有用發動物纔可以使其轉動。

德國在世界大戰時關於人的供給和馬的飼養情形怎樣逐步地嚴重起來，這個大概還清楚地保持在經驗過世界大戰的這輩人的回憶中。這種回憶越能堅持不忘越好，用此可以估計種種

關於保證需要——至少是人的供給，可能時飼料的供給——的價值。譬如當時飼料缺乏情形是怎樣嚴重，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看出來：我在東方的時候，有次逼得我使人混和木粉在馬的飼料裏，用來稍微填滿馬的肚子，結果使得馬力與牠的健康都減弱了。所以自羅馬尼亞向我們宣戰後，我就決定把戰爭推進到佔領馬拉孩（Malachei），主要的是爲了改善中歐國家底困難的供給情形。一九一八年東方的戰場擴張到烏克蘭去的原因，也是爲了與此適應的考慮。這樣一來，我的確能够顯著地改善中歐國家的供給情形——奧國的供給情形還比我們的困難得多——但是要根本除去這種困難我也不能够。這種困難情形現在大約還在當時出世的或者正在童年的德國人的心中活躍着。所以我在世界大戰後常常指示我們的農業必需自給這是毫不足奇怪的，因爲這已成爲一個不可違背的原則了。

世界大戰前我們每年必需要一百萬噸多的小麥入超。根據一個備忘錄的計算，每年必需的小麥入超額甚且爲一、八三〇、〇〇〇噸。關於飼料，德國只能滿足五分之二的需要，約需八百萬噸的輸入。這是極有力的數字，很驚駭地表示我們當時在供給情形下怎樣依靠外國。除了大麥、山

芋和肉在德國大約可以出產免強足夠量之外，對於任何種穀類和飼料品的儲藏都未做到。第一、因為政府對於這個很嚴重的問題未曾充分考慮過，第二、牠總以為戰爭只須經過短時期，而且對於現貨儲藏又缺乏錢，——這是大約值十兆（1 Milliarde）馬克的現貨。——末了，農業和商業界也起來反對，因為他們怕那些堆積着的現貨更新，常可以引起價格平均，這對於在自利心下追逐利益的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在這樣的供給情形與輸入阻塞之下，困難情形一當動員爆發就必需出現，是很自然的事。因為缺乏勞動，馬匹和肥料的原故，不管參加者如何努力，而這種簡陋耕種的收成總是減少，於是關於人、馬和畜類的困難更加增了。我們現在關於這方面的情形也許比大戰時好些，這是從軍隊廣大的摩托化——這對於馬的飼料比從前需要得少——及可以使用淡素來作農業肥料的原故而來的。我當時促進的雷那工廠（Leunawerk）對於在全民戰爭中民族力量之保持具有極大的意義。

其他的生活和享受品，如蔬菜、豌豆、扁豆、米、咖啡、茶等，與牛乳、蛋、豬油，在戰爭開始時尤其沒有充分的存量，以作長時間民衆和軍隊贍養之用。

自然，陸軍和海軍管理平常總準備着特定現量的糧草，應付平時及動員之用，而且還顧慮了第一批的輸送，於是軍隊在第一個時期是有計畫的被供給着的。對於礮臺也有了特別的供給，使其能够勝任整月的包圍攻擊。

同樣的，對於大城市和工業中心的供給，在世界大戰不久之前也給了特別的注意。可是還有許多事情未曾去做，因此對於當時的情形不免惶惶失措。於是頒行了正確的方法，如發行麪包票，也頒行了錯誤的方法，如那週知的豬的屠殺等。最後實行了一種民族底廣大的限制分配（*Rationierung*），這就和對於那被包圍着的礮臺裏的住民所規定的一樣。這時重勞動者同兵士一樣得同樣的口糧。兵士自然就實際上的可能，必需獲得維持他的體力所需要的東西。可是困難情形發生了，尤以在民衆的廣大階層中爲甚。他們在真正的民族感情中只取國家給與他們的東西。但是有些人卻別樣行動，竊取私利貽害大衆，於是就構成民衆中不滿情緒底深刻的淵源，而使民族統一受到嚴重的打擊。

說到人類的供給，自然以穿衣爲維持生活之最重要的需要。關於製造衣服的原料，我們除了

麻還能出產少量之外，如羊毛、棉花都完全仰給於外國。一九一四年軍隊的衣服是有的，特定的現量是儲蓄着的。同樣，民衆作衣服的原料也自然存此在製造所及商業稅關裏面。各個人至少都能夠保證他的需要到相當時間。

此外在紡織工廠裏還有三個月的羊毛和棉花的儲蓄。但是後來戰爭對於製衣事業的影響慢慢地加增。輸入缺少及火線上軍服之廣大需要，必然使得不久製衣材料發生重大的缺乏。首先是在那勞動的窮苦的居民中，因為他們在戰爭爆發時僅能照目前的需要穿着，完全沒有儲藏。於是這兒也實行了限制分配。那種用羊毛和棉花混和起來製造衣服代替材料，是不能真正當作有價值的東西看待的，而且很快就着破了。當時沒有任何可以代替羊毛和棉花的貯藏纖維物。

關於作鞋的皮革的需要，及馬匹的遮護等，國內也沒有現量來保證，而且也不出產這些東西。平時就需要大量的皮革輸入，因此不久皮革也缺乏了。於是這方面也必然地被隸屬於同樣的管轄下，如我剛纔關於製衣所大略指示的。

我現在只略提我已經關於製衣問題說過的話就夠了。很顯然的，這問題對於全民作戰及供



給問題都具有極大的意義。因爲這兒不僅是爲軍隊，而且也是爲民衆，所以不僅是爲軍隊的保持，而且也是爲國內德意志人的保持。固然我們這兒承認戰線上的兵士較他們鄉里中的民族同胞們具有優越的地位。穿衣問題與民族統一有密切的關係。民衆遭受了穿衣的困難，特別是那些必需消耗多量衣服的手工業的居民。預先調節穿衣問題也是全民作戰及全民政治一個嚴重的任務。這個問題就和全部原料問題一樣，——只要這些原料不能在國內出產——與國家的財政情形及全體經濟有最密切的關係。對於和平時一個活動軍隊之必需的衣服裝備，已經需要大量的預備。德國有特殊軍衣製造所，牠們與私的營業一起製造平時與戰時的衣服，戰時更加倍地活動。縱然關於食料和衣服方面有了最大的預先考慮，但是政府在將來也仍然會採取民衆的限制分配，發行購取證等手段。

軍隊各項軍需品的武裝也是國民經濟，和全民政治的嚴重問題。至於技術的輔助工具的具有什麼意義，我在下面還要申說。可是毫無疑問的，軍隊需要大量的各種武器、軍火和戰具、兵艦、和坦克車等等。

軍事工業，甚而任何工業的基礎都是炭和鐵。世界大戰前我們關於這類原料都非常充分。當時德國還擁有羅特林根（Lothringen）的鐵礦。關於炭的供給，我們只要調節了工人問題，就不用顧慮了。關於這點我下面再談。德國冶金和溶鐵工廠在一九一三年製造了四千萬噸的鐵礦，其中一千一百五十萬噸是從外國來的。這些鐵礦一部分比德國的鐵礦含有較良較高的鐵質。只要保持那個到擁有高等價值鐵礦的北部瑞典的海道，我們在戰爭情形下絕不用顧慮鐵礦不敷的，而且從其他國家的輸入就可以取消了。不過其他軍事工業所需的原料則不然。我們從上面講過的國家叢書中，關於最重要的鍊鋼金屬與其他必要的輔助金屬缺乏之危急，可讀如下的一段：

「德國工業對於這些金屬的供給，主要地是依靠外國的輸入。不藉助外國的來源，那具有極大價值的德國鐵工業的發展也許採取了比今天狹小得多的規模。雖然這些鐵礦的需要非常小，然而這對於鋼和鐵的質量，及那些用此製造出來的物品的有用性卻極其重要，而且甚至發生決定的作用。只有鉛和鋅在國內的出產量免強够用來製造行銷國內市場的製成品。反之，那幾乎在一切工業部門裏所應用的軟金屬，銅，在國內只生產五分之一的平時消費量。幾種鍊鋼金屬，鎢，鐵，

鑽、鎳、及那重要的鎳、鋁、和錳，除了自己極小量的出產外，都完全從外國來的。末了，那個製鋼最重要的輔助金屬，錳鑽，完全是從外國購買來的。假使從俄國、西班牙、布拉西爾及印度國家來的輸入中斷了，那就必需感到一種痛苦的缺乏。』

這段敘述主要的是關於正常的平時經濟情形，及和平時戰具之準備。那種在戰爭情形下因缺乏鍊鋼金屬與輔助金屬如對於軍火和摩托製造必發生的困難，是可以從上面直接看得出來的。大家都曉得，鋼和鍊鋼金屬對於各種重砲和軍火的製造是與軟金屬，銅一般的需要。我們從戰爭經驗中也曉得，當時軍事工業關於各種金屬是多麼缺乏。譬如私人家庭中的銅器都被拿去了，用以滿足必需的需要。然而這些手段也許都還不成功，假如後來不是那個猶太人黑兒蒲汗特 (Parvus Helphand) 由他與丹京哥彭哈根 (Kopenhagen) 的『連絡』供給了我們這個金屬。那個同樣的猶太人，後來以社會民主黨『偉人們』的朋友資格實行通貨膨脹，成爲德國經濟的破壞者。

關於戰器製造，德國除了私人的軍事工業之外（克魯浦、萊茵河的金屬和機器工廠， Sol.

ingen = Suhl 的軍火工廠，Löwe A. G., Mauser 等）還有國家的工廠如西班牙島（Spandau）的彈藥廠，及其他的兵工廠，火藥廠等等。軍事工業都非常活動，製造出來的東西都好，只是不能夠滿足需要。我爲了增加大礮子彈徒勞無益的鬪爭，爲了軍隊底各種技術輔助工具的裝備，及一般軍役制底實行的鬪爭，在德國陸軍史中將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對於那未來的戰爭的本質并不是不明瞭，雖然我對於軍火真正的需要沒有完完全全看到。現在的人總喜歡那樣說，似乎軍事負責方面，關於軍隊之技術輔助工具的武裝，未曾充分考慮過，這是錯誤的。這只能怪財政上的考慮，常不讓鐵一般必需性實現。曾經有段時間，政治家提出下面的口號：『沒有無保證的支出』。到世界大戰不久之前，纔決定放棄這個原則，用其他的方法來準備必需的財政費用，使軍隊獲得較良的戰具裝備，然而這已經太遲了。現在戰爭經驗擺在目前。我們試看各國的報紙，就發見軍事工業在那兒是怎樣活躍，而且那些私人團體所賺得的紅利也就是一種證明。我們可以確定地假想，一切軍隊在將來戰爭中，將擁有一個從來未曾經驗過的戰具裝備，還完全除開戰具因軍事技術所引起的完備化不算。一個國家如必需重新建造牠的軍事工業的德國，起初在這些武裝國家的行列

中還不能仰起頭來。牠不只需得重新製造凡爾賽條約所破壞了的東西，而且超此之外，還需得把軍事工業本身形成出來。然而要形成軍事工業，就必需有熟練的工人，這些工人不是一二天可以訓練得出來的。動員情形之下，就是向來不製造戰具的工業，現在也需得服役於軍業工業，或者是供給任何一種特殊品，如製造點火器之類。全民戰爭中是一種不能想像的大量軍火和戰具的補充，新造和修補。世界大戰開始的前兩年中都未曾注意到這點。結果在許多隊組裏發生危險的精神力量的弱減，在民衆中發生騷然不平，白白地消耗了許多力量。只有我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參加最高軍事指導的時候，纔作出補救的辦法來，使國內盡量替軍隊工作，自然這些工作的效用在很多星期以後纔表現出來。在這不久的戰爭中也和從前一樣，越是需要更多人的時候，那種要求戰具的呼聲就越是高響入雲。但是這種呼聲只有在具有製造器具的原料和勞動力時，或者具有金子和外匯可用以向外國購買原料或直接購買戰具時，纔被人聽見的。（註四）

除製作金屬的軍事工業之外，化學工業佔有特殊的地位。火藥，爆炸品，與發動物的製造，及藥物的製造，都是屬於牠的範圍以內。自從毒氣可以變成戰具以來，牠的意義越是增加了。一切的願

望，其中大部分是完全虛偽的，企圖阻止毒氣戰爭是一點兒也不會改變事實的。德國化學工業在世界大戰時，並不是一切原料都不仰給於外國。可是牠滿足了軍事的需要，做出了非常的成績。此外，牠還供給肥料，供給人造橡皮與載重車，儘管數量不多。末了，尤其因為牠供給載重車以濁徧蘇油作為發動物的原故，於是就緩和了一般對於發動物所受到的困難。

關於保證陸軍和海軍的煤油問題，使我在世界大戰中絞盡了腦汁。德國到處都找不到這個東西，於是油和糧食品的獲取，就成為佔領馬拉孩的原因。雖然羅馬尼亞的油場設備被破壞了，但是佔據了馬尼亞以後，卻使那極端缺乏煤油的輕便貨車和飛機得到了一部分保證。不過需要還是逐步增加，逼得我一九一八年向高加索推進。世界大戰後，因軍隊逐步摩托化，船上施行燃油——現在大約一切軍艦上都這樣——及空軍的發展，於是對於發動物與塗油的需要，更增加到一個非常的高度，以致於佔領和利用地球上的油場，成為美國、英國、俄國及站在他們背後的猶太人和羅馬的世界資本家底世界政治之一部分。發動物之預備對於一切國家的作戰，是鐵一般的必需性。越是一個國家對於這樣的東西在原生產品形態中有得不多，或者不能用化學方法來多

量生產，戰時這些東西的輸入又越是不可靠，那麼牠自然應當及早從事適應上稱的必需性。國家財政底存金和外匯的地位，對於這個保證問題，也具有決定的意義。

我不能枚舉一切對於作戰有意義，及世界大戰時曾經有過意義的原料。我在我的戰爭回憶中寫下了一段重要的戰爭經驗。這兒我還想略提一下。

木料和水門汀，兩者對於陣地建築都非常重要，鑛坑木對於採鑛也非常重要。我當時就從東方總指揮佔據下的地方中，大量供給這類物品。這個地方包括 Kurland、立陶宛、白俄羅斯 的一部分，及東部波蘭。

這些被佔據的地方首先要養活當地的居民，因此牠們對於西方就不能供給了。這個時候美國就出來供給食物，賣主都賺了大錢。我當時使那些被佔據的地方盡量供給各種原料給武裝地區。在一個全民戰爭中任何被佔據的地方都要利用來這樣作的。

農業、工業、及許多旁的經濟部門對於保證民族和軍隊的需要，都要完成嚴重的任務。牠們要維持國內的經濟進行，要給整百萬的勞動者以精神上的滿足，給他們的報酬，給他們的生活可能

性，否則這些人都一定無代價地受國家供養。不過農工業雖然一方面幫助了作戰，但是另一方面卻吸去了整百萬的勞動者，這裏面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可以應用來作戰的，於是就使得軍隊失去了這一部分人。當時那些本來可以應用來作戰，但是在軍隊裏不能尋得錄用的人一天天地增加起來了。要維持從國內到火線的交通，要使得大量的隊伍調動和鐵路運輸任何時候都不發生困難，於是這些問題都惹起我全部的注意力，這也正是牠們向一個全民戰爭的領導者所要求的。我現在舉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當時因為要維持生產必需的石炭量，於是我從火線上遣回了數萬工人回國內去。但是這種辦法竟成了一種危險的手段。因為除了使得大部分工人被煽動外，還使得他們就地工作，使得他們在工作的效率上顯著地鬆懈和低落了。而且要求更多勞動力的呼聲還繼續高響，那些直接制止工作減少的官員，除了打發些『不滿者』的須領到戰場上去之外，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於是這就顯著地促成了軍隊的精神張力之低落。正是這個地方明白地表現出缺少了民族的精神統一及其適當的反作用。這並不是一些很簡單就可剷除了的現象。這種混亂情形越來越危險，火線上的男子聽到，他的工作朋友們在和平時是得到怎樣的報酬，他們



又怎樣能够供養他們的家庭，同時他以他些少的工資卻不能這樣做。雖然他此時需得把他的生命拿來參加鬪爭，然而國家支付與他家庭的幫助費還遠落在國內工人們所能給他們家庭的之後。我在我的慘淡經營中，曾希望在國內施行一般的男女勞動義務制，藉此在這兒可以平均一下。然而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甚且我這種努力被政治畸形化了，以致於實際上的損失愈益增大，及那些正當的不滿情緒愈益增加。

下面這個事實是具有深刻的意義的：當時工人不是兵士的朋友，而兵士也不是工人的朋友。工人不像兵士用他的生命來保持民族一樣，也用他的勞動力來服役於兵士；卻追逐自利的，政治的活動，更甚而利用民衆和軍隊的困難。再沒有比這個事實還更能清楚地表示出德意志民族精神統一之缺乏了。但是結果工人們所想的也和民衆中一大部分，在困難情形下想找便宜和發財的人所想的是一樣。經濟不是死的東西；牠可以輸送力量，也可以奪取力量的。在世界大戰中兩者都沒有缺少過。

關於調節必需生活品與飼料及原料的供給問題，在戰時成立了集中的機關。這些機關後來

遠超過了本來的目的，取消了任何獨立的行動。這兒成立的強制經濟一部分是應當作的，然而一大部分是不應當作的。工作效率是必需的，但是官僚主義和工式主義是應當擯棄的。那個猶太人拉藤腦（Walter Rathenau）創辦的集中化，實際還有旁的目的。他把世界大戰前就已經快要落在猶太和羅馬的世界資本手裏的德國經濟，現在完完全全斷送到他們的手裏去。世界大戰中大戰後都有了顯著的成功。這種集中化除了奪取個人的創造精神與個人的責任心之外，還發生相當的妨礙作用。那種消費合作社的設施，也沒有獲得民族的統一。這種行動和手段反引起不滿情緒的增加，反引起貪慾與偷賣的發生，兩者都是不應當原諒的。民族同胞們在出賣生活品的店鋪前整個鐘頭的長隊站班，正給「不滿者」以順利的活動機會。這樣操縱經濟的活動，深深地影響到民族的精神性質。這種活動必需細心地用最嚴厲的正義感情之下實行，而且不斷地解釋牠的必需性。假使把這種事情怠慢了，假使不名譽和貪賊開始動搖那種對於強制經濟的正義信仰，那就會鑄成莫大的錯誤。這種經濟在發生阻礙的時候必定被一切獨立創造者和勞動者所拒絕。

上面我回溯地在大的輪廓中速寫了一國經濟對於全民戰爭的意義，用此確定全民政治在

戰時和平時需得完成那些非常重大的任務，以便盡牠對於作戰的天職。我在前兩章中：「民族精神上的統一」是全民戰爭之基礎，和「戰爭與經濟」，討論了兩個不同的範圍，但是也指示出牠們相互間的密切的關係，兩者都影響全民戰爭的進行。克勞塞維茨在他的戰爭論中一點兒也沒有談到經濟情形對於戰爭的意義。那個偉大的軍事學家史利芬將軍也一樣沒有把這個問題嚴重地討論過。世界大戰因為時間延長的原故，此時纔鮮明地顯露出民族統一和經濟對於戰爭的重要，以及明白認識這些問題的重要。現在個別國家的政治和軍事的領導者對於這些問題究竟理解到什麼程度，是不易揣測的。也許大多數國家對於民族統一的問題仍然沒有辦法，因為牠們就完全不明瞭人類精神和民族是怎樣的。大概比較好的還是牠們用種種機械和組織的手段來解決民衆和軍隊的供給問題，然而那冷酷的實際在這兒也會常常發生阻礙的作用。

(註一)法國和俄國在金準備上還要比德國順利些。奧國、匈牙利又比德國次一點。英國雖然有一個比德國較低的準備，但是牠在其安穩的財政狀態中卻超過一切其他交戰的國家。在這些報告中沒有把外匯，就是外國的支付工具一併舉出，因為外匯管理在當時還未曾實行。

(註二)德國有五兆，法國二八兆，俄國一九兆，英國一四·一二兆 (Millarden = 1000 萬) 馬克的國債。省和市在德

國及在別的国家裏面也有公債，但是這些缺乏比較數字。

(註三)世界大戰時美國的世界資本家，給我們敵人政府整兆萬的錢來維持反對我們的戰爭和武裝，就這樣造成了敵人的反抗力。現在這些世界資本家一點兒也不管那些把錢交與他們的人們是否仍然得回他們的錢，但是那些借了錢的民族因此卻越陷越深，陷入於禁錮他們的狀態下去了。

(註四)美國的世界資本家除了供給我們的敵人億兆的金錢之外，也直接接濟戰具。

#### 四 防禦軍之強度和實質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來，一個全民戰爭利在速行，就是把戰爭可能的快地結束了，不等到那個在長時期的戰爭中容易波及民族和作戰的民族統一就中止，或者經濟困難危及戰爭的終局。所以要從戰爭一開始起就讓全部民族力量在訓練好的，武裝好的，和編制好的軍隊形式中受軍事領導的支配，不需要後來的許多追加和補救。

軍隊在第一次決戰上，越能作戰越好，越是強大越妙。德國有句老的戰爭經驗談，說「勝利是在強大的大隊那邊」。這個顧慮到作戰中常有種種不讓將帥意志發揮作用的阻力，及敵人對抗此種意志的手段。真的，用兵時總不要常以為敵人用兵是錯的。弱的大隊固然也勝利過，但是世界大戰時，歸根結底還是歸功我們敵人數量上的優越。他們從開始起就用全付力量來參加世界大戰。數量在戰爭中常具有決定的意義，這點是不應當忘記的。人總是從困難中造出道德來，我們現

在應當嚴格地認識清楚數量的意義。法國在世界大戰前就告訴我們，假如一個國家自動地盡力於全民作戰時，能够成就何等的事業。我們看，當時德國民族錯到什麼地步！不管我如何催促，仍然不實行普遍兵役制，只是補上了百分之五十四認爲有用的能作戰的男子。於是戰爭開始時有五、五〇〇、〇〇〇能作戰的男子未訓練好，此外有六〇〇、〇〇〇訓練好了的兵未加入防禦，這個事實大概後來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了。但是這種怠慢在戰爭過程中已是不能補救的了。一九一四年九月陳列出四個新的師團，一九一四和一五年的關頭又陳列出四個師團，以後還有不斷的變更，這些都是急迫的，必需的手段，然而這只是出動了微小的力量。假使在戰爭開始時就有得八個師團，那就可以保證勝利了。英國的情形也和這個相似。英國在世界大戰之前及到今天都沒有普遍兵役制，牠在世界大戰中纔施行這種制度。當德國最高軍事指導明瞭在八九月時須在西方取得決定的勝利，時候已經太晚了。平時就要準備起民族的全部兵力，戰爭開始時就出動這個兵力，這是爲民族之生存保持而鬪爭的不可否認的要求，深深地根據在全民戰爭的本質中。

全民戰爭要求編入能作戰的男子從大約二十歲起到軍隊裏去，及訓練好的男子直到高的

年齡階級止，聽命於軍隊的支配，（註一）把他們編制到具有作戰使用資格的或者補充組織裏去。一種大數量的「救急者」常在平時和戰時向軍隊中取去。我已經說過了。民族和軍隊要生存，要被供給着，國家也須得繼續維持。

世界大戰前主要軍事國家裏面大都施行二年或三年的兵役期。這恰好足以訓練兵士完善作戰，使他們所學的東西後來經過後備和國防的實地練習而更加堅定。他們雖然也有屬於高級年齡者，但是都可以使用來應付敵人。至於一個較短的兵役期能够保證這個到什麼程度，還未實驗過。這種訓練并不因現在軍隊所具有的武器與技術輔助工具的完備化和細緻化而變簡單了。老年級的兵士駕馭這些東西是比較吃虧一點。除平時所有的組織之外，後備軍和國民軍組成的團體也構成戰時的兵力。

一種優良的作戰完善的訓練，具有身體和意志的鍛鍊，及優良的武裝，足以增高隊伍的價值。在保持民族生存的鬪爭意志之下更給他們以確定性和優越的感覺。全民戰爭的領導者即須注意優越的訓練。現在一切國家更努力於作戰完善的訓練和武裝。一九一四年的戰爭開始時，我們

陸軍的訓練和武裝都不錯，這個特別表現在我們的戰隊方面。自然有些地方還應當更好一點，尤其是關於改善缺乏子彈的問題。可是這種弊端在大戰開始的短時期中還莫有顯出阻礙來。德國最高軍事指導在當時非常嚴重的情形之下，企圖用優良的德國陸軍在西方採取突擊戰略擊破法兵，挫折法兵與法國民族的意志，這是完全正確的。因此戰爭一開始就用有計畫的動員好的補充隊伍來參加第一次決戰，於是就有人責備牠，說牠把原來的補充隊伍都加入在第一次決戰的原故，所以後來在戰爭過程中就缺少補充了。不過假使當時藉補充隊伍的助力把戰爭打贏了，自然不會發生這樣的責備。這是一個極嚴重的事實，西方最高軍事指導的計畫失敗了，其原因在領導處而不在隊伍本身。假使我還要把這些原因引證出來，那就說得太遠了。訓練上比敵人優越的德軍沒有奪得勝利。戰爭就這樣延長下去，逼得一切國家補救平時怠慢了的事情。現在別的國家都盡力提倡軍隊的訓練，並且慢慢趕上了德國軍隊訓練的程度。我們不能够在數週或數月的訓練中養成作戰完善的兵士，而且給他們以超敵人的優越感覺。但是數量的意義究竟是發生鮮明的作用的。同時在德軍中還極端感到子彈及其他戰具的缺乏。這種時有的缺乏，在那些可以支配



全世界軍事工業的敵人方面，是容易解決些。敵人就這樣很順利地利用他的數量及戰具的優越性。這個在陣地戰中就表示出來了。譬如同量隊伍的敵人可以多獲得休憩，而我卻不能夠使相等的德兵照樣休息，更加以德兵此時當着正面火線，處在極猛烈的敵方礮火射擊之下。於是我們數量上衆寡懸殊的隊伍，需得比敵人耗用更多的力量。

從古時代起，武力就是包括那作過強有力的戰士的人及技術二者。劍、盾、箭、和弓、戰車、投石器、及石造的防壁等，歸根到底都是『技術的輔助工具』。到現在仍然是這樣，而且這些工具——進攻與防守的工具——越增完備了。譬如用鐵路、汽車、兵艦、和飛機來調動兵士，運輸武器也越加需要。沒有這些一切『技術的』輔助工具，及類此的別種工具，軍隊及其應用就完全不堪設想。

世界大戰時的軍隊也是如此，除兵士本身之外就是採取各種戰具形式的『技術的』輔助工具，從最大口徑的，多量子彈的，及數公里的射程的大礮起，到那戰鬪者用來擲最近距離的手榴彈止，都是鬪爭和運動的工具。除鐵路之外又加上了汽車。鐵甲戰船巡行於海間；潛水艇移動於水底，飛機翱翔於空中。但是在世界大戰之前，戰爭技術還沒有發展到如大戰中及今日所有的程度。

這種工具的意義在戰爭中自然顯露出來，而且戰爭愈久，牠的意義就愈是大。努力用加強的火力來消滅敵人及保護自己的力量，更引起隊伍之廣大的工具裝備。於是除輕機關鎗之外又加上了重機關鎗。製造了各種口徑的迫擊砲，構造了速擊的手鎗。大砲加增了各種口徑，子彈的製造愈是增加。裝備有輕機關鎗和輕砲的鐵甲車也被加入到戰鬥中去。汽車和摩托車愈是被利用來移動小量的隊伍。製造了隨其戰鬥任務而模型各別的飛機，及其用來投擲的炸彈，爆炸和燃燒品也更完備地製造出來。人好像逐漸地退到後面去。我本人在參加最高軍事指導的時候，曾注意使在最前線的人在可能上用機器來代替，這就是說，我加上了很多的機關鎗用以增加火力。因此我可以把只是使用鎗的步兵從最前的戰鬥線上調回來。我讓製造了很多很多的子彈輸送到戰鬥的隊伍那兒去，用以消滅敵人而同時保存他們自己。敵人已經同樣地先作了。補充對於世界大戰那種物質戰爭所怠慢的東西就急不可待了。（註二）

然而歸根到底還是人在駕御那種技術的補助工具。技術和人兩者，或者正確一點說，人和技術，成爲軍隊的力量。人常是佔在第一位的。他被死的物質運載着，用死的物質對當敵人，而給以摧

毀他們的力量。自世界大戰起用『技術制技術』之後，直到現在都常常辦到了。用技術防禦工具來敵對技術的進攻工具。戰艦裝甲就使得構造打壞這種鐵甲的大礮。戰船速度的增加及附帶的困難，就是本身在大速度之中控制那已在大速度中行走的敵方戰艦，使得構造完備的而可以機械式地轉動的測量和辨別方向的器具。同樣在別一方面也是如此：制服坦克車就構造了輕礮和較大口徑的機關鎗。制服飛機就製造了高射礮，及精確的瞄準器，和遠達的探照燈。我們可以說，相互間技術輔助工具的鬪爭，慢慢地使得進攻和防衛工具互相抵消，或者發見別種東西來抵當，譬如用各種阻礙和封鎖來克制摩托化的縱列等。

自然，一種技術的輔助工具的新發見對於一個戰爭的結局不會莫有重大意義的。但是兵士本身無論如何在一個歐洲的戰爭中，將常是站在最前面的。在一種殖民戰爭中，此時具有技術上優越武裝的隊伍，和那絕少有鎗枝和子彈的部落鬪爭，自然表示出一種不同的情形。全民政治的義務就在於使有防禦能力的男丁都聽從軍事領導的支配，保持隊伍最高度的武裝，平時就給軍事領導以戰勝敵人的，保持自己隊伍的，及保護自己民衆的，一切技術的輔助工具。因爲在戰爭中

製造技術的輔助工具常常耗費時間，而改造戰爭上不可用的器具也同樣耗費時間。這兒也就是技術武裝的弱點。假是在平時就採取了製造戰具和改造戰具的周到的步驟，這個弱點是可以減輕的，所餘的不過只是訓練上的困難而已。習慣了用廣大的技術輔助工具來鬪爭的兵士，在戰爭過程中愈是不能缺少戰具。（註三）

這種從來未有過的非常的物質戰爭，用各種快火的輕便武器，機關鎗、迫擊礮、和大礮等，放射出非常的子彈量，鬆弛了陸上敵人射界內最前戰鬪線的隊伍，孤立了那些戰鬪員。當我還是青年軍官的時候，在練兵場上就曾經經驗過了。有時統一的大隊也被用來加入最後的決戰去，不管這時已經是很有效的時候了。陸地戰爭中單個的戰鬪員必需全靠自己，在最激烈的敵人礮火之下，最大的生命危險之中，奪取勝利。因此要在許多可怖的時間中遏制他個人自身保持的意志，有時還需用手榴彈或刺刀來克服那勇敢不退的敵人。這是全民戰爭向個別的戰鬪員提出的非常的要求。爲更明瞭這點起見，我引證我的戰爭回憶中關於那些困難的鬪爭所寫下的話。這時候德兵必需完全靠着自己在塹壕中爲民族生存保持而鬪爭。但是這些話對於任何別的作戰行動

也有效的，因為任何作戰行動在將來也會用相似的武器和軍火作戰。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佛蘭得（Flanders）地方開始了那驚心動魄的第五齣。人類理智在戰前想像不到的，無量數的子彈，被用來向人類肉體上拋擲去；這些肉體都散在地上濫泥的礮眼中，極窮乏地苟延其生命。凡爾登戰場的恐怖都被超過了。這已經不是生活，而是一種不可言狀的苦痛。進攻者從那濫泥世界中慢慢地，但是不斷地，夾在緊密的羣衆裏滾過來。在我們彈雨的前衛場中他被射中而倒地了，於是這個寂寞的人兒就這樣絕命在戰場上。隨着羣衆就過來了。鎗和機關鎗都塞滿了泥土。於是就來一個對一個……』

全民戰爭這種鬪爭本質向戰鬪員要求在一種必要的獨立行動下從來還未曾需要過的精神上的穩定。我參加最高軍事指導後，就給陸軍以新的活動形式，配上擴充了的技術，使得他們首先保持生存與鬪爭能力。這種形式保持到一九一七年。但是到一九一八年隊伍開始失掉其精神上的重心的時候，就發生了反作用。一個敵人的坦克車對於我們的兵士起初並不是可怕的。他們可以撲滅牠。但是後來就不同了。精神的張力因革命化及極強的直接的需耗而鬆弛了。於是坦克

車就成爲最嚴重的危險，而且常常獲得勝利，德兵此時就不能夠奪去這些勝利了。

我上面舉出步兵鬪爭的實例，因爲牠能够特別表示出一種迫切的情形。無論那一科的軍隊，在敵方礮火之下，實行嚴重的義務時，出動他的生命來打擊敵人，消滅敵人，或者爲達到此目的而施行特殊任務等等，就只靠自己的行動，及他本身精神的力量。同樣在敵方礮火之下，駕駛那些複雜的戰鬪機器，也需要強幹的精神。譬如這，個就不是一件細微的事情，能極強烈的敵方礮火之下，很安靜地除去一個機關鎗的上彈阻塞，使牠重新能夠被應用起來。或者艦隊相互戰鬪中，在火光四起的戰艦上，不管敵人如何拋擲打穿鐵甲的手榴彈及其毒氣作用，還細心地施行那種駕駛大礮所需的任何動作。

全民戰爭的本質及那種平常不過是一種死材料的技術輔助工具，向戰鬪員提出從來還未有過的要求。這個需得特別加以申明。不但是需要訓練的深入化，而尤其是需要用堅強精神而達到的軍紀的深入化。關於這些，我寫在我的戰爭回憶中，那時正是我當聯隊長的時候：

「在軍紀強化了隊伍中，我就去教育出那些能自動的，富有責任心的兵士。軍紀不是消滅個

性，而是加強個性。軍紀應當是大家同等的工作，擯斥任何個人本身的思想。只向一個目的邁進，這個目的就是勝利。』

軍紀向戰鬥員要求這樣強化了的訓練，使他在生死困難的時候，就是在反對他自身保存意志的鬪爭中，『機械地』作出許多爲兵法對於戰備必需要求的事情。用以消滅敵人，實踐一種在極度生命危險下的行動。一個被置在統一的羣衆裏面的戰鬥員是被羣衆推動着。他感覺到羣衆的目光都注視在他的身上，他藏身於他們之間而被他們運載着。他們也給他以精神上的支點。在羣衆心理支配之下，他以這個羣衆中一個環節的資格來活動。與此完全不同的，是那寂寞的，只靠着自已，而必需在戰場上完成他的任務的戰鬥員。他沒有依靠，他必需具有精神的力量來克服他內心中的自身保存意志。軍紀在這兒就可以幫助他。但是軍紀并不只是在『立正』，也并不只是在戰備的訓練中。兩種在和平時都可以由一個怯懦者，也可以由一個『不滿者』實踐出來，也許他們還真正這樣常常表示以圖欺騙。軍紀是用來達到精神的穩固和教育，達到勇敢的，無畏的，英雄的行動。爲了要能够忍受那種在鬪爭緊張中非常的，而爲全民戰爭所特有的辛苦，軍紀必需很

據在種族和民族的認識上面——對於民族和家鄉的愛——及密切結合着兩者的感情之中；根據在民族精神的呼聲和民族精神的知識之上。兵士必需犧牲自己有限的生命來為民族底不死的生命。我們種族遺傳底精神的特性，要求一種自由意志，就是說一種行動上的自動。德意志的神的認識使個別德意志人對於民族保持負擔起重大的義務。顧慮這種種族遺傳，及其特有的神的體驗，和神的認識，正適合戰爭對於戰鬪者之要求，構成真正的軍紀之基礎，給軍隊一種不可摧毀的堅固性。我們還要知道，團結軍隊的是軍紀而不是宣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的事變，對於宣誓的價值如何，就明白地告訴我們了。現在無疑地要給軍隊一個完全不同的支點。德意志神的認識在生活底各方面都發揮形成的作用。為全民戰爭所要求之民族統一和軍紀，都根據在這種神的認識上面，我在大戰時曾寫道：

### 精神創造勝利。

現在，我認識了一切國家中對於軍隊之同樣的保護，訓練，和武裝，我寫道：

堅強的精神可致勝利，但是還須具堅強的體格。德意志神底認識就給一種堅強的精神，而且



## 保護堅強的身體

軍事教育需顧及種族遺傳的特性，啓發民族的精神。牠必需繼續家庭和學校已開始了的工作。假使這些都把牠們應作的事情作了，就自然會得出兵士底民族的教育來。於是兵士對於種族遺傳與精神上的特殊性，對於不死的民族之民族精神，及個人爲本身和民族之任務等都明瞭了。現在大部分國家還未有這樣的教育。所以許多國家都企圖使男性青年受一種特定的軍事的羣衆訓練。好的，就讓牠們這樣作去罷。也許這個適合於那些被基督教弄得支離破碎的民族，藉此給青年一種共同的民族生活的情感，使他認識對於民族和國家的義務。一種身體和精神都健康的強壯的，自由發展的，以民族和國家作根據的青年，而且認識他們民族的敵人和敵人種族的缺點，這些一切就是德意志神底認識所澈底要求的。這個對於兵役的任務，比那種馴馭好了的，在羣衆裏面教練出來失去了人格的青年好得多，因爲前者在其必需的自立的行動上比後者能勝任些。要想在他們青年時犧牲他們的本來面目而施以軍事的教養，這是不對的。縱然他們在這種或者那種情形下不易學習機械式的東西，這也沒有多大的關係。他們精神的力量會使得他們及時成

就卓越的事業。

假使我今天想到，從前陸軍怎樣怠慢了加強青年兵士的民族感情，假使我想到，那些毫未具有民族訓練的預備兵及國民軍人，怎樣在服役期後完全被委棄在那些仇視民族者的破壞影響下面，假使我想到，世界大戰中是用了些多麼不中用的方法來施行愛國主義的課程，那麼，我就只有驚嘆德國兵士內心中是怎樣的震盪着那種民族精神，使得他們長久在那危及生命和健康的，非常的缺乏，極大的辛苦，和不斷的鬪爭中，反抗那些『不滿者』的誘惑。我不懷疑，要在德國兵士及一般德國男子的內心中喚醒他們的感情，使他們出動自己的生命來保證民族的生命，是容易達到的。沒有國家在編造青年的軍紀的時候，可以放棄那種在本位的神的體驗中的民族精神，保持這種精神在民族中，特別是在積極服役期內和服役期後的軍人中。

軍紀沒有軍事的整頓和服從是不可思議的，實在這已用不着再申明了。

全民戰爭中，軍紀將受到最嚴重的實驗。所以需得把軍紀留心在軍隊中培植起來，首先把牠施於補充兵士。不過使人驚異的，是有些軍官本身在戰場上都沒有認識維持軍紀的意義，至少沒

有努力維持得如實際迫切所需的一樣。德國後來停泊於內地港口的艦隊及補充隊形中，因為受了國內那種瓦解的影響，軍紀就鬆懈了，常常不被人注意了。這兒既莫有認識軍紀的意義，也莫有認識『不滿者』活動的意義。實際上，補充隊形訓練人員之選擇就主要促進了這種情形。全民戰爭時不只要是在軍隊之戰鬥部分中，而且也要在距離敵人還遠的部分中堅守軍紀以防『不滿者』分解的影響。軍紀在戰時比平時還重要。在一個為民族之生存保持的爭鬥中，用特種法律來迅速地、嚴格地、不容情地懲戒對於軍紀之侵犯，是必要的。（註四）

軍紀結合着全部軍隊；牠纔能够把他們的效率實現出來。軍紀也保障軍隊底一致的行動，牠結合個人在全體之中。我上邊所講的自立的行動，雖是一種例外，但是這種例外給現代兵士的軍紀一種特質，因為軍紀在必需的堅持極度緊張之下也需得實行。軍紀自然不只向『無名的兵士』要求實踐，同樣也向其上官，直到那直接隸屬於統帥的最有名的將軍們要求實踐。這些將軍都需遵守同樣的軍紀，同樣的秩序，固然他們必需愈有資格作自主的、決斷的行動。他們對於默守規矩的軍紀與自立行動的軍紀，都需兼籌並顧，等量齊觀。關於這點以後再說。

平時軍隊裏那些召集了的同年兵不斷變換着。這一批繼承那一批，餘下的只是下級軍官和軍官。他們構成軍事的職業等級，保持着軍隊的傳統。他們是部隊戰時和平時的教育者，及部隊戰時的領導者。雖然每個軍隊裏面都從後備中調出軍官和下級軍官來加強正式軍官和下級軍官團的行列，然而事實上沒有變更，這使得常備軍中軍官和下級軍官的職務成爲非常的嚴重，他們的教育也成爲當道機關非常重要的任務了。他們應是富有氣格的模範人物，表彰軍人的道德，實行一種模範的生活。兵士在第一顆子彈發聲的時候就望着他們。部下對於他們的信任心就是一種試金石。是否他們正確地理解了兵士的精神，正確地指導了兵士，是否他們對於部下的保護置在自己的福利之前，是否正確地提倡過訓練，正確地、安靜地、不容情地執行過軍紀。這種信任心同時也就是軍紀底最有價值的基礎。

除此之外，以人和軍人的資格在任何關係中都要確實可靠，這應爲下級軍官底特別的標記。這使他博得那些與他密切共同生活的部下的尊敬。

軍官的事情在某種樣式下比較容易些。因爲他的生活比較隔離。不過他的責任比下級軍官

的責任就更重大了。這個已直接根據在他的地位上。他施行擴大的監督，他要實際對於兵士和部隊的訓練和教育的原則，及隨他的地位增高而成正比例增加的內部的強化。在民族軍隊及全民戰爭的時期，軍官只有對於民族的統一，軍紀的基礎和意義，看得清楚，穩穩地站在民族的生活，而且認識軍人精神的本質與民族的本質的時候，纔能够完成他的任務。從前的軍官團就缺少了這些，牠立在民族生活之外。牠不認識民族的思想，只認得國家的和帝制的思想，這是被時代性限制了。不過戰爭經驗的迫切地教訓了我們，這些東西是不够的。一種特殊的等級榮譽，即是只有穿着軍服纔證明的榮譽，對於軍官是不存在的。榮譽只有一種，而且是不分男女，屬於任何一個國民的：這就是他要成爲民族同胞在保持民族生存之鬪爭中的模範教育者，和領袖。他的義務就在於留心正當地完成這個高尚的任務，不要辜負了牠。他在國王般的自由意志中，爲任務本身而努力，不是藉此圖昇官發財的。

這樣纔使得他不僅在軍事的，機械的方面成爲兵士的領導者，而且可以把握兵士的靈魂，成爲他們真正的領袖。假使不是這樣，那麼，部隊的堅固性就不能長久勝任全民戰爭的一切要求。鑽

營官職的徒類在平時就是破壞軍官團與軍隊底道德的結合的。

凡是此地關於軍隊下級軍官和軍官所說過的話，同樣也適用於軍隊中的特種組織之下級軍官和軍官。譬如那些保管大礮或他種技術材料的人員。或者艦隊中監視機器和指導其運轉的人員。同樣也適用於下級軍醫官和軍醫官。他們在其嚴重的職務中顧慮軍隊的健康及病者和受傷者的復原。同樣也適用於軍隊中那些許許多多的會計事務員及司令官管理下的會計事務員等。雖然他們一般地都不在戰鬥中『領導』戰鬥員，但是他們對於部隊的戰鬥力之供給和保護，因此也間接的對於軍紀負有重大的責任。

譬如一個軍醫在醫治受傷者和送回他到火線時，或者在徵集的時候沒有盡心處置；或者一個管理員怠慢部隊的供給，或者甚至在購買時缺少必要的確實性等，那會引起什麼樣的損失呢？軍隊不是機械化了的組織，牠是一個必需生活和健康的有機體。假使牠病了，或者表示出衰敗的現象，那麼，這就足以給民族的精神統一以分解的影響。

數量、訓練和武裝，是一個軍隊力量底外部的表徵，但是精神的和道德的實質，纔給牠的力量，

使牠能够真正長久勝任全民戰爭的要求。

(註一) 個別國家對於作戰使用資格提出不同的要求。譬如德國就提出比法國較高的要求。德國只編入個別年級中被認為有作戰使用資格的男丁百分之五十四，同時法國就編入了百分之八十二。不同種族的人不應當共同屬於一個國家的軍隊裏面，如猶太血統的人不應在北歐民族的軍隊裏面，「白種民族」的軍隊不應當包含「有色人」隊伍，因為他們都不是為的民族生存而鬪爭。

(註二) 當我參加最高軍事指導的時候，德軍中的戰具很壞，最缺乏迫擊砲、機關鎗、和子彈。這值得使人非常努力，而且也真努力作了非常的事情。但是從前無意地消耗了許多人力，重大的損失都認為應當如是而忍受下去了。

(註三) 一個數百萬衆的軍隊需要多麼大量的戰具，這對於許多人都是不可想像的。德國軍事管理在一九一四年因為軍隊裝備不充分的原故，於是需得取用一八七〇年時製造好的存品。假使現在有人說，世界大戰後敵人奪去我們的武器反轉對我們是好的，因為我們現在就只有新的了，那麼，這就是一種對民族的惡意的欺騙。

(註四) 這好像是一個很自然的要求，但實在不是這樣。譬如世界大戰延長之中，軍紀鬆懈及逃亡事件增加的時候，德國軍事法庭在一九一八年就完全失效了。牠頒佈禁錮刑法，用以制止在可怖的敵人砲火之下的逃亡者，而不施用死刑。但是一年以前，法國軍事法庭為施行其道德上的義務起見，頒佈了死刑。

## 五 防禦軍之成分及其出動

軍隊的任務就是在鬪爭中把敵人打敗下去；因此牠必需編制整齊，以便陸地、海上、和空中都能够出動。牠是由陸軍、海軍、和空軍三者集合而成。但是這三者的價值在個別國家中完全不同地被估計着。英國主要地是看重海軍和空軍。陸軍的重要性在那兒遠在其他二者之後。德國的陸軍和空軍在一個全民戰爭中的重要性則在海軍之上。其他的國家則各就其地理的形勢，海岸線的開展，及戰略上的可能，而各具與此相適應的分配。空軍與陸軍海軍之強度比率也不同地被判斷着。但是隨飛機之完備化，及那種出動飛機來襲擊敵國底經濟和民衆而影響戰爭勝負之可能性的加大，（註一）這種武器的重要性也提高了。至於牠們用在偵察方面的意義就更不用說了。作戰必需除了強大的陸海軍之外還具有一個強大的空軍。空軍的力量必需強大，而且必需隨敵人空軍之進步而增加其強大。但是這種強度也有技術上和財政上的限制。此外空軍出動還常以天氣



雲霧之狀態爲前提，陸軍卻在任何天氣中都可以進行，只有在濃密的霧中纔不可以進行戰鬥。  
(註二)

大陸國家決定戰爭勝負的是在陸上。陸軍互相戰鬥爭取勝利。這兒空軍除開偵察任務不談外，需直接加入戰鬥，共同爭取勝利，但是牠的火力和陸軍火力之比較只具有次等的意義。可是要奪取贏得敵人的勝利是需要火力，需要最強的火力。沒有統帥認爲只要用炸彈來轟擊敵方民衆就可以簡單地獲得勝利了。因爲首先還沒有把握，是否飛機因增強了的空防和天氣情形，向敵國民衆轟擊時可以達到目的。戰術是一種實際而不是理論。這種實際首先要克服敵人的陸軍，然後這個勝利的陸軍和空軍纔能在敵國中敵方陸軍的背後活動。由此而論，大陸國家軍隊的力量是在陸軍裏面。這算是一個原則上的說明。

陸軍底戰略上的單位是步兵師。一師一般的是由三個或者四個步兵聯隊，共九個或九個以上的步兵大隊（每大隊有三個步兵中隊，除了步兵的連發鎗之外還帶有輕機關鎗），及一中隊重機關鎗，或者還除了一個聯隊聯合和一個迫擊礮中隊之外的機關鎗隊組織而成。兵士需親自

帶着許多步鎗子彈和手榴彈，其他的子彈則用車輛載着。（註三）

關於大礮方面，步兵師帶有九個或九個以上礮列的輕礮，及野戰榴彈礮。每礮列各四尊礮，（註四）或者還有較小口徑的礮，用以掩護步兵進攻。此外還有約十公分口徑的重礮，和十二或十五公分口徑的重野戰榴彈礮，及空襲和坦克防禦礮等，都有大量的子彈載在無數的車輛上。

除此之外，步兵師還可以支配少數帶有輕機關鎗和鐵甲戰鬪車的騎兵，（註五）或者還有一個陸戰飛行隊，一個具有電報、電話和無線電器具的傳達隊，一個或者二個工兵中隊，及其他的專門隊形。然後還有用以補充糧食、子彈、發動品、塗油等的縱列和輜重隊，及麪包製造隊、衛生隊形和陣地醫院等等。

這樣的師是由平時軍隊之隊伍部分組成的。或者是由後備年級之兵員，再加上一些平時軍的幹部組合而成的。因為這些後備師後來也需得如正式師一樣，解決同樣的戰鬪任務，所以兩者都應有同樣的組成和武裝。我們不應當把牠看輕，可惜世界大戰前德國陸軍就這樣錯行了。

為解決小的戰鬪任務及安全目的起見，於是從最老的年級中組成各種後備隊旅及國民軍

隊形。牠們也需得在任何方面能够用所有的武裝來解決牠們的戰鬥任務。

這些組織的成員都隨身攜帶着幾天的糧食。車輛上還隨載着更多的必需的糧草。與此相應的也調節了看護第一場受傷者的醫藥材料的裝備。其他軍隊部分也是同樣辦法。這裏我就略而不詳了。

除上面所引證的『步兵的』單位之外，還有騎兵師。每師約包括幾個騎兵聯隊和少數礮兵中隊。這個在大多數的國家中都摩托化了，裝備上無數的機關鎗及強大的子彈量。摩托化了的部  
分帶有輕便戰鬥自動車及無數的汽車，用以運載軍隊、機關鎗及子彈。此外，個別的國家有重的戰鬥自動車隊形，帶上各種裝置和各種鐵甲強度的坦克。這樣的鐵甲車隊形可以用鐵甲車的環鍊軌條克服地上的障礙，超越建有防禦工事的陣地。

至於摩托化是否只限於摩托車的特別聯合，或者還要擴張到用貨物自動車裝載的步兵隊形上去，現在還不能下一定論。領導這些聯合最感到困難的就是攜帶高級將官的馬匹之類。

陸軍還有重的和最重的，駕馬的和摩托化了的礮兵隊，這些礮兵隊除擁有大礮及榴彈礮之

外，可能上還有師聯合之外的陸戰隊聯合。有時也許還應用火車拖曳的最重的礮。還有探照燈、火焰投射器、工兵、包圍及情報隊形、毒氣戰鬥隊伍等。

上說的部隊和部隊聯合集合爲軍，而這些軍又集合爲軍集團。牠們的最高司令部具有特別的偵察和情報組織及防空礮等。

末了，各方面的輸送、補充、及對於傷者和病者底供給所需的兵站、和鐵路隊形之廣大的召集等，都隸屬於軍司令之下。這些就構成陸軍與內地的環節，可以使那些兵士羣衆能够實行大戰與長遠的出征。假使能把這種出征軍推展到敵國裏去時，那麼，這就可以使當地的鐵路由一個在國內準備好的特殊組織來管理。

空軍具有重的和最重的飛機用來投擲炸彈及施行特殊任務，譬如在敵方火線後救載兵士之類。還具有輕的，只用來作戰鬪和偵察的飛機。全體飛機，偵察機也在內，按照其體積大小，都裝上用在空中及向着地面作戰的武器。如快射鎗、輕便機關鎗、和小口徑的礮。下投箭、炸彈、及化學的戰鬥品提高了牠們的戰鬥力。牠們還攜帶有飛機損壞時拯救乘員的緩降傘，飛機的外殼也不易被

子彈傷損，飛機還可以攜帶宣傳材料去拋擲。

空軍最小的單位是少數飛機的小隊，這些小隊聯合成爲分隊，而這些分隊又可以集合成爲更大的單位。飛機需靠飛行場，場的大堂和油槽一部分裝在地下。牠們需要空防及一個摩托化的輜重隊，用來在距隊伍不遠的掩護樹林中輸送後援，特別是用於發動機的發動原料。

海軍擁有大約三五、〇〇〇噸排水量的戰鬪艦、一〇、〇〇〇噸的裝甲巡洋艦、及輕的大約六、〇〇〇噸的巡洋艦、以及輔助巡洋艦（從前是商船）、驅逐艦、水雷艇、潛水艇、礮艦、水雷敷設船、及水雷搜索船、航空母艦等等。一切這些船舶都裝備得這樣，使牠們可以在海上耽擱較長久的時間。此外，牠們還須靠港口上對於船員的供給，油炭的添給，及其他的補充等。醫船、油船、及其他供給船等就媒介這種岸上的供給。

這些戰船都隨其體積大小而擁有重的和最重的快火大礮，及防空高射礮。這些戰礮都陳列得這樣，使其最順利的火力總合由船側面出發，船頭和船尾只可以總合一部分的火力。戰鬪艦大部分還具有一種特別的水雷裝置。

除開那些以個別的巡洋艦作戰的巡洋艦戰爭，及單獨以潛水艇作戰的水底戰爭之任務不談外，海軍的戰船都集成爲分隊、小艦隊，及在較大的比例上的艦隊，包括戰鬪艦、大小巡洋艦、驅逐艦、水雷和潛水艇。

海軍下面也和陸軍一樣，隸屬得有航空隊形，這些或者是裝在航空母艦上，或者潛在陸上飛行場中。

一切陸軍和海軍的戰鬪隊形，都裝備得有防毒面具。

軍隊所有的組成部分如陸軍、空軍和海軍，都有牠們的補充隊形，及其他的設備在國內，由這些可以常常輸送新的力量給牠們。

軍隊在國內還具有用來保護特定的設備及居民的防空隊形、探照燈、及空中封鎖。

末了，軍隊還有大的無線電臺用作情報的傳達和宣傳等。

軍隊的召集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不是所有的部分都用來作直接的鬪爭的。但是牠們都是共同用來摧毀敵人的反抗力，特別是在戰場上的決戰中消滅敵人。

決戰就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兩軍交戰是一種最有意義的戰爭行動。上面所說那些戰鬥組織都須加入其中。牠們中間所潛蓄着的戰鬥力都須向敵人發展，使敵人在排山倒海般的火力之下而遭覆滅。出動隊伍出去衝突，本來是很簡單的，只要敵人未具有大略同等的武器。可以施放具有殲滅作用的發射物到很遠的射程。這時就不只是打敗敵人，而且還須得保持自己的力量。

武器的作用逐步地增高了。當火藥發明之後，人們都用球彈，後來慢慢的又輸入了榴彈。後者是這樣一種發射物，裏面裝滿了火藥，外有一條火絨，火絨在投擲榴彈向地上時，碰着牆或者船板就引起火藥爆發，因此把榴彈的外壳分解成爲碎片，而發揮其作用。別種榴彈還可以穿透鐵蓋和鐵甲。後來又製造了一種礮彈，牠的火絨安置得這樣，可以在彈道底特定的地方使彈爆裂。這種內裝鉛彈的礮彈是從爆發點出發對着目標直去，牠由上面射中目標。現在這樣礮彈是很完備化了。那種與此相適應地構造的榴彈可以打穿最堅的鐵甲，或者透入目標裏面去纔爆裂，使其彈壳的爆炸或者榴彈散放出來的毒氣發揮效能。別種榴彈只迅速地和地面接觸後就分散成爲無數的密佈在地面上的碎裂塊片。同樣的那種在空中爆炸的礮彈（流霰彈）也改良了。

機關鎗彈和鎗彈只發生單個彈的作用。

手榴彈、迫擊礮所放射的爆炸品，及海裏面敷設的爆炸品、水雷，與榴彈都有相似的作用。飛機炸彈極量發揮破裂和毒氣作用。在爆炸毒氣作用之上還加上燃燒作用。有些炸彈種類的重心點就在這種燃燒作用上。

燒夷彈發揮火烟的作用，毒氣可以使人的黏膜和肺部中毒。

這種武器發生作用的距離，或者說可以發生作用的距離，有時是非常可驚的。

古時——我們的曆算之前及以後不久——敵人都是用短的劍一個對一個地廝殺。但是他們此時也就攜帶得有箭和弓，或者長的投槍，或者投石器，用以勝過敵人。圍攻城堡時就從很遠距離處應用投石器。自中世紀時發明火藥及施行火銃後，敵人就互相分離開來作戰，但是他們都還站在百尺以內距離的統一陣線裏。以後隨大礮、鎗、和子彈底完備化，敵人就愈是分離得遠些，慢慢地到十八世紀的末葉，纔開始組織塹壕隊形，而利用地形以作掩護。

我回想到上一個世紀的中葉，施行了鏟條鎗，改良了火藥和子彈，於是射程不斷的加長，以至



在幾十年之中就達到了現在的距離和作用。使得戰鬪地帶深入化，但是後來纔展開火線，鬆懈戰鬪形勢。海軍大口徑的礮可射到二十至三十公里。陸軍的礮除特殊重礮的效用之外，則落在海軍之後。師聯合裏重礮隊的礮有從十公里到十公里以上的射程。輕礮隊的礮則自十公里到十公里以下的射程。鎗和機關鎗有到二千公尺的射程。迫擊礮只有較短的幾百公尺的射程。水雷大概現在可以射到十公里和十公里以外的距離。炸彈自然可以從任意的高處向下投擲。（註六）

我們看得很清楚，因戰器、火藥和礮彈技術的增進這些武器最大的作用（除飛機轟炸不算外）不是發揮到極遠距離而是在比較近的地方，牠們的瞄準性也不斷增加。水上和空中，雙方敵人之間沒有遮蔽的地方，在這種條件下射程纔會被利用到極端的限度，否則因為雲氣、霧和其他的天氣情形，以及海上地球的彎曲形，都可以阻礙牠。陸上的情形就兩樣一點。這兒地形樣式，地上遮護，及建築等，都常常屏蔽敵人的視線，使他們不能完全利用其射程。然而那些偵察工具，如望遠鏡、繫留氫氣球和飛機，又擴張這種視線。無論何處，地上、空中、或者水上，鬪爭是從最遠的和遠的距離開始的。為極度增高火力和出動一切戰具起見，以後必需去接近敵人鬪爭，陸上戰爭常有數公

里深度的戰鬪地帶。

在這個戰鬪地帶中，如我所指示的那種緊張統一的形式就鬆緩了，以致於後來單個步兵或者應用一架輕機關鎗，純靠自己去行動。同時那個經過一公里路程須十二分鐘的步兵必須在最強的敵人礮火之下越過地界而攏近敵人。這個只有在敵人底礮火作用逐漸停止的時候纔可能的。而且這個須經過長的時間，因為敵人也同樣反抗着。於是陸上作戰需要時間，常常是好幾天的時間。出動一個迅速的鐵甲車來參與決戰，對此也無任何變化。飛機在空中的戰鬪用一小時數百公里的速度，艦隊在海上的戰鬪用一小時大概二十海里即是三十七公里的速度。（註七）二者在戰鬪中都發展最高的速度。陸上空中和海上的戰鬪是不同的。但是三者都為取得勝過敵人的優越火力而鬪爭，這一點是相同的。

爲了獲得火力優越性，必須應用現成的武器來制敵人；由此交戰的隊形之出動採取廣大火線的形式，或如在海軍中的樣子，採取線列的形式。現在的大數軍隊之陸上作戰火線，採取一種非常寬度的，這個在世界大戰終結時已經指示我們是與從前的戰爭完全不同的。但是這種闊度也

有限制。譬如在步兵師之內步兵須能得到本師礮兵的幫助，同樣，海軍和空軍作戰時也要能夠保證集合多數戰艦和飛機的火力到一個目標上去。由這種在鬪爭中的各種武器之火力集合，——照目前所能支配的武器說從最重的礮起到步鎗止，——必須在最緊要的地方爭得火力優越性。這種集合只有這樣纔可能，而且特別對於陸上的戰鬪如此，即是慢慢地要除開出動最重的礮之外，還能夠出動其他的戰具，以至於步鎗，在最有效的發射距離間向敵人攻擊。於是雙方的敵人都互相陷入彼此最有效的射界中。在這個人對人，火線對火線的時候，爭取火力的優越性，確是很困難的事呵。

集合火力來攻擊敵人只有在那種情形下是最順利，就是多方面都向敵人開火，敵人被包圍攻擊，同時他只能對付一方面。這就是說敵人不只是正面地而且側面地，在可能上甚至從背後及從空而下，都遭受攻擊。

在戰爭中從最小的戰爭起到最大的慶戰止，都須應用策略和戰略上的伎倆，同時利用敵方或有的錯誤，在陸上、空中、和水上，造成上說的情形。探冷堡的戰爭就是這樣實行的。這個戰爭同時

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進攻是可以怎樣保護我們自己的力量。（註八）在一萬二千人的本身死傷損失之下，敵人的死者和被擒者共有十二萬人，而那種帶傷逃脫的人還不計算在內。一個真正的殲滅戰爭具有雙重的意義：牠很重要地打擊了敵人，而同時自己只損失很少的力量。要想中傷敵人的側面而不從前面攻擊，就是說不攻擊他的火線，是錯誤的。敵人不是靜靜地候在那兒，而是各方的轉動着，他從未被攻擊的火線方面轉向進攻的敵人，結果也就成了正面的鬪爭了。東方第九軍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初，進襲從波京華沙到坡省（Posen）的敵人底北側面時候，就很急迫地經驗到了。他們想越過探冷堡，包圍了太廣的地方，而俄軍的火線卻未遭適當的攻擊。現在我只能略說一下。結果使得敵人從火線上挾強大的隊伍轉向他們，而且腳跟腳地壓逼着。當敵人進襲他們的外側面的時候，情形就更尖銳化了。這是很顯然的，包圍戰法需有一個強有力的梯隊配置在那包圍的，準備停當的軍翼之後。現在大數軍隊作戰常容易發生那樣的事情，就是包圍的力量又被包圍起來。這個我們不僅是一九一四年，如剛纔所說的在東方，而且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初，從巴黎那個地方起就已經經驗過了。史利芬將軍關於強化包圍軍翼的忠告是值得盡量注意的，不過

首先總要有那樣的隊伍存在而已。

最大的戰略上的包圍有時也有策略上的包圍目標，用以折回那被打擊了的敵方的軍翼，然後用更多的力量來阻撓敵人的退兵。同樣情形，只要敵方火線上有隙可乘的時候，進攻者就乘隙而進，如我在探冷堡所作的一樣。這兒首先是純粹從策略上把敵人現有的內部的軍翼捲入礮火中，然後逐漸逼迫開這種軍翼，不斷地在敵方火線中推廣這個空隙，而從這個空隙中去逐步地包圍起來。

陸上也須用強大的礮兵的戰鬪工具和鐵甲車，及空軍的火力，在正面攻擊中打退敵人，然後在一個要緊的地方衝破牠。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在西方及俄國人在東方的猛烈的突破攻擊都失敗了。德國陸軍一九一八年夏天的進攻，也使得敵人的火線強烈地內曲，而未能分裂牠。也許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的進攻能够達到目的，如果我當敵方弱處接觸第十八軍的右翼時得到報告，或者第十八軍就如牠所必需作的一樣利用了這個弱點。正面鬪爭總是常常結合着強大的本身的損失的。

雙方作戰的敵人都用猛烈的火力互相攻擊，互相利用其弱點，他們也考慮在軍翼之後深入梯隊化，在火線後面保留預備軍，用以預防將來的危險。雙方敵人中那一方能够採取進攻，那一方必須採取防守，這要看要在要緊的地方奪得火力優越性而定，只要不是從開始起，戰場上交戰一方面就放棄進攻方式來作決戰。

自然不是極度展開火力就可以消滅敵人，要消滅敵人，只有實行進攻，以至突破敵人的陣地纔能成功。就是在凡爾登 (Verdun)、蘇麥河 (Somme) 及佛朗得 (Flanders) 戰爭的最高度砲擊之下，也還有人活剩在戰場裏。以爲單用火力就可摧折勇敢的敵人底反抗，是錯誤的。可能是有時這樣僥倖成功，但是最後的決戰卻還在陸上人對人，坦克對人，或者坦克對坦克的鬪爭中。在那寂寞的戰場上，進攻的步兵必須從遠處攏近敵人。他需要自己砲隊底不斷的，增高的砲火掩護。這個砲隊須得把敵人的砲火壓制下去，然後趨近敵人，進襲敵人的步兵。他還需要輕便掩護砲的直接的砲火幫助。末了，步兵還須帶上重機關鎗以自助，以便在加強的步鎗和輕機關鎗的彈火掩護之下趨近敵人，有時再助以迫擊砲，直到步兵在突擊中逼得敵人肉搏作戰。坦克車比步兵走得快。

但坦克車只有以後——只要這時還有這樣的坦克車存在——纔加入進襲，然而就是這個時候步兵或那坦克駕駛員都還須得克服敵人。儘管那大量火力發生如何猛烈的作用，然而決定鬪爭的還是人。這不只是在陸上如此，就是在空中、海上和水底也如此，不過在不同的條件之下而已。攻擊者在這兒必須在一切戰具不斷增高的火力發射之下，趨向與敵人間較短的，以至最短的距離。

全民戰爭是要求決戰的。因此牠向領導要求進攻要害的地方。我特別說進攻要害的地方，因為在一個多面火線戰爭中的長火線上，不是任何處都可以進攻的。敵人的力量就阻止這種進攻。領導的藝術就在於——不管陸上、空中、或水上——時常運用優越的人數和戰器，即是運用一個訓練成功的力量重心，在進攻方向中襲擊敵人的弱點，用以達到勝利，造成敵人的敗北。出奇制勝在這兒是具有莫大的意義的。

因摩托化的隊形及空軍之活動性——我仍然只談陸戰——足以迅速集合力量，加在戰線上任何地方，於是這種出奇戰略更加有利了。不過敵人的空中偵察在可能時又可以阻撓牠，雖然，自然要完全阻止牠也是不可能的。譬如在陸上是可能的，用步兵師攻擊敵人底正面和側面，用摩

托化的隊形向其背後襲擊，未了還從上用飛機傾擲火和炸彈。相似的情形也可以發生於空戰——只要能够飛越敵人的航空汎界而包圍牠們——及海戰中。陸戰和海戰只要已先在空戰中奪得空中的優勢就容易成功了。一個失去遠大偵察眼睛的軍隊總是很容易被一個具有這樣偵察，而且還能從空中極有效地不管怎樣防禦向地上和海上進攻的軍隊擊敗的。

因火力作用之增高，於是那種避免射擊的努力也愈是加大。這就引起了陸地戰場上隊形之分散化，戰艦裝甲、及製造戰鬪汽車、和鋼盔等。並且這些東西現在已成爲一切軍隊普遍的所有物了。

同樣使用人造霧以躲避敵人的視線，隱藏自己，就如坦克車和戰艦所作的一樣；或者用以包圍敵人阻礙其觀察。關於消滅發動機的聲音，特別是飛機和潛水艇的聲音，現在還未能實現。此外躲避敵人的礮火，可以利用地形掩護埋伏在地下。自一九〇四到〇五年俄日戰爭後，那種在戰爭中應用陣地防禦的意義就固定了。世界大戰中更加重其意義。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當時成立的陣地戰只是戰爭的一種變態，因爲那些交戰國家沒有懂得在活動戰中取得勝利。假如現在還發



生這樣的情形，自然又可以施行陣地戰。軍隊在活動戰中進攻的時候，尤其是在防守的時候，也可以放棄在地下掘濠的工作。塹濠是一個最安全的工具，用以躲避敵人的火力而同時達到自己可能上安全的發射。至於是否能夠製造障礙來防衛敵隊猛烈的火力，及飛機的射擊是要看鬪爭停止的時間來決定的。在可能的時候陣地前面敷設障礙物，保護戰士在戰濠裏面突遭襲擊時不致倉皇失措。戰鬪車常可以超越障礙，而且還可以超越不是十分垂直下掘，堅實，寬大的濠溝，實際上這樣的濠溝在那種由戰鬪線而形成的陣地中是很難有的。（註九）

現在還來討論那個從前時常發生的問題，就太無聊了。克勞塞維茨也作過，也許有些理論今天還在爭論，即是進攻和防守，那個是戰爭底較強的形式？是否這種是兵法底最高的藝術？起初讓敵人來襲擊，然後趁其進攻失敗後自己纔來一個反攻。這些都是危險的，矯柔造作，蒙蔽全民戰爭的嚴重性和簡單性。從一個安全的具有良好射場的掩護地方能夠先射中那接近地面的敵人，比後者對於前者容易些，是這樣確定，就好比一乘一等於一的一樣。在這種情形下，防守就『強過』進攻，而且就在大數軍隊戰鬪中也如此。那個較弱者——總之在戰場上是較弱者——將選擇二

者之一，不管是採取一個防守戰，或者是一個爲時間利益的鬪爭，只想阻止一下敵人，以便能夠應用具有遠射程的武器，及出動摩托化的隊形到廣大的火線上去。遠大的射程強迫進攻者在距離敵人很遠的地方就採取消耗時間的戰鬪形式，展開和發展消耗時間的鬪爭，而且進攻者還往往不曉得敵人用意是怎樣的。假如進攻時的隊伍是多多益善，那麼防守時就妙在只須少數隊伍。這個就是後者的優點。雖然如此，但是進攻總是決戰的戰鬪形式，而決戰纔是戰鬪的目的。就是弱者在敵人給他機會的時候也都願意採取進攻。進攻中潛在着豪壯優越的感覺，具有一種不可言狀的力量，使正確領導着的進攻能夠攻擊一個數量上優越的敵人。

我已經說過在全民戰爭之大量召集時，優越者也不能進攻全部火線或者所有的火線。他必須防守有些地方，更進而用現有的工具穩固那由鬪爭行動或戰爭中產生出來的陣地。這種考慮使得在平時就預照將來的戰爭情形在邊界上敷設防禦工程或礮臺，用以逼迫進攻的敵人在進攻時的力量被牽制，或者使其選擇對於他不利而可以利用的動作。

法國從凡爾登到白爾富（BelFORT）的防禦工程系統使德國陸軍當時沒有力量克服，於是逼

得他取道比利時，在 Namur, Antwerpen, Lille 諸地方消耗了德國陸軍的力量。麥茨 (Metz) 的礮臺及建築有防禦工程的摩色爾河線 (Mosellinie) 逼迫法軍在其進攻時分散力量，而且假使當時德國的領導完全能勝任的話，定可以打敗那侵入羅侖 (Lothringen) 的法軍部分。東方渭克塞耳河線 (Weichsellinie) 從托恩 (Thorn) 到馬冷堡 (Marienburg) 都築有防禦工程。因為敵人還在更東的地方就被打敗了，所以這個工程的價值在戰爭過程中沒有表現出來。現在法國把牠的邊界用封鎖的防禦工程和德國隔絕起來，這種手段就像世界大戰時牽制進攻者的陣地系統，因為法國的軍事指導還想把法國軍隊領導過陣地系統，於是這個陣地系統多半具有一個被戰敗法軍之收容陣地的價值。陸地防禦建築是軍隊陸上作戰時一個重要的成分和工具。對於海上作戰也是一樣。建築防禦的軍港和根據地，以及建築防禦的河口給艦隊和船舶聯合以安全的發航可能性和安全的根據，防護重要的海岸線被敵艦攻擊，使敵艦難於停泊在特別重要的地方。因此建築防禦的港口對於商船，即是對於維持商業也有益處。

在戰爭的多樣形態中，防禦工程及防守陣地須完成嚴重的極有意義的任務。牠們應當幫助

別地方的決戰。從防守中而欲達到決戰，就只有有在防守者決定進攻，而且採取進攻時纔可能。進攻常是決戰的戰鬥形式。

在強大的陸戰中，敵對的陸軍在空軍幫助之下互相火併。在這樣戰爭中艦隊很少能夠從海上來直接參加。

在強大的海戰中敵對的艦隊在空軍幫助之下互相火併，有時陸上防禦處還參加這個鬪爭及其結局。

在空戰中敵對的飛機分隊互相火併，也許還在陸海軍的防空高射礮幫助之下。

一切這些戰爭底終極目的都是消滅敵人。

陸上海上及空中作戰時，須把軍隊單位動員在長的行軍、航行和飛行中。申言之，在預備了的鬆弛的安全之下，及顧慮到任何軍隊部分戰鬥時之火力出動的形式中，而且這樣配置軍隊，使其在可能上顧到那個被企圖的決戰，只要這個決戰是可以預先看得到的。否則軍隊的分配，必須採取另外一個順利展開力量的形勢。

因空軍的完備化和強化，及其飛行迅速與應用於偵察之可能，因出動迅速的摩托化的隊形在陸上具有自由活動的地方之可能，及同樣出動最迅速的海上偵察船舶之可能，於是就造成了——除開其他一切別的間諜、偵探、勤務不算外——從來還未有過的對於敵人偵察之可能性。這個減輕了軍隊之領導，但另一方面又使軍隊之領導困難了。敵人也具有同樣的工具用以認識那種企圖消滅他的手段。所以實行戰爭行動必須越積極越好，在陸上水上和空中攻擊敵人使牠沒有時間找出對抗的手段。因此務必用最大的行軍速率把隊伍開向敵人而加入戰爭。只要這個戰鬥一開始了，就需堅持到底。也許戰艦和飛機有這種可能性，極度增高其速度，給這個戰鬥以加速度的執行，但是這個是在其本質上如此，並不是一種躁急行動。

在陸戰中相互間都領導起具有二十公里和二十公里以上深度的行軍縱隊，在每小時四公里到五公里，或每天二十五到三十公里的行軍效率之下慢慢地，不斷地——摩托化隊形之加高的時速度和日效率也沒有使這個發生變動——在一個約數百公里闊度的火線中接觸起來，（註一）隨即加入強烈的活動戰鬥中，只要不是這一個軍隊進攻那一個軍隊防守。軍隊參戰時就

要顧慮到戰場上所尋求的決戰。須得把陸軍隊形集合在長窄的火線中，把行軍縱列深入化或者梯隊化，把重心點安置在重要的方向中，同時在不能預先尋找決戰的地方擴大縱隊間的空間而減輕其深度。不管對於行軍採取那些步驟，這些都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目標是決戰，而目的是取得殲滅敵人的勝利，用以決最後的勝負。此外常常也試用飛機襲擊敵人的行軍縱列使其發生擾亂。

與進攻者的手段相適應的，防守者也將自行準備——只要他決定採取這種戰爭的形式或者相似的形式——和應用他的力量，他將分派出後備軍以備將來參加在被妨害了的地方，同時還分派摩托化的陸軍隊形以備迅速的移動。一個活動的，目標準確的防守者，將常常自動地用優越的火力加在一個被認為敵人的弱處，而用以反守為攻。

出動軍隊在陸上作戰是緩慢的。空中和水上作戰則不然，空戰和海戰因飛機和戰艦所特有的速度發展得異常神速。雖然戰艦和飛機在戰鬥時纔發揮其最高速度，可是陸軍爲了節省車輛材料起見，在行軍時也不使用牠的全部速度。飛機飛行的最低速度是大約每小時一百二十五公

里，速度再低牠就會降下來了。戰艦航行的最低速度是每小時二十到二十五公里。出動飛機和艦隊是如我已經詳說過的一樣，要接在一個先行的運動和戰鬪發展之後，而且照陸軍隊形底一樣的原則，即是集合優越的火力在戰鬪場上要緊的地方。總之海上戰爭和空中戰爭沒有那個『防守』的概念。牠們只能進攻式地動作起來，而其經過則因其特有的速度較陸戰迅速。但是這並不和那個事實相矛盾，即是艦隊可以停在很遠的地方鬪爭。

改良了的通訊工具，就是那種用以結合軍隊內部關於情報任務和命令發施的工具，如無線電報，飛機在地上空中和海上戰爭中，電報、電話、和自動車在陸地戰爭中，信號在艦隊中和別的其地地方，都減輕了對於廣大衆的指導，及出動他們參加戰鬪與這個戰鬪底統一的領導。但是在利用無線電報的時候，須除去那種敵人能夠同時測破指令的危險。應用細心考驗過的密碼就成爲這兒的義務了。（註一一）

勝利的進攻無論什麼地方，陸上、水上和空中都要追擊，使敵人的敗北變而爲逃竄，這是一個須得三復的眞言。那種『追擊敵人到最後一個人和最後一呼吸』的命令不管怎樣正確，不過只

是一句話而已。這是一種事實，戰敗者在陸上常是比戰勝者跑得快些。戰敗者並且還能夠用少量的工具阻止追擊者，用此保證其他部分退兵的時間。從空中活動的飛機，摩托化的隊形，和鐵甲車隊形，在用於截擊時常可以襲擊敵人的側面，或突破敵人的火線，置追擊者在一個比從來還未曾有過的順利的情形中。但是牠們也會遇着阻礙，大量召集，和敵人底摩托化的力量，敵國裏火速爆發的國內戰爭等，都不讓牠們獲得勝利底全部果實。縱然如此，然而牠們還是須得用牠們的力量來追擊以完全這個勝利。那最大的成績是在向牠們招手。在水上和空中都要從『蒸汽鍋和發動機』裏取出最高的速度來決定戰爭勝負以致殲滅敵人。

我現在不用再說已經關於戰爭及在戰爭中出動的話了。關於特別的戰鬥行動，如怎樣在敵人海岸邊停泊等，我不用討論了。反之，我還要觀察一下這樣出動空軍和海軍到戰鬥行動中去，這個是根據在全民戰爭的本質上而和牠不可分離的。這種戰鬥行動也不可以在戰爭出動時分散了軍隊的力量，因為在戰爭出動中就寓有戰爭行動的重心點。譬如在戰爭開始時，一個民族就已經在開始分解，或者如一個被包圍着的砲臺可以單爲了飢餓的緣故被迫而放棄抵抗，不過這種



情形實際上是少有的。

空軍的特殊戰略，是在敵人火線背後破壞其運輸道路、鐵路及此外一切對於作戰直接和間接重要的設備，同樣也反對在裏面被雇用的工人，在這個關係上也就是反對敵國的居民部分。

破壞敵人的國防經濟須在空軍的戰鬥力沒有爲了奪取空中優勢之戰鬥任務，或者和陸海軍在陸上和海上的直接共同活動而被牽制着了的時候。究竟決定把空軍出動在那種任務上，這就是軍事領導的任務。軍事領導不可怠慢在空中決戰、陸上決戰、或海上決戰時出動空軍最大的力量。要想影響敵國的民衆也不是容易就可以作到的，尤其是那兒設備得有很好的防禦時更難。而且因空襲及其結果之故，在其民族精神中特別喚起其強大的自身保持意志。假使空中的優越性達到了，敵人的軍隊被打擊了，於是敵境就成爲空軍攻擊的目標。

就如空軍襲擊敵國的設備和民衆一樣，保護國土和民衆被敵人的空襲，也是軍隊的義務。自然牠的手段只限於最急迫需要的，如保護碼頭、車站、大工業中心，或者軍事工業底特別重要的工廠，大量的儲藏所，以及那些具有防空工具與情報設備的最大城市等。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保護

的，實際上也不是每顆炸彈都能够投中牠底目的，或者投中一個目的。雖然這樣一般地用防毒面具武裝起來，卻不是無益的事情。

海軍也須得完成特殊任務。牠須得截斷敵方民衆和軍隊的供給來源。單是決戰之後奪得了海上的統治，還不足以達到上說的目的。遏止供給的特別手段，是封鎖，和用巡洋艦與輔助巡洋艦（從前的商船或客船）實行的商業巡洋艦戰爭，及水底下的潛水艇戰爭。

敵人封鎖我們引起了民衆的饑荒和抵抗力的弱減。我們的潛水艇雖然沒有達到同樣的目的，但是牠們顯著地阻礙了法國內敵軍之各種軍事材料的供給，和英國的供給。牠們的影響用鉛一般的重量壓在協約國，特別是英國的作戰上。要想廢除這種全體的潛水艇戰爭，就是潛水艇在一個特定的封鎖區內無限制地沈沒一切撞着的船隻，不管牠也挂着中立國的旗子的戰爭，這種企圖就如像禁止向交戰國的民衆投擲炸彈一樣，永是一個慈悲的願望而已。全民戰爭的需求與民族防護其生存的努力，都超過這種道德的，理論的願望。反之卻把牠提到議事日程上。潛水艇和飛機改變了封鎖的形式。他們的本質就在於阻止一切趨向敵港的船隻。假使敵方船隻爲此目的

已先密佈在該國的港口前面，而且用封鎖及水雷等來隔絕港口，這就逼得潛水艇和飛機遠離開敵方的港口。譬如英國在世界大戰中實行封鎖德國，除了在德國海中敷設水雷之外，還監督到荷蘭的輸入，封鎖了從蘇格蘭北端之北到挪威的海道。勇敢的船長們當時也曾突破過這條封鎖線。水底巡洋艦戰爭及海上巡洋艦戰爭，主要是在沈沒商業船隻。水底巡洋艦戰爭也襲擊中立國的船隻。海上的商業巡洋艦戰爭只在反對敵國的船隻，中立國的船隻只有在牠們攜帶那些一個交戰國家不準攜帶而被認為戰時禁制品的東西的時候纔遭攻擊。制服潛水艇就要出動快的船舶，具有水炸彈的飛機、水雷、及各種封鎖手段等。制服巡洋艦戰爭就用巡洋艦和飛機。

封鎖和巡洋艦戰爭本是陳舊的戰爭手段。但是各國增長的人口和軍隊，都須仰靠軍事工業，而軍事工業又須仰給於特定的原料輸入，於是使得封鎖手段比從來的效驗都大了。糧食和戰具的缺乏足以減少軍隊底勇氣，而饑荒對於民族統一常發生破壞的作用。

描寫軍隊與軍隊間的戰鬥，自然而然的也要說明那種有計畫地使敵國民衆同時也遭牽連，而且使他們被認為戰爭行動底一個獨立目標的戰鬥。在這個關聯上也要提到，民衆在那發生大

小戰爭的國家中將遭到非常厲害的波及，這兒就須得利用宣傳來動搖交戰民族之精神上的統一。

還有一種特別的戰鬪值得留意的就是所謂『民衆戰爭』(“Volkskrieg”)。一八七〇和七一年出現了法國士民戰爭 (Frankfurterkrieg)。這個戰爭沒有軍事的領導，是由那個別的或者聯合起來的，愛祖國的法國人進行的。他們穿着便衣不帶徽章，所以也不隸屬於國際公法的法則下面。我們在比利時也經驗過類似的事情，這兒特別是那種 Garde-civique 就是國民軍的一種。這種便衣軍也沒有軍事的徽章和軍事的領導，而由個別的比利時人集合起來的。比利時的這種民衆戰爭與法國士民戰爭俱有同一性質。牠主要的是進行於前進地帶，而不是在我們軍隊的驛站線內。現在也可以想到一種與陸戰法則和習慣相適應的民衆戰爭。世界大戰時還沒有人很嚴重地注重過這些法則和習慣。實際上『法則和習慣』也是由武力來決定的。民族戰爭如果在一個戰勝軍隊的後面，由那軍事上訓練好的男子，帶着軍事的徽章及在軍事的領導之下來進行的，那牠就是與國際公法的法則和習慣相適合的。一個民族的困難要求這樣一個民衆戰爭，而且牠

是可能的，只要民族表示最大的精神上的統一，而且願意爲其生存保持而鬪爭。世界大戰中俄國人好像算到德國方面有這樣的民衆戰爭。他們在東普魯士被佔據的地方內移去德國能勝兵役的男子。這使得我一九一四年秋天在坡省從那些被俄國人威脅的地方內，送回那對於軍役有用的青年及能作戰的男子。民衆戰爭將使那被波及地方的全體民衆受到最厲害的牽連，如果那個戰勝的敵人不把牠認爲是合乎國際公法的。

軍隊是多種形態的，同樣多種形態的也是牠在戰爭中的形式及其出動到戰爭裏去的樣式。強大的是那軍隊與軍隊間的戰爭及其決戰，長列的行軍出動於前，尾隨於後。各民族都深刻地，加增地受到牽連。迅速之間可以喚起各民族及其軍隊表現出相應的效能。軍隊和民族必須在任何瞬間都準備出動他們集合的力量來爲民族的保持。

(計一)自然，轟炸一個國家公開城市中的居民，是不適合於戰時公法和習慣的，如國際公法上所規定的一樣。照國際公法講，轟炸一個砲臺裏的居民是許可的。但是莫有民族在其生存鬪爭中，放棄這種戰具而不應用，縱然曉得那是違反國際公法的。加之用一切戰爭手段來破壞敵人的軍事工業本是一種國際公法所允許的行動。這種破壞嘗試使得該國居民遭受損害，也是不可避免的。敵國居民也可以因爲附近地方的隊伍或兵營之被轟炸而受損。

失。

(註二)海軍在霧中的航行和戰鬪都被阻礙了，相當程度上的風暴也可以使之如此。

(註三)這些及下面的對於陸軍編制及其單位編制之指示，已滿足我的目的了。許多別的如摩托化（不只是戰兵的）及分配掩護步兵的大礮和防禦的坦克大礮等，都還在變動中。

(註四)大礮底彈道是伸直的，野戰榴彈礮底彈道是彎曲的；前者多是從正面射中其目標，後者則是由上面射中其目標。

(註五)鐵甲戰鬪車的構造完全不一致，而在個別的軍隊中也都各不相同。我介紹參考海格的坦克袖珍書 (Heigls Taschenbuch der Tanks 1935, herausgegeben von I. F. Lehmanns Verlag, München)。

(註六)這個確定也只具有一般的性質，我還得加上說明，手榴彈只可以拋到數步之外，火焰投射器只能在最近處發生作用，毒氣隨風向的情形而傳佈數公里。

(註七)一海里等於一八五二公尺。

(註八)關於這點我已經在各種不同的觀察點下寫在下面的文章中：探冷堡世界大戰法庭之前的賣淫的戰爭史，戰爭中的不法性。

(註九)世界大戰中坦克車具有特別的力量超越陣地，因為當時防禦坦克的武器沒有像今天這樣完成，所以坦克能夠儘量活動。

(註一〇)一九一四年德國陸軍的開發從北部 Aachen 到 Strassburg 超過三百公里寬，從 Brüssel 到 Metz

間的進軍也具有同樣的闊度。

(註一一)世界大戰時構成功了一種認識密碼的法式科學。

## 五 防禦軍之成分及其出動

## 六 全民戰爭之實行

假如以爲一個戰爭須宣戰纔開始，這就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日本在一八九四年開始中日戰爭及一九〇四年開始日俄戰爭，都是出其不意地襲擊中國的和俄國的運輸船或戰艦。英國開始反對南非共和國（Burenrepubliken）的戰爭是用義勇兵驟然侵入該共和國境內。國務總理柏持曼荷兒魏克（V. Bethmann = Hollweg）一九一四年八月那個不幸的對俄法的宣戰，還在我們最新鮮的回憶裏。因此給敵人的宣傳以口實，因此加強了敵方民族的精神而削弱了我們民族的精神。民族都不理解進攻戰爭，但是卻理解爲生存保持而鬪爭。在一個宣戰中很容易被他們認爲是進攻的意志。他們沒有感到威脅，民族精神不能在他們裏面活躍起來。所以那句話「威脅的戰爭危機」對於我們比動員命令容易喚起民族精神。而且對於德國民族還要加上一層，因爲德國陸軍在西方採取攻勢，於是民衆就真相信我們實行的是進攻戰爭。這對於他們是等於一個侵



略戰爭，因此很快地在民衆中失去了那種爲生存保持而鬪爭的感覺。他們不了解，他們也未曾受過這樣的軍事教育而使之了解，在我們被逼而作防守戰爭時，假使我們不想被人粉碎的話，就必須採取攻勢。這是全民戰爭底最嚴重的任務。將帥也須得特別注意，不要因宣傳或者不充分的民族啓蒙之故，在戰爭方開始時，就給作戰和民族以非常的不利，就像一九一四及以後幾年中德國民族和德國軍隊因德國宣戰的原故所受到的經驗一樣。越是一個民族和民族中的一分子，只有相信那是爲着生存保持纔用全力來推進作戰的時候，這種注意就越是需要。關於這點我已經指示過了。

一個國家決定作戰就要先準備軍隊、經濟、和民衆服役於這個戰爭。這種準備——動員——須依照那細心考慮過的及用極度精確性執行的規定及預備工作來實行。後者要在和平時就已經作了，而且每年施以改善。關於這面，我已經寫在我的著作：我的軍事的發展過程裏。總之，主要的是關於軍事的動員及其預備工作，如一切後備兵的教育，馬匹的徵集，引渡平時隊伍到戰時定員，新陳列出那種在平時不存在的戰爭隊形，武裝礮臺陳列出那些在國內管理補充召集和補充訓

練的官員等。這些都根據我當時的地位。現在的預備工作不只限於我在上章中所述的那些軍事組織，而且還須廣大地處理財政和經濟方面，擴張到民族的生活及其供給上去。末了，牠還要如我在第二章中討論過的一樣，確定保持民族精神統一的方針。現在沒有別的，就只有把每個德國人底生理和精神的力量，不管在國內或在軍中，都置於作戰之下。在戰爭一開始時，民族精神所給與的那個保持民族的回聲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這可以指示那些「不滿者」，他們沒有機會可以活動或者是號召起他們來動作？這個會告訴將帥，是否有破壞分子在剛動員時就加入軍隊。統帥對此可靠的尺標，就在於考察應召義務者的數目真正有多少。總之，「不滿者」故意鑽入軍隊裏去，也是可能的。但是這種蓋然性終竟少一點，他們寧肯在軍隊的背後活動。我還回想得起，我們的敵人一九一四年時怎樣計算社會民主黨會在德國破壞戰爭。後來這個事情沒有實現，他們是怎樣的垂頭喪氣。一九一五年他們又怎樣高興地宣言，說他們現在又「可以依靠德意志的勞動者了」。

在決定戰爭的幾點鐘後，大規模的空軍、騎兵師、和摩托化的組織，陸軍的隊伍部分，及輕便的

海上戰鬪力，同時那用於商業戰爭的船舶等，都要達到了全部戰備的程度。其餘的軍隊部分也接着迅速地完成了牠們的動員。陸軍其他的部分，空軍剩餘下的部分及艦隊等，將在第二動員日，一切平時的隊形及補充常備兵所需的隊形，將在第三到第五動員日，在其所在地準備作戰。補充、後備及國民軍隊形，包圍和兵站隊形等又在遲幾天之後，同時將成立補充隊形的幹部。（註一）

空防必須與從前的空軍準備相適應在決定戰爭，就是說，在宣佈動員幾點鐘後，與空中情報任務同時發生效力。必須與敵方兵力之迅速的準備相適應，陳列邊界防護，在敵人戰艦不久來到海岸的可能性下，必須使這些海岸和軍港得到安全，而且還必須設立海岸與水路的軍事標記。對於那些國家如具有山嶺界限的意大利和法國在其較順利的地理的邊界構成中，是比較容易採取邊界保護手段的。更不用說法國還用了封鎖防禦工程來保證了牠的邊界。對於一個四面被敵人包圍着的國家，要在本來的戰爭行動未開始前，就要真正保護邊界不受敵方的襲擊，那就困難得多了。這對於這樣的國家常是一個完全不能解決的問題。要企圖這樣作，那就會使得力量分散，容易生出危險的影響。譬如一九一四年德國的最高軍事指揮就沒有能够實在保護東普魯士的

東南部，雖然敵人還沒有在動員的前幾點鐘就侵入進來，然而這不是歸功於防護手段，而是歸功於敵人的怠慢。這也是那種同樣的怠慢，假使英國輕便的海軍——也許在全部英國艦隊幫助之下——沒有出現在北海，封鎖當地的德國海港。

除這嚴重的戰爭準備工作之外，還有關於開拔，即是運用準備好的和動員好的軍隊來開向敵人的那種工作。就如對於邊境保護已經作過的一樣，對於開拔也可以很簡單地在大體上決定軍隊之力量分配，只要戰爭只是向一條火線進行，就譬如法國、比利時和英國一九一四年所得的機會一樣。這些國家自然都出動全部軍隊來反對德國。他們出動陸軍來殲滅德國的陸軍，這也是自然的。然而英、法沒有出動牠們的海軍來攻擊德國的艦隊，殲滅德國的艦隊，這對於我是敵人用兵上不可解的錯誤。

俄國集中牠的全部軍力在其西方火線上，這完全是很自然的，同樣牠那種殲滅敵人的思想也是很自然的。難解的就是俄國把牠底力量的重心用來攻擊奧國、匈牙利，而沒有像牠的同盟者一樣用來攻擊那最危險的敵人德國，並且沒有把牠底東海的戰鬪力調來。德國和奧國、匈牙利的

情形就困難一點。德國的最高軍事指導只留下很弱的力量在東方抵制俄國，同時出動主力攻擊比利時和法國。這兒自然碰着了英國的軍隊，但是德國沒有調動艦隊來參加反對西方敵人的決戰，這於我就像英國艦隊的態度一樣，是同樣不可解的。這是因為缺乏一個嚴厲的統一的高級指揮所得到的惡果。可是關於這點以後再說。

奧國、匈牙利利用其主力在加利青（Galtsien）進軍，但是應用了過強的力量來攻擊塞爾維亞。牠們希望很快的勝利以後，即時就使用這個戰勝的隊伍來攻擊俄國。但是沒有得到勝利，這因為匈牙利的鐵路太不行了，正是奧、匈的隊伍尋找主要決戰攻擊俄國的地方缺乏了鐵路。

開拔命令下，準備軍隊作戰時要求全部估定外交的情形，最細心地考察敵方的情形，及一切從那兒出發的可能性。要求考查戰場底地理的形勢，澈底明瞭自己軍隊的力量。

譬如一個國家像瑞士一樣只能出動軍隊來防守邊界，於是這種國家在作戰上是很難的。一個全民戰爭的作戰其目的是在打敗敵人。假如瑞士只在防守自己，於是牠就期待着別的任何一個國家來擔任打敗敵人的工作。戰爭的本質以瑞士作例也沒有變更。

如德國最高軍事指揮在一九一四年時一樣，現在那些國家的軍事領導者，因為本國處在較不順利的地理形式中的原故，於是關於行軍就發生這樣的問題：敵人中的那一個是照規矩講來最危險的，把他戰敗後就可決定戰爭的勝負。出動軍隊到戰爭去時，領導者的藝術就在於創造一個重心點，由此攻擊敵人的弱處而奪得勝利。於是在進軍時，爲了準備構成這個重心點，更應當移置全部軍隊的重心來趨向那個被認爲最危險的敵人。同時須努力使戰爭開展到敵人國家裏面去。反對一個別的敵人，或反對多數別的敵人，只須出動少數的部隊，用以阻止這些敵國影響那決定勝敗的戰爭行動。爲明瞭這種思想起見，我重提起一九一四年八月底到十一月，我在東方與奧匈陸軍合作戰時阻當了數量上強過我們的俄國力量，於是給德國的最高軍事指揮在西方實行作戰的機會。德國最高軍事指揮沒有把事情比實在的作得好些，這對於我解決那種任務本身，就是由東方作戰來給實行西方戰爭的時間，是沒有關係的。也許一個將帥在其國家特別比較不順利的地理形勢之下，保留些軍隊在順便的鐵路線上，以便後來開始明瞭情形的時候，加在這一

個或那一個地方。但是因此也不可以違犯那個原則，從開始起用所有的力量來對付敵人。一個將

帥要想在這樣的不順利的情勢之下保護本國不遭戰爭的恐怖，這是不會有的。甚至一九一四年在東方這個情形也是不可能的。只有自探洽堡和馬藪湖（Masurische Seen）附近的戰爭以後，這種保護纔得實行。這種保護國家的努力，決不可以在行軍時分散了力量。一九一四年八月底因最高軍事指揮企圖在東普魯士肅清俄人，於是在作戰時派遣了兩軍團人到東方去，使得將來的馬恩決戰（Entscheidungsschlacht an der Marne）時少卻了這個兵力。假使要放棄土地與敵人，在動員的時候就須得採取適當手段，移開能作戰的男子及對於用兵最有價值的東西。假使有意煽動民衆戰爭，於是就須得採取動員式的手段，保留受過訓練的人。對於行軍沒有比下面這個更好的藥方就是：軍隊在尋求決戰的地方，決不患其太強，而在別的地方，只須出動那最需要的力量。從開頭起須具有那不顧一切可以應用到那『最後的一條鎗』的意志。在許多威脅的和被發覺的可能性之前不動聲色，而只聽從戰爭的嚴厲性來對付，這是需要堅強意志的。

軍事領導決定用兵力的重心來尋找第一項決戰的時候，必須把隊伍集合在重要的方向中以取進攻。在別的戰場上這種任務的解決似乎更多樣一點。一九一四年我在東方因探洽堡及馬

蘇湖的勝利解決了這個任務，而這種勝利是因利用敵人的弱處纔達到的。假使沒有這種情形，也許會使得退而防守渭克塞爾河線。利用當地防禦工程的幫助，而且退兵到此，只有在堅持的鬪爭下纔可能。（註二）要將帥在行軍命令裏面就指示怎樣解決這個任務，這也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把任務的本身清楚地、簡單地、確定着。

我們要牢記着，行軍命令只在規定行軍。必須想到行軍地方隊伍分配的樣式對於將來的作戰，但是牠決不可以規定那種超過關於敵人初次情報範圍之外的進行作戰的計劃。現在紙上的考察就停止了。這兒開始了戰爭實際的嚴重性。這時不允許空談計劃，而是要求控制敵人現有的弱點。假如這種弱點恰在被假定的方向中，那自然是對的了；但是這還不能夠就以爲敵人在個別情形中的動作，也如形成進軍時所假定的一樣。因此，領導決不可以被那種計劃束縛了，儘管這種計劃怎樣算到敵人方面或然的情形。領袖意志必須依照報告中所得到的實際情形而決定行動，用以在要害地方殲滅敵人，或者完成他所有的任務。史利芬將軍進攻法國的行軍計劃，非常適合一八〇四和一八〇五年的情形，但是不適合於一九一四年的情形。這時具有強大力量的法國陸



軍一定會開進羅侖(Lathringen)。莫提克將軍(General v. Moltke)也變更了這個計劃，但是還不能完全脫離史利芬計劃。這個計劃想用陸軍沿那個運動的中心點低登荷分(Diedenhofen)向左旋回，以爲此舉可以擊中敵人，把他的左翼包抄入戰爭中，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殲滅敵人，由此而逐一消滅敵人陸軍的其他部分。這樣就把利用敵人在別處實際上給我們的弱點放過了。當時領導處動搖不定。任何一個領導者，假使他不能把別一個人的計劃變成他的計劃，而要實行這個計劃，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關於這點在下章中再說。

假如作戰支配得有一個優越的艦隊，於是就很簡單地出動這個艦隊來向首先要打擊的敵人決戰。假如這種優越性不存在，而顯然是強弱懸殊，那麼，這自然犯不上用這個寡弱的勢力來讓那個優越的勢力打敗下去。如像在陸上不能尋找決戰爭時，必須擇取持久的側避戰術，這在海上強弱不敵的情形下也如此。這兒也沒有方子告訴你，怎樣削弱敵人的海上戰鬥力；因爲沒有人知道，用部分勝利削弱敵人後，他給我怎樣的機會，自然這些機會是要利用的。計劃出動海軍無論如何必須適合一個國家底全部的用兵思想。在全體行動的範圍內必須立刻開始水上和水底的

巡洋艦戰爭，規定敵國岸邊船舶交通的那種封鎖領域，在這兒可以沈沒任何碰着的船隻，中立國的船隻也在內。

關於空中戰鬥力也和這個一樣。我不是說的那種在戰爭一開始時，就成爲陸海軍底直接的成分的空中戰鬥力。我是指的空軍本身，就是有計劃地，統一地出動牠來奪取空中優越性。在戰略上決定勝負的時候，就必須取得這種空中優越性。空軍也和陸軍一樣必須在進軍命令中先分配停當，然後纔可以隸屬於有關係的陸軍領導者，必要時海軍領導者之下。否則行動的一致性就沒有保證，而這點是具有決定的意義的。

因此進軍命令作爲戰爭行動的基礎，須得完成重要的任務。莫提克曾說過，進軍命令中有了錯誤，在全體戰爭的進程中不能再補救好的。這個在現代從軍事觀點下極度擴張了的鐵道網的時期中失去一部分，然而也僅是一部分的意義。平時用特別的研究來考查對於進軍所定下的指令之適當性，同時在紙上比較這面所採取手段與預料的敵方手段，然後由領導者決定實行雙方面的戰爭行動。由此可以達到一個相對明瞭的觀念，加強了對於實際上可能性的認識。但是決不

可以使作戰被這樣理論的經驗限制了，歸根到底只向敵人追求一個『特定的計劃』！

隊伍整理完備後，出動他們來對付敵人的可能性也就有了。這兒一分鐘也不應遲疑。於是雙方敵對行爲是在直接隨決定作戰時就開始了，還遠在陸軍按照進軍命令實行火車上大量進軍調動之前。

一般人常說在國境上『鎗會自動地發射』，平時邊境上的摩托化的隊形或騎兵師，只要在鄰敵境內發現有同樣的隊伍部分，或者好像有同樣的隊伍部分的時候，他們就會企圖侵入敵國裏去。雖然如此，這樣出動也可以招致重大的失敗的。（註三）在毘連的鄰海上，雙方派遣出去偵察的船會互相射擊或實行戰鬥，在大海上就開始水面和水底的巡洋艦戰爭。封鎖手段也可以開始了。空軍也將開動在陸上和海上的偵察任務。

戰爭行動的重心在於出動集合攏來的空軍奪取勝過敵人的空中優越性，攻擊敵方火車上和徒步的進軍，襲擊飛機場。結果就引起空中戰爭。爲完成這些任務，將使在敵國進兵地方的居民受到牽連，這是一定的。空軍要怎樣轟擊敵國裏適當的，重要的工業城市和設備，發電場，及政府官

居等，須看臨時情形而定。

空軍出動之後，接着就是用全速度出航艦隊，或者在戰爭開始四十八小時之後，或者更早一點，來決戰，或者集合起來完成進軍命令所分派的任務，這個大概也不外是大的海上戰鬪等。於是這些戰鬪就和那作用逐漸加大的水面和水底的巡洋艦的商業戰爭，及封鎖等，混和起來。

陸軍調動在以後纔能開始。兵士大眾是不能夠飛越邊界的。他們大部分必須從國內起，在強大的，細心準備好的鐵路運輸調動中被載到應當出動的邊界上去。自動車在這兒是不能用的。（註四）世界大戰時，動員令下後還等待了大約十四天纔開始作戰。現在這種時間大約將要縮短些。只有在進軍完結之後纔大規模地開始戰爭行動。這時就和艦隊開始戰爭行動一樣，空軍與陸軍或海軍立刻直接聯絡起來。

現在要對於具體的戰爭過程作一度描寫，如我在我的著作世界大戰威脅在德國土地上裏面假定一個特定的戰爭情形下所作的那樣，已不是我這兒的任務了。我這兒只申述一般的考慮，讓讀者自己去思想實際上在一個特定情形下進行的戰爭行動之過程。這些戰爭行動無疑在第三

二個戰爭週終結後在一切戰場上變動着。牠們的形成將要看是否雙方都爲勝敗決戰而鬪爭，或者只有一面企圖決戰，別一面卻避免決戰而定。軍隊力量到處都對抗着，儘管牠們數量上各有不同。

繼導引的陸軍調動或者導引的防禦手段之後，就是大的鏖戰和小的鬪爭。

雙方敵人都在決定勝敗的戰場上，出動非常的人力和火力整天在極闊的數百公里的火線上，（註五）把戰爭奮鬪到底。在大戰之先也許摩托化的陸軍組織或騎兵師在陸軍運動之範圍內，已在火線之前和側面進行鬪爭而伴隨着前者。

假使實際上能够在適當的地方進行一個真正的決戰，由此而決定勝敗，就如德國最高軍事指揮，及我們的敵人對於初次作戰及繼起的大戰所希望的一樣，那麼，這對於那戰勝的民族和軍隊只要是在打敗一個敵國，也許是加倍的好。但是戰敗軍隊後面還有陸軍的大量召集與廣大的補充隊形，並且可以容易利用鐵路網來移動和集中陸軍部隊，因此決定勝敗不是在初次的戰爭中就可達到的。在勝利的決戰之後，戰爭將繼續下去，縱使只爲了打敗一個敵人，若是必須依次戰

勝多數敵人，如我下面假定的一樣，那就更應該繼續下去了。

應付敵人的時候，可以避免那個被他所企圖的決戰，而在廣闊火線上進行持久的鬪爭，——也利用摩托化的隊形——採取防守戰的形式。然而那個由進攻中取得的勝利，如我一九一四年八月在探冷堡戰中，即在所謂東普魯士的「次要戰場」上所獲得的勝利，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會是最有效的戰爭工具。這是可以理解的，退兵時總有一點膽怯，因為退兵大半是為一個策略上的決定所逼纔開始的。但是戰爭經驗又指示過了，軍隊也可以勝任退後的運動而不損害其統一，只要執行退兵的隊伍信任他們的領導，而且牢在領導者的手中。退兵不是惶悴形成，而是準備好了纔開始的。在陸上也和在空中和海上一樣，戰鬪的部分也可以從勝利的鬪爭中，甚至於採取一種到他們基礎上去的向後運動。然而這不能改變事實，就是，陸上退兵是與放棄地方連合着的，這對於作戰的形成具有迫切的意義。

不管現在是在重新打敗那個未完全被打敗的敵人，或者是在打敗第二個直到現在還未被攻擊的敵人，總之都須得集合力量構成一個新的重心來對付他。並且留心行動的法則，重新在

長的運動中調動大量軍隊來趨向敵人，用優越的力量來利用他所表示出的弱點，在新的血戰中要害的地方打擊他。同時制服他那種不只想防禦而還想勝利的，因此採取變動無常的手段的意思。用兵者底果斷性和活動性是實行戰爭的表徵。只有活動性纔可以抵消勢力上的寡弱。這兒鐵路又保持牠對於實行戰爭原有的意義。

一九一四年，德國最高軍事指揮希望用比較上寡弱的力量在西方戰勝敵人，這是失敗了。當那個時機來到時，他不能決定給作戰一個新的重心，就是說不能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和俄國決定戰爭勝敗。用火車調動大量隊伍從西方到東方應該是在一九一四年秋天的事。我回憶起我八月間在東方怎樣在探洽堡戰中打敗一支敵軍，九月在馬蘇利湖邊戰中，怎樣打敗第二支敵軍。然後用火車運送軍隊到阿白耳史勒興（Oberschlesien），使受重創的奧軍又可以進軍散（San）和渭克塞兒（Weichsel）。在這個進軍中怎樣打敗了敵人的力量，隨後在散和渭克塞兒及波京華沙以南抵抗俄人，後來因衆寡不敵向阿白耳史勒興邊界退避，然後從這個退兵中又用火車輸送隊伍到克勒生（Gnesen），荷享沙兒查（Hohensalza）和托耳恩（Thorn），與用火車從東普魯士調

來的第八軍的部分共同進襲敵軍底右側面。飛德立大王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五日曾在離麥耳色 (Merseburg) 不遠的洛屈司哈 (Rosbach) 戰勝，十一月五日在不列司勞 (Breslau) 以西的雷騰 (Leuthen) 戰勝。

這些事情寫來是很容易的。譬如那是多麼容易，假使你攻擊一個敵人時，他連鎗都不還，同樣你要打敗一個敵人時，他就準備給你打敗，或者你自己支配有強大的優越力量，但是實際上不會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這樣，對於敵人的行動也還不明白。假使要在一個地方打敗敵人，那麼，別的地方就自然會放鬆一點。現在敵人就可利用這些弱點，就好像他的弱點被你利用一樣。誰依照行動法則，誰就是對的。在一個地方的決定的勝利，可以阻止敵人在別處利用我的弱點的企圖。假使在史利芬將軍的進軍形成中，德國陸軍左翼在薩爾橋 (Saarbrücken) 附近因其弱點被強大的法軍壓制下去，——如一九一四年法軍實際上作的一樣——那麼，德軍右翼後來的成功就不能發生作用了。

實行全民戰爭時，戰爭與戰爭相聯，鬪爭與鬪爭相續。也許有較短的或較長的休息，用以集合



力量；也許戰爭又變質爲陣地戰，在長的、展開的、不可動搖的及不可包圍的火線上實行，直到戰爭終竟達到牠的完結。在這個情形中不是因一面的軍隊之戰敗，而是因整個交戰民族之瓦解。

行軍和鏖戰都向軍隊要求非常的，生理的和精神的緊張。敗仗使得意氣消沈，勝利使得暫時的意氣興奮。死傷者都從軍隊中脫離出去，補充新來的人員，一時不能和那些餘下的舊兵士結合着密切的奮鬪友情。在老的戰鬪者與新的補充隊員中可以對立着兩個世界，縱使這些補充隊員保持着正確的精神力量也不能避免。現在很要緊的是，看一切戰鬪者是否都認識戰爭的意義是爲不死的民族之生存保持；而且常常提醒他們，是否他們能够超目前的困難而造出英雄事業。這兒就表示出，是否下級軍官和軍官，各人在其範圍內是兵士的領袖，是否對於機械一般的軍紀具有那決不使軍隊打敗仗的，鬪爭和整頓的意志。現在因民衆與軍隊的內部聯絡，前者的精神力量就直接影響後者。

陸上、空中和海上的戰爭行動一開始，軍隊就要消耗生活品、飼料、和汽油等。這些或者必須從國內輸送給軍隊，或者被佔據的地方可以供給他們。這種情形在整個戰爭過程中都如此。在開始

的及繼起的戰爭之後，需得從國內供給軍隊人員、子彈及各種戰具的補充。殘缺了的與破損了的戰具就寄回來。在陸軍背後的連絡中，即是軍隊與內地間的兵站道上，成立一種活動的生活。假如軍隊是在本國作戰，那麼牠和鄉里與民衆的關係就這樣直接，就像在軍港和飛機根據地內當地所依靠的防禦組織與鄉里和民衆間的關係一樣。

軍隊的補充隊形很快地在動員開始之後就陳列出來了。一部分是受過訓練的兵士，但是大部分是未訓練過的兵役義務的年級。這些在平時未受過訓練。現在補充隊員的訓練開始了，徵集人員作新的補充。雖然步兵的訓練是那樣困難，但是和別科兵隊的比較起來還是最容易的。步兵的補充，就假使損失得最大，至少是首先可以滿足的。軍隊這個主要的部分可以暫時保持數量上的力量。只有補充缺乏了，如德國在世界大戰時一樣，這個力量纔會低落。訓練別科的新兵，要他們應用這種武器，就還要困難些。特別困難的是補充空軍，因為射落下一部飛機，照規矩全部乘員都會墜落下來。

各種戰具準備也和人員準備一樣不容易。補充隊形之如何陳列，及他們如何開始動作，全部

工業都要作適應的工作。牠們須得供給非常的子彈量，而且這種供給越是平時的儲蓄少就越是越快。子彈有否造得和平時一樣的好和可靠，須得看情形如何而定。製造別種戰具如機關鎗和大砲也是如此。這個消耗時間，消耗很多的時間。補修那些從戰地寄回來的，破損了的材料也不是馬上就可作得到的。比這個還要困難，還更費時間的，是補充飛機及其發動機，補充坦克車和軍艦。

飛機被傷損後大概都會跌落下來，至少是大多數如此。製造新的飛機非常難，新的航員也非常難訓練出來。關於鐵甲車也有相似的情形。一隻沈沒了的戰艦是造不出代替的，至多只有對於較小的船隻纔能如此。在船廠裏修理被重傷了的船隻是要經過相當時間的。

同時須得注意，就是在一隻戰艦上集合強大火力的時候，失落了這隻戰艦對於艦隊所給的打擊，比平常物質失落對於陸軍所給的打擊完全不同。要在戰爭過程中保持空軍和艦隊如在戰爭開始時一樣的強度是很難的。就是國內民衆犧牲一切來爲軍隊工作也不容易作到。這不是爲了補充怠慢了的事情，如在大戰中一樣，而是爲了保持牠的最高效率。

動員開始時，國內就實行財政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手段，調節民族的生活和經濟的進程，維持

民族的統一，排斥「不滿者」的挑撥。實行這些手段的時候，在國內就開始供給民族和軍隊的工，就如我在「經濟與全民戰爭」一章中已大略說過的一樣。這兒什麼可以做得，什麼不會做，得到，是要看當地的情形而定。譬如土地是怎樣耕種的，怎樣施用肥料，在國內和被佔領的地方，在有多少原料，從國外輸入多少，是否具有原料存量及重要工業設備的地方喪失在敵人手裏去了，或者被敵人的空襲摧毀了，是否可以支配充分的工作人員，而他們的精神狀態又是怎樣的。除開這些之外，就會在一切國家中發見，戰爭越延長得久，經濟情形及滿足民衆和軍隊需要的可能性，就越是困難。有些交戰國家具有特別順利的地理上的地位，而且還有所謂中立國家供給牠們，就如世界大戰時英、法、意受北美聯邦國供給一樣。否則就生出作戰民族底一種非常的精神上的消耗，而且隨着飲食衣服的缺乏，及軍隊戰具的缺乏而愈增加。

此時還會發生第二種事情：隨戰爭的延長及困難的增長，也加增了人民的不安。交戰國的民族同胞之精神就受到苛刻的考驗。民衆在戰爭開始之後，因軍隊的損失就已經受到牽連了。勝利自然不致引起頹喪的情緒。反之，失敗連合着關於戰鬪死傷的消息，卻發生痛苦的影響。在本國內

實行戰爭的民族還要加上一層居民因戰爭而受到的重大蹂躪，因為後者直接地被捲入戰爭裏去了。假使他們逃避到內地去，於是更引起那兒重大的不安。如果對於被佔據地方的同胞的運命不確切明瞭，將愈是加深這種不安。遠在戰鬪線背後的居民因空襲而受到的損失，及可能的饑荒之增長，更使得這種不安一般化。假使居民不想受這種影響的損失，那就需要一個民族底堅強的精神的統一。只有在民族之生死困難中，發出強大的民族精神的呼聲，給民族以正當的影響，纔會維持這種統一，甚而還可加緊這種統一。

假使交戰國家的軍事情形和精神統一是大致相同的，國內情形對於作戰大概不發生影響。假使一個國家因為戰事失敗，或者國內「不滿者」損害民族統一的活動，於是那個勝利國家的軍事領導就除開火線上決戰之外，利用所能支配的工具來打擊敵國的經濟和民族，那時情形就不同了。現在出動轟炸機分隊繼續地，最不容情地，——只除天氣情形有時阻礙之外——向敵國民衆和經濟轟擊的時間就到了。這是值得縮短戰爭時間來保持自己的民族，愛護自己民族和軍隊的生命。

因這種不間斷的攻擊之影響，於是對於力量薄弱的民族之統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滿者』常常獲得機會繼續其破壞民族的行爲。現在那個時機也到了，出動平時已有預備的宣傳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在敵方民族裏面發揮其破壞的力量。敵人的宣傳在德國軍隊還勝利地敵對敵人的時候，就向德國民族什麼話都亂說過了。敵人的黨羽們就是所謂『不滿者』又怎樣地在國內響應呢！一切羅馬、猶太的及祕密共濟組合的報紙之和平笛管裏都吹出『妥協與諒解』之歌。同樣的不平吹噓從各方面灌輸到民衆裏去。當敵人從戰爭中以戰勝者的資格走出來時，於是一切都驟然噤若寒蟬了！在革命化的和革命的時候，他們怎樣向民衆騙說『自由』和『幸福』呢！自由和幸福就在把廣大的民衆部分繼續奴隸化，繼續把他們剝奪淨盡。從前所期望的，現在都羞慚不說了。宣傳盡了牠的責任，於是這生命短促，如一日蠅一般苟延殘喘的民族也不再想別事了。德國民族的統一，就這樣穩穩當當地失掉了，於是軍隊也可以瓦解，嚴重的經驗也可以埋葬了。

在將來的全民戰爭中，宣傳對於民衆將如像口對口地說話一樣。細心研究敵國民族中存在着潮流，他們的希望和願望，及他們對於政府和戰爭的精神上的態度就成爲宣傳活動的前提。

因爲戰爭本身的艱難，及其深深襲擊人類精神和肉體的困苦，於是這樣的宣傳，只要民族統一已在開始破裂時，將發生深刻的影響的。一個常勝的而且還在勝利行動中的軍隊，可以暫時免掉民族這種精神上的狀態；一個在重大困難中掙扎的民族就不能夠這樣。軍隊與民衆的關係，在一個戰爭的過程中，因廣大的補充，受傷者的遣回，與痊愈者回復到火線上去，因爲那只有避免引起別種損害及普遍不安纔或時停止的戰地郵政，及居民與戰爭直接的接觸等，是這樣密切，簡直可以完全排除其他的東西。軍隊將與民衆共同崩潰，於是戰爭將採取——縱使在別一樣的形式裏——世界大戰的及我略示過的那種過程。

世界大戰時交戰國家不能單用戰場上的決戰來決定勝負。戰爭變形爲強大的火線上的陣地戰。但是我們的敵人在東方和西方不斷地試用強烈的衝鋒，出動意大利和羅馬尼亞的軍隊來引起決戰，實踐行動的法則。我雖然戰勝了羅馬尼亞和意大利，但是這還沒有決定整個戰爭的勝敗。一九一八年我希望在西方引起一個決戰，因此而決定戰爭勝敗，我出動了優越的力量來攻擊敵人的弱處，我也打敗了敵人，但是不能領導軍隊作繼續不斷的戰爭，因爲用於這兒的力量已經

不够了。後來美國軍隊參戰，西方的敵人集合強大的力量，出動優越的物質來攻擊德軍，德軍不能支持敵人的衝鋒而後退了，直到國內革命政府在最高軍事指揮的同意之下，把德軍和以前對於保加利亞及奧匈的軍隊一樣調回來了。是否敵方軍隊進攻西方德軍時，一當德軍再堅持陣地或者就會動搖，不是這兒解釋的。總之當時戰爭勝敗由純粹的決戰被革命所代替了，繼此之後纔是戰鬪的決定。這樣的戰爭結局在民族現在的精神狀態之下，是適合於全民戰爭底本質的。這個從前還未曾有過。與一個精神堅強的民族決定戰爭勝敗，只有在戰場上戰勝和消滅這個精神仍然堅強的軍隊，消滅這個精神統一的民族。他們的殘片拯救起民族的意志，保持着那些被不容情的敵人溶合在共同生死困難中之現存的世代及將長成的子孫。

(註一)這些數字是過去得來的。平時的幹部越是強，於是動員平時存在的隊伍就越是迅速結束。法國就想在最短時間中準備好牠的太平洋軍。

(註二)我特別聲明我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並未考慮這個事情，使得歷史學家如柏林大學的教授 Walter Lire 先生，傳佈些對於我新的不確實的謠言。

(註三)譬如一九一四年都以爲俄國的騎兵師侵入東普魯士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們竟沒有使我們稱心滿意。



(註四)有人以爲因汽車路和汽車之被應用，於是鐵路對於進軍就應失去其意義，這是一種危險的夢想。這兒不只是運載兵士，及加載一些機關鎗和子彈的問題。出動軍隊去戰鬥，是需要各種戰具底統一的軍隊團體。這些卻不能用前者運去。運輸自動車與汽車路在別種情形下，譬如在退守時防禦敵人局部的衝破，或者防禦一個迅速出現的敵人，這就是說，對於一個活動的防守與局部的手段，是有意義的。

(註五)一九一四年八月戰鬪開始之後，二十到二十四號，就已經開展到全部長的陸軍火線之上。這種鬪爭繼續下去，到九月九日達到了牠的危險的高點，此時戰鬪的火線具有三百公里的闊度。

## 七 將帥

那個用他的頭腦、意志和心情、領導那為民族生存保持的全民戰爭的人，就是將帥。沒有人可以卸下他所負的責任。一個只是執行別人的思想和意志而領導戰爭的人不是將帥，他不屬於這個需要最重大的本身工作，最高的本身能力，最確定的本身意志的地方。這個地位不是為木偶人創造的，木偶人只玷污了這個最莊嚴崇高的地方。

真正的將帥應該站在第一位。一切別的都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和阻礙的。只有由第一個地位纔可以給他的活動以一致性和力量，這個決定戰敗敵人和保持民族。這種活動是包羅一切，就如全民戰爭包含生活的一切一樣。在生活底各方面，將帥應該是決定者，他的意志應該作為標準。是否那個領導全民戰爭的人就真正是將帥，要戰爭纔可以證明。理論家或者和平時的能幹者也都還遠不是戰時的將帥，他們當戰爭正給別人全部發展力量的時候，卻手足失措了。

飛德立大王是絕對的君主和將帥。將才的問題在他的身上纔得到解決。此後對於爲將的觀念都不明瞭了，而往往害及用兵和民族。（註一）

普魯士國王威廉第一——普國制度已成別的國家的模範——是國王，同時是軍隊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下面有任陸軍參謀總長的那位統帥，大元帥莫提克（v. Moltke）伯爵，他指導作戰，雖然國王威廉還『命令』那由他所草就的指令。此外有軍政的獨立代表人，陸軍部長魯恩伯爵（Graf v. Roon）及政治的指導者俾士麥侯爵（Fürst Bismark）。這是一個危險的多元主義。這種弊害莫有鮮明地表現出來的原因，是因爲國王威廉第一真正任用了些偉大的人才，他們也都屈服在國王威望之下。爲了顧到君主政體所以未進行考查這種軍隊與政治領導的形態。然而後來弊害終竟發生出來了，大元帥莫提克伯爵不是人所公認的司令長官。衝突就莫有常常克服過，作戰的利害被小視了。後來彷彿最高軍事指揮的模範，在負責任的將軍之外從旁面加上一位參謀總長。這個隸屬於司令長官或者他所附屬的那位指揮將官，但是同時對於陸軍參謀總長的指令即是統帥的指令擔負責任。在強有力的將官也許這個莫有什麼意義，而且也曾經是這樣。但是不

是一切將官都是堅強能幹的，在平時已少見，何況在戰時。於是因此造成了完全不健康的關係，最明顯的就是在第八軍總指揮與第三最高軍事指導的組成。

總參謀長在接任的時候都懷着那種思想，就是他們肩負着責任的全部重量，須得在遵守特定的形式之下對於軍事領導建議，而司令長官也須得附合他們。當陸軍總參謀長莫提克將軍任命我作東方第八軍總參謀長的時候，還獲得那個特別的指令，就是『解救東方』。因此我的參謀地位是被他任命為負責東方作戰的，我自己對於我的地位也決沒有別樣理解過。我關於這些已寫在我的著作如：探冷堡及世界大戰法庭之前的賣淫的戰爭史，並且敘述，我感謝那個總司令（指興登堡——譯註）——他是爲了顧及那種普通的，不健康的見解而添設的，他受軍事內閣適當的指示——就是他在我工作時沒有給過任何困難，他完全順着既有的情形，我也保持適當的形式。由此得出那個事實，東方作戰的頭腦不是總指揮而是總參謀長，而且在作戰之中也是表現後者的意志。

假如這個已是一個危險的，釀成不明的關係的成例，那麼，這在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組

織第三最高軍事指導的時候更顯明了。在這裏面皇帝是名義上陸海軍的總司令，大元帥與登堡是陸軍總參謀長，就是實際上的總司令，我是完全同負責任給陸軍指令和領導戰爭的人。此外還有一個海軍總參謀長是海上戰爭的指導者，一個獨立的陸軍部長及對於作戰完全獨立而專負責政治的國務總理。這是一種極危險的多元主義。從來就沒有保證過陸上與海上作戰的一致。譬如我就沒有完全洞察一九一七年艦隊譁變的範圍。陸軍部長起初要想各行其是，但是我終竟能夠達到除去那些最大弊害的目的。各別不同的政治指導，那三個國務總理都在國內『不滿者』和我本人之間或多或少地磨碎了。國務總理柏特滿（Bethmann）關於在無限制的水底潛艇戰中應用潛艇武器時的行動，就發生極危險的影響；他整年多都阻止軍隊出動其全部力量來攻擊敵人，而且隨後還破壞潛艇戰的實行。

關於戰爭負責方面那種弊害（我在總司令與總參謀長的關係形成時已略示過的），也更深入化了。參謀總長及指揮官那裏的最老的參謀官對於總司令，指揮的將官，及其他將官的地位，因為我直接和陸軍的總參謀官交涉，而且常時把指揮官的指令，給他們的原故，又嚴重地移動了。

總參謀長的職位愈顯重要，總指揮的職位愈是退後去了。所以這個在實際上存有危險，而且也沒有法避免。於是在指揮那兒就發生了所謂『總理家政或參謀家政』。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想追加地使人難受，我本身也曾在這樣『總理家政』或『參謀家政』中經驗過。但是我爲了防免對於將才和領袖才的本質不明瞭起見，必須把這樣的弊害最明顯地揭露出來。不是參謀總長尤其不是那個『第一個軍營總監』，而是將才須作戰事領導的頭腦。他須照他自己構成的思想來領導戰爭，頒布適當的指令。沒有人能夠給他可作標準的建設，更不能够怎樣解脫他的負擔。也沒有人能夠解脫他於全民作戰底別方面的負擔。要明白將才的本質是對於任何作戰，對於任何民族都具有不可缺的意義。假使將帥的地位和責任成爲全民作戰的首腦表明清楚了，於是在這個職位中也會具有那將帥實行其偉大的任務時所必需的威信。於是就不會發生那樣的事情，譬如爲了怎樣的顧忌，因爲臆斷他不能獲得必需的威望或太年輕的原故，就把他安置在第二位或第三位。然後那個適當的人物纔可以得到正當的地位，而且用他的人格來利用這個地位。必需把軍隊底一切部分排置在他的命令下，把他排置在具軍政總理資格的陸軍部長及政治指導者的上面，這已

從世界戰爭的經驗上看來不容懷疑的了。這個別無他的意思，就是將帥的地位應如飛德立大王的地位一樣包括各面。

將帥不可以分散他的力量，他只許致力於主要的事情。雖然主要的事情是非常多，而且往往昨天還不是主要的事情，今天就可以變成主要的事情了。凡是對於他極重要的事情，將帥須得認識和確定。他必須有僚屬能够遵守他的思想進程，確實地照他底指令的意義循着詳細的事務規定，執行那些屬於領導和保持軍隊（同時還要周顧戰爭的經驗），維持民族生活和民族統一，戰敗敵方軍隊和敵方民族，偵察中立國家等等工作。他要有一個軍事幹部的總理，這個一方面是他的命令發送機關，另一方面是剛纔所講的問題之獨立的工作者，因此成爲他的右手。軍事幹部本身必須適當地組成，必須包括陸、空、海戰方面，宣傳、軍事技術、經濟、政治方面最傑出的人才，及民族生活的認識者。他們須向軍事幹部總理而且在要求時向將帥本身報告委托了他們的事情。他們沒有命令權利。爲了適應其任務起見，軍事幹部裏的軍官必須獲得一種特別的訓練，別的同僚們也須受過細心的與此適應的預備教育。只有他們大家都是大無我的性格，雙腳不站在理論而是

站在實際上，並且細心研究過戰爭史和全民戰爭的本質，纔能夠完全適應他們底最嚴重的任務。和將帥一樣，陸軍部隊、空軍部隊及艦隊的司令長官，以及任何司令官，也是他們所指導的戰爭行動之領袖、頭腦和意志。也分配了參謀長或老的參謀官給他們。他們基本的預備教育也只限於軍事幹部軍官的教育範圍，可是這種預備教育特別注重在擴充他們戰時對於被分配去的那些軍事組織之知識。他們的活動只在純粹軍事方面。他們不再有雙重隸屬了，只是隸屬於他們的總司令或者將軍。一個總參謀長的設置將來不許再有的。世界大戰中高級指揮官的參謀長與低級指揮官的參謀官間那種佔優勢的關係，把既有的混沌情形之不幸更尖銳化了，而且造成實際上簡直不可考驗的許多「命令手續」。

再說一遍：將帥和司令長官是命令者。附屬於幹部的軍官及總理都隸屬於他們，只有照他們的命令工作。各個總理只許在被將帥或司令長官必將讓與他們處置的事務方面頒佈命令。用此，前者不為細瑣事情所耽誤，而這些事情恰是那些次要人物願意幹的，因為他們正通曉這些。與下級服務機關的交通，除了用命令手續之外不得有別種交通。



將帥就只靠着自己。他是很孤子的。沒有一個人看得見他的內心的事情，不管在他下面從事的有那樣優秀和聰明的人。

假使向火線上任何兵士和軍官，當爲民族之生存保持而鬪爭的責任愈是增高時，對於軍事知識和能力，及意志力方面，提出更大的要求，使這些全部都須得無條件地細心訓練和強化，那麼，這對於站在全軍之上的將帥尤其要求得利害了。他在最嚴重的危機時，幾乎是憑直覺地，閃電一般地，沈機立斷地，執行那最重大的關係戰爭之勝利終結，及民族之生存保持的決議。這種決議還在未來之前及不確定的事實中，但是這種不確定性將很快地被敵人的意志，因爲敵人也相適應地利用有力的行動來對付，轉變爲確定和真實了。這樣克服敵人那種不讓人克服，而且還想在戰爭不確定的情形中，——也許是關於敵人方面不確定，也許是自己的軍隊當着敵方的動作不能完成其任務——克服別人的意志，要求將帥極度緊張他所有的力量。當他的能率和心情已這樣極度忙碌的時候，他同時還須要用遠大的眼光包括軍隊生活和民族生活底各方面，——我已經指示過了，這些就是全民戰爭的基礎，——深刻地洞察各方面。假使這種目光只及到表面上，那麼，

這個將帥就是別人手裏的皮球。他必須發揮鐵一般的工作力，這個保證他當機立斷執行最重大的決議。這個決議之影響戰爭終局與實際上攻擊敵人是同樣的。將帥生活是不容易的。他在他底人格崇高的責任感覺中過着生活。

戰場上的將帥和領袖人才甚至於一個兵士都極高地要求個人的性格。這個常常比知識還要緊。鑽營和奉迎取巧的人不是軍隊所需要的，軍隊需要具有堅強性格的人。職位愈是高和重要，這個職位所有人的性格就必須愈是堅強和可靠。只有這樣的性格纔能博得信任，纔能要求信任。沒有這樣的性格，將帥及戰場上的領袖都是不可思議的了。

戰爭是一種用人的活動。與下級命令機關的交通，就是頒布命令，不是機械的——與別種機關的交通尤其如此——卻是一種人的，極富有生命的事情。將帥還須具有那種才能，正當地運用人員辨別他們的強處和弱點，理解他們的精神，看透人的動機。沈靜和自持，是他必有的性情。而且將帥還須具有一種說不出的東西。我現在借我在戰爭中的不法性裏面關於將帥所寫的話來略示一下：

「就和任何藝術家一樣，將帥必須通曉那個屬於他的藝術的「手藝」。但是除有這種和任何別的藝術家一樣通曉「手藝」和天才與創造的能力之外，將帥還須具有一種不向別的藝術家直接要求的，一種擔負重大責任的力量、意志和性格，及一種不可測量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從那種偉大的人物身上，當他們對着軍隊和民族，及任何德國人之最高的責任感覺中，出動全副的精神、靈魂和心情，來實現那種形成力量和意志的時候發射出來。戰爭史決不能訓練出將帥，而且也不能描寫他的內心生活。這是一種個人的所有物，而且他自己也只有極度緊張的時候纔經驗到。」

將帥必須發出一種不可測量的力量，這就決定他是真正的將帥或者不是。必須從他的身上發射出勝利的意志，而且從此地出發侵入軍隊和民衆裏去，領導起他們來作英雄的行動。

平時就須決定將帥底崇高的位置，以便他能够接受在全民戰爭中所擔負的責任。

他要負責使民族底全部力量當戰爭情形之下，直接在軍隊的形式中或者在國內聽其支配。他在和平時就須得有把握地在現有的民族基礎上達到民族的統一。他要教育青年，強化成

人，在後者裏面強化軍隊，而軍隊裏面又特別強化軍官。他須注意使認識一個民族統一對於全民戰爭的意義成爲統治者，國家管理，甚至民族本身的普通常識。考查這兒對於戰爭定下的方針也是將帥的義務。

將帥須得考查財政和經濟是否適合於全民戰爭的需求，而且爲此採取了保證民族生活和經濟維持，及民族和軍隊之供給的手段。

將帥統率全軍，規定他們平時的訓練和武裝及戰時一致的出動，如命令動員，開始的動作，和進軍等。他是作戰的首領，須用鬪爭和宣傳徹底打擊敵方民族。同時他要注意根據在既有的戰爭經驗上，保持和發展軍隊的戰鬥力，保持民族在國內之精神的，好戰的統一。

他確定政治的方針，政治爲服務於作戰須得完成其任務。（註二）

將帥用開拔命令第一次出動軍隊不常是順利的。這種很密切的互相銜接的動員和進軍之配置，只能製定對於一個較長的時間，譬如一年以上。假使將帥是在這年的過程中被任命了，那麼，他就還被拘於那種不一定與他的意見相適合的，他底前任者的進軍命令。他於是就處在這樣的

情形中——這種情形是非常嚴重的——自己須得滿足於他的前任者所採取的手段。他最嚴重的顧慮就是必須在可能上很快地把進軍照他的意志來形成。他此時不許依照前任者工作。但是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這個可從世界大戰之前那個最後的總參謀長莫提克將軍底行動上表現出來。莫提克將軍雖然爲顧全實際情形起見，改變了他底前任者的進軍計畫，可是終竟不能在作戰過程中脫離史利芬伯爵的進軍思想，而這個思想和他的思想是處在極尖銳的矛盾中。那句當仁不讓的格言在這兒對於將帥比對於任何人都有效。

將帥尋求決戰的時候，他就指導陸上的戰爭行動，同時陸上須得完成附帶的任務。牽持敵人所尋求的決戰的時候，他就委任一個特別的司令官。世界大戰中已大略提出過那個問題，是否最高軍事指導在戰爭開始時留在柏林，同時在西方和東方任命一個特別的司令官。這樣的思想我認爲是失策而拒絕了，因爲這個決定必須在將帥自己的掌握中。他的責任心阻止他任何樣的減輕負擔，反對創設一個不需要的夾在尋求決戰的軍隊與他本身間的中間機關，因爲任何中間機關都只有阻撓很清楚地貫徹領袖的意志的。這自然對於將帥是最重大的要求，他自要打敗敵人，

又還要把他的目光注射到別的戰場上，甚至於海上去，此外還要熟考許多事情，執行全民戰爭向他要求的決議。可是這些一切是根據在將才的本質上而不可變更的。

將帥現在所支配的報告和通訊工具使得他對於敵方的情形——雖然還有許多事情不能明瞭——及本軍的情形，得到比向來不同的觀察。因此他對於作戰的影響也獲得完全不同的效力，是從前的將帥所未曾有過的。同時他必須顧到那個事實，敵方將帥也具有對於反對他的手段比從來更清楚的認識。他須盡力應用上面所說的那些工具，掃除一切本身範圍內的阻礙，因為敵人就已經夠阻礙他了。

我曾經從我的寫字臺上參加了羅馬尼亞、意大利、加利青的作戰，及西方的防守與進攻的戰爭，而且我還是本着我的職位的全部責任心，根據我的能力和經驗而努力參加的。這些能力和經驗都是我從許多戰爭過程的認識上得來，不是個別的地方的領導者所具有的。耳聽到火線上的訴苦聲而能夠鎮靜自若，不動聲色，以免損害了別處鬪爭的終局，這確是需要一種非常的堅忍力量。要自覺地忍受得起最嚴重的緊張，纔能夠取得別處的勝利。

現在將帥比世界大戰時更要要求那些直接受他命令的集團軍指揮和軍指揮無條件地隸屬於他，而且就在他發出特定的命令時也要這樣。同樣，集團軍領導者和軍總司令也要要求依照他們意志的程序。只有這樣纔可以保證一致的行動。如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情形，頑強的下級領導者損害了，怠慢了上級機關的意志，而上級機關須得和下級領導者作鬪爭不可以再有了。同樣也不可以再有那樣的事情，最高軍事指導本身讓軍總指揮來決定一切，頒發不清楚的命令及更含糊的指令，如最高軍事指導對於在羅倫（Lothringen）的第六軍，及一九一四年九月對於第一和第二軍所應負責的一樣。軍集團須要求清楚的命令，就如將帥須要求順從一樣。假使照下級機關的意見必須異動指示，那麼，他們利用現有的情報工具詢問上級的機關是可能的。這很可以引起誤會，好像我在說下級領導者不獨立的話。實在我說的不是這個，而是說的戰爭行動底一致性，我根據戰爭經驗要求最嚴密的紀律。下級領導者在嚴密的紀律之下，具有他們的獨立性。將帥只能把他的意志之實行安置在這個基礎上。（註三）

將帥認為不需要直接給與關於實行作戰的指令的時候，他自然可以確定其基本的思想，然

後讓該下級領導者來施行。但是他需要詳細地監督着，因為末了還是他纔是負責任的人。將帥負有全部戰場上的責任。爲了能夠適應其任務起見，他須得把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那點，就是要下級領導者對於他們的組織向他報告露骨的事實和真話。這種要求聽來好像簡單，但是實際不是那樣容易解決的，假使負責任者不是性格上完全可靠的，就不能解決。在戰勝的影響之下，往往容易把勝利估計得太高，在戰敗的影響之下，又常把這個看得比實際上的還大。這種情形容易在報告裏面表示出來，縱然還不至於一反事實，可能上抹殺失敗的消息。只有洞澈本軍的情形如水晶一般，纔能使將帥採取適當的命令。把這種正確的報告作爲決議的基礎，尤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爲關於敵人的報告往往都是不確定的。大戰時那個關於陸軍右翼勝利的報告，及那個嚴重的關於第六軍的右翼在羅侖戰後情形的報告，使得德國最高軍事指導作出不幸的決議，從陸軍右翼遣送了兩個軍團到東方來，並沒有從羅侖的軍上取去這兩個軍團。爲了派遣力量給我起見，在羅侖軍上取去兩個軍團也許是可能的，不過我實際上莫有請求他們來。

將帥必須期待他的下級領導者，純靠自己，用上級授與他們的力量來完成任務，用此他可以



在其決議中不受阻礙而可以保持實行這種決議的自由。他可以幫助他的下級司令官，使他們容易了解作戰的目的，只要他詳細地及早把他的意思訓示他們。將帥和總司令官之間須有一種信任心來結合着。

將帥除了是軍隊的教育者和領袖之外，還必須是他們力量的保持者和鼓勵者。這裏他必須特別注意到，是否軍隊在戰爭中所需的武裝和鬪爭，真正與要求相適應，而不是需要重大的變更。如我在參加最高軍事指揮的時候所必具執行的一樣。當時戰鬪線已經鬆弛了，尤其是兵士的火力更鬆緩了，我於是須得用機關鎗來代替。技術的輔助工具在戰時大量消耗之中比任何平時的實驗要考查得好些。關於戰略上的形式是自己會出來的。現在將帥的目光須注意到軍隊的組織，同時特別是兵站中的部隊，及國內全部的隊伍，如空軍的海軍的及補充隊形的，考驗他們的軍紀和他們的精神的實質。（註四）他將常用他的目光注視到民族，是否他們為軍隊及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是否他們能夠而且決定與軍隊聯合之下，在精神上的統一中為他們的生存保持而鬪爭。將帥將嚴重地考究經濟的情形及軍隊和民族之供給。在需要援助的地方，他就必須援助，在發

現弊害的地方，他就必須嚴厲地力行改革。這就是他的義務，假使他不實踐這種義務，就對不住軍隊和民族。他要常常得到保證，即是要全民族的政治服役於他。那種無聊的頑強性須在其萌芽的時候就壓制下去。

將帥將很緊張地聽取關於敵方軍隊和敵方民族精神狀態的報告。這是很清楚的，在現代百萬衆的軍隊中，縱然勝利有那樣決定的意義，也不能真正『殲滅』或俘虜每個兵士。這種勝利，及對於敵國經濟和民族之破壞——封鎖他們——用海軍阻難他們的供給，和宣傳之活動等，都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用以摧毀敵方民族的反抗精神和意志。

全民戰爭向牠的領導者提出無窮的要求。向他要求一種能率和工作力，其範圍之廣是向從前的將帥甚至於飛德立大王都未嘗要求過的。

將帥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中是不常見的。是否平時軍隊的領袖也是戰時的將帥，這只可以由戰爭來決定。只有這樣民族纔受得起一個將帥，假使他們都隸屬於他，就是說隸屬於這個爲他們生存保持而進行全民戰爭之領導者的下面。在這種情形下，將帥和民族是分不開的，否則這個將

帥對於民族就太可惜了。

(註一)我給的解答也有關於兩個同盟國的全民戰爭，因為我從經驗上知道，國家的獨自生活對於用兵的一致性怎樣發生阻礙。一九一四年甚至孔拉得將軍 (General v. Conrad) 也反對任何隸屬奧國部隊在第九軍的高級命令之下，後來慢慢地纔克服了這種反抗。當時對於大的戰爭行動就實行一種「約定」，後來建議東方在飛德立大公爵的名下成立一個共同的總司令，我任參謀總長，領導這面的戰爭，被拒絕了。一九一六年八月在困難情形之中設立了一個共同的高級司令，指揮從加利哥 (Galkien) 到東海的火線在總司令奧士得 (Ost) 的名下。以後孔拉得將軍被亞耳慈 (Ahl) 將軍代替之後，纔名義上成立了同盟軍底一個「最高的戰事指導」，在德皇的名下。但是對於不一致的本身並沒有改變了多少。敵人方面的散漫性大概也差不多一樣。但是他們在平時就已經有一個堅固的軍事同盟，關於平時的武裝及進軍，都具有清楚的協定，同時在德、奧、匈之間關於這方面就沒有成立過協定，兩國同盟全是一種政治的。此外，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因德國的攻擊纔在法國造成敵軍共同的總司令，這兒纔作了一點追加的有效的的事情。有人常以為拿破侖第一作到了這樣的解答，這是錯誤的。拿破侖是祕密共濟組合員手裏的皮球，他們把他拋到空中又把他擲下地來，這看他們一八一二年使他向俄國進行那個沒有基礎的征討可知。

(註二)我已經聽過政治家對於這些意見動了感情，特別是對於這種政治應當服役於作戰的思想。克勞塞維茨不已經說過，戰爭不是別的就是用別種手段的政治底繼續，也許政治家會動感情，而把我的觀念當作一個不可救藥

的軍國主義者的觀念，但是這不會改變實際的需求，因為實際正要求我對於作戰及民族之生存保持所要求的東西。這個也請「軍事學家」留意。德國政治在世界大戰中的行動就表明出這種要求的必要性。

(註三) 我特別介紹我的著作戰爭中的不法性，在這兒我引證了下級司令官如何損害了上級的領導。

(註四) 這是很自然的，任何酒精的享受對於軍隊都須排除。我們認識這個物件在世界大戰中給與戰爭結果與軍紀之嚴重的弊害。